

本刊全文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海淀史志

HAIDIAN

SHIZHI

2026 3

(总第 112 期)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颐和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公布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一九八一年七月立

北京市海淀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主办

纵观知行百家 采撷史苑奇葩



2026年5月14日，海淀区史志办为本单位全国地方志先进工作者钟冷举行退休欢送会
(刘江英 摄)



6月9日，海淀区史志办副主任赵习杰带队赴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广州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开展三轮修志工作调研
(田颖 供图)



6月29日，海淀区史志办以主题党日为载体，组织党员干部和三轮修志编辑部编辑、部分修志单位主笔前往中关村科学城（海淀区）规划展览馆开展实地研学活动
(戴金胜 供图)

探寻资政之道 弘扬海淀文化



7月3日，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主任桂生、副主任顾清及相关处室负责人来海淀区调研第三轮修志试点工作
(曹沛函 摄)



7月10日，海淀区史志办赴共建社区曙光街道火器营第三社区对接防汛工作落实情况，凝聚防汛减灾工作合力
(刘江英 供图)



7月21日，海淀区史志办班子与驻区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召开2026年上半年全面从严治党会商工作会议
(陈智慧 摄)

三山五园研究

- 论清帝园居理政与中国之“大一统”（下）
——以清代三山五园为中心 何 瑜 02
- 清代三山五园地区水系的形成 赵连稳 15

本刊特稿

- 中关村论坛的前世今生 王 鹏 马 坤 23
- 香山公园的创新举措 李 妍 32

人物春秋

- 海淀皂甲屯：清末商绅李春圃的传奇崛起 高建军 40
- 邓之诚：穿越史海的思想灯塔 祁 建 42
- 文人王国维与颐和园 王 忠 45
- “川北圣人”——张澜在颐和园 唐 润 48
- 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小传 李国珩 51

寺庙观堂

- 羊坊店地区曾存在过的古庙（上） 孟 化 59

海淀述往

- 中央领导与京西稻 杜振东 69
- 记忆如潮（三）——几个记忆的片段 周文英 72
- 北太平庄的记忆（四）——美丽的小月河 卢弘炜 78

语言文字问答

- “尽如人意”及其否定形式 本刊编辑部 77

史志动态

海淀区史志办召开第三轮修志试点工作穗深两地调研座谈会

本刊编辑部 80

“初心如磐：海淀红色历史文化主题展”开展

张桢贞 82

区领导参观海淀红色历史文化主题展

张澎萱 83

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赴海淀区调研指导第三轮修志试点工作

本刊编辑部 84

让红色资源活起来传开来

——区史志办丰富党史内容供给，让学党史、用党史更走心 倪恒虎 85

顾 问：周来升 李 强 胥天寿

主 编：程培衡

常务副主编：马龙虎

副 主 编：赵习杰

执行主编：宁葆新 田 颖

编 辑：马 坤 王静宜 刘江英 陈智慧 张莞笛

周 勇 徐支燕 董 震 戴金胜

执行编辑：曹沛函

刊名题字：张书范

封面图片：宁葆新

版式设计：林 琳

论清帝园居理政与中国之“大一统”（下）

——以清代三山五园为中心

何 瑜

（接上期）

七、治国与治园，清帝多元一体的大政方针毋庸讳言，中国历史上长期分裂战乱的主要根源，即是强盛起来的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不断侵扰。故康熙帝总结说：“朕阅经史，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自汉、唐、宋至明，历代俱被其害，而可宣威蒙古，并令归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①也就是说，能否解决长城以北的蒙古诸部问题，是中国能否完成大一统的关键环节。

从努尔哈赤起兵伊始，满蒙联盟，“北不断亲”，便成为有清一代的家法。如努尔哈赤时，即同蒙古科尔沁部联姻十次；皇太极在位时，又同科尔沁联姻十八次。故魏源在《国朝绥服蒙古记》中写道：“科尔沁从龙佐命，世为肺腑，与

国休戚……故世祖当早创初，冲龄践阼，中外帖然，系蒙古外戚扈戴之力。自天命至乾隆初，额驸尚主者八，有大征伐，辄属橐前驱，劳在王室，非直亲懿而已。”^②

清入关后，又逐步完备“年班”制度，将蒙古各王公首领按人数多寡编定若干班次，每年轮流入京朝觐。清廷除供给路费、廪饩及赏赉外，例与内地王公等一体朝会宴飨，并于除夕到元宵节前后在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等处赐宴数次，典礼极为隆重。所以，康熙帝不无得意地说道：“柔远能迓之道，汉人全不理会。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③

同时，因蒙古素尊藏传佛教，清朝统治者们认为：要实现中原稳定，就必须确保蒙古安宁；而要蒙古安宁，就必须扶持藏传佛教。所以乾隆

① 《清圣祖实录》卷180，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壬寅。

② [清] 魏源 著《圣武记》卷3，中华书局1984年。

③ 《清圣祖实录》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丙子。

皇帝一针见血地指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①但满、蒙、汉、藏等各族区域，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到典章制度、历史背景均各不相同，故清统治者在大一统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体多元的治国模式。如在“首崇满洲”的原则下，于东北实行将军体制；于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于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合一，并钦派驻藏大臣管理；于新疆北部实行军府制，南疆则伯克制与州县并行；在西南则改土归流，以流官代替土司制度。

一体多元的治国模式如此，清廷的治园模式亦如此。

三山五园的主体建筑，虽没有紫禁城太和殿那样雄伟壮丽，但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和畅春园的九经三事殿一样，均是七间四围廊、净宽36米，大宫门亦均南向面阔五间，前朝后寝，尊卑分明，充分体现了皇权至上的理念。风水大师在看完圆明园山水之后云：“据《赤霆经》云：‘天下山脉发于昆仑，以西北为首，东南为尾……此天下之大势。’园内山起于西北，高卑大小，曲折婉转，俱趣东南巽地；水自西南丁字流入，向北转东……会诸水东注大海，又自大海折而向南，流出东南巽地。亦是西北为首，东南为尾，九州四海俱包罗于其内矣。”^②可见圆明园的宏观布局，与我国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水流东南的地理环境相契合，完全是一个大中国的象征。

同样，圆明园后湖中九岛环列，取禹贡九州之意，即以“九洲清晏”为名，寓意天下归一，河清海晏。乾隆帝在诗序中言：此地“前临巨湖，

渟泓演漾，周围支汊纵横，旁达诸胜，仿佛浔阳九派。邹衍（战国时期齐国学者）谓裊海（小海意）周环为九州者九，大瀛海环其外。兹境信若造物施設耶。”^③乾隆心目中的大九州，也正是他所追求的大一统中国的目标。



《圆明园四十景图咏——鸿慈永祐》局部（林琳供图）

圆明园的建筑与布局在上述象征大一统与皇权至上的表象之外，更多的则是呈现多元的文化建筑。如仿汉代“原庙”建造的“鸿慈永祐”又名“安佑宫”；仿江南园林而建的“如园”“狮子林”等；有佛楼圣地“日天琳宇”，也有象征神仙境界的蓬岛瑶台；有典型蒙古特色的山高水长和含经堂前的蒙古包，也有伊斯兰教风格的方外观；有仿古印度桥萨罗国的舍卫城，也有意大利巴洛克式和法国洛可可式的西洋楼等。就连正觉寺山门的檐额都是满、蒙、汉、藏四种文体，以凸显“国家一统同文之盛”。

① 见雍和宫乾隆御制《喇嘛说》碑文。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③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初集，卷2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另外，盛时的圆明园系由五座御园构成，散布着 120 余个景群。其中由清帝冠以佳名的建筑即有 800 余座，内外悬匾额 1200 余面。不仅包含了中国古典建筑的全部形式，如：楼、堂、殿、阁、馆、轩、斋、室、榭、舫、亭、廊、桥、闸、塔、台、城关以及各式牌楼等；而且建筑形态亦丰富多彩，如常见的矩形、方形、圆形、工字形、口字形之外，还有很多独特的样貌，如眉月形、卍字形、书卷形、十字形、田字形、曲尺形、梅花形、山字形、三角形、扇面形等等，可谓千变万化、琳琅满目。

而上述这些山水园林、多元建筑、匾额饰物的背后，无疑都在默默体现着清帝的治园思想和治国理念。

另一方面则是加强武备，于此布置重兵，创建八旗内务府护军营、西山健锐营和外火器营等特种部队。也成为清廷的一种“治世之资”与“警示之园”。

乾隆有一首香山《致远斋有会》诗，内云：

香山敕政处，其名致远斋。

致远在慎近，九州一心怀。

即以远言之，所致亦广哉。

准夷及回部，何啻万里开。

并自注曰：“准部、回部以次平定，拓地二万余里。大臣驻守其地，各部酋长受封奉职，咸隶版图。”^①

写仿过多座江南园林的乾隆皇帝，在《小有天园记》中也写道：“所可师者（指仿建杭州西湖汪氏园），其意而已。然吾之意，不在千里外

之湖光山色应接目前，而在两浙间之吏治民依，来往胸中矣。”^②在《安澜园记》中，他还写道：

“安澜之愿，实无时不廛于怀也。由其亭台则思至盐官（地名，属今浙江海宁市）者，以筹海塘而愿其澜之安也。不宁惟是，凡长江、洪（黄）河，与夫南北之济运，清黄之交汇，何一非予宵旰切切关心者？亦胥愿其澜之安也。是则予之以安澜名是园者，固非游情泉石之为，而实蒿目桑麻之计。所为在此，不在彼也。”^③

所以我们说：清帝园居理政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园治国，借园理政。

八、“园居理政”，清朝实现“大一统”的最佳平台

康熙帝的《畅春园记》和雍正帝的《圆明园记》中都阐述了园居理政的好处，归纳起来主要是八个方面：宜居、宜政、宜孝、宜学、宜亲贤、宜观农、宜体察民生、宜绥靖万方。但这些与实现中国的大一统又有什么关系呢？

毋庸讳言，中国历史上能否实现大一统的关键，就是长城南北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文化层面能否相互认同、相互融合。而作为入主中原的满洲民族，在人口数量、经济和文化均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要想定鼎中原，统一天下，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两大战略问题：一是如何征服蒙古，和与蒙古联盟以控制中原。二是如何汲取儒家文化，以得到广大汉族民众的认同，包括汉族知识精英的支持与帮助。

要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光靠帝王安坐宫中，与内阁大臣看奏折、批谕旨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达

①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四集，卷6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 《清高宗（乾隆）御制文》初集，卷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③ 《清高宗（乾隆）御制文》二集，卷1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到的。而走出紫禁城，园居理政和巡幸四方则为此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渠道。以下试分析之：

（一）满蒙联姻与满蒙联盟

为笼络蒙古，扩大满洲实力，早在努尔哈赤时，后金就创建满蒙联盟和满蒙联姻制度。此后300年清朝历代统治者均实施不辍。据有关专家统计：入关前后满蒙联姻达586次，入关前的32年间有84次，入关后的268年间有502次。这总计586次的通婚，满族皇家出嫁给蒙古的女子（包括皇女、公主及其他宗女格格）多达430名，满族皇帝及宗室王公子弟娶蒙古王公之女亦有156名。^①其中，康熙成年女子8人里，有6女嫁与蒙古王公；乾隆一朝，嫁与蒙古的皇家女儿，则多达179人。

这些出嫁蒙古的400余名公主和宗女，全部聘与王公及其子弟，并繁衍了庞大的贵族阶层，其中不少人身任扎萨克、盟长、副盟长等职，甚至统掌兵权，镇守一方。^②他们与清朝皇室有着甥舅或外孙、外祖父等关系，不少人又被清帝指婚，招为额驸。以至乾隆皇帝多次在诗文中强调：“藩扈诸是儿孙辈，列爵称非左右贤。”“蒙古诸藩，皆予儿孙辈行，亲爱不世家人父子。”^③这种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关系，必然形成举足轻重的向心力，对维护满蒙联盟，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作用不容小觑。

同时，满蒙联姻的制度化，还表现在下嫁公

主的品级及俸禄制、蒙古额驸入京朝觐制、公主回京省亲制、赐恤致祭制、生子予衔制、备指额驸制等等。在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中实行的朝觐制度（亦称年班）、围班制度，主要参与者也是蒙古各部的王公、台吉等人。届时，他们与回部伯克、四川土司、蒙藏喇嘛等，各按人数多寡编定若干班次，每年年节时轮流入京朝觐。清廷除供给路费、廪饩及赏赉外，例与内地王公等一体朝会宴飨。

由于三山五园园域宽阔，环境优美，自康熙三十年（1691）正月十四日始，清廷即于畅春园含淳堂首次举办朝正外藩宴，连续两天以宴请蒙古王公为主。后改在畅春园万树红霞和九经三事殿举行。乾隆初年起，每年新正必在圆明园举行“上元三宴”（即正月十四日宗亲宴、十五日朝正外藩宴、十六日廷臣宴），并在上元节正大光明殿朝正外藩宴时，召蒙古王公至御座前赐酒成礼。到嘉庆时，圆明园的上元三宴及一系列庆典活动，已成为清朝的家法。嘉庆帝曾说：“每岁外藩入觐，例于正大光明及同乐园山高水长等处，张灯宴赉，藉示怀柔。”^④

另外，清帝还借谒陵与木兰秋狝之机，联谊蒙古诸部。如康熙十年（1671）九月，康熙帝首次东巡，蒙古王公闻知纷纷前来觐见，回銮途中，来朝者亦甚众。^⑤乾隆八年（1743）七月，乾隆帝首次东巡，先后多次接见前来迎驾的各部蒙古

① 杜家骥《清朝的满蒙联姻》，载《历史教学》2001年06期。

② 如赛因诺颜部的额驸策凌父子三人长期充任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统掌漠北蒙古之兵，西防准噶尔部蒙古，镇守边陲，对清廷安定北疆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③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四集卷24，第22页；五集，卷93，第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④ 《清仁宗实录》卷280，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壬寅。

⑤ 康熙起居注，第一册，北京东方出版社。

王公。史载：“众蒙古王、公、台吉等、踊跃欢欣。跪迎道左，恭请朕安。并恳请扈从效力。”

其中，昭乌达盟长吹木丕勒等人还提出：“恭进筵宴外，仍请贡牛羊驼马。”^①满蒙上层间这种关系正如同乾隆帝所言：“内扎萨克诸藩，恭顺诚服，朕皆抚若儿孙，每至必欢欣踊跃……即新附之准夷、回部，年班来者，朕亦必联之以情，待之以礼，厚其饩资而遣之，众亦莫不怀德感恩，几与内扎萨克相等。”^②

因此，满蒙世代联姻，无疑加固了满蒙联盟，形成了一种长期稳定的政治关系。其结果不仅促进了满蒙之间的民族融合，更重要的是为满、汉、蒙、藏等各民族的融合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大一统的形成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二）尊崇儒家，亲近贤良

入关后，面对清初群雄逐鹿、混乱不堪的局面，除满蒙联盟之外，如何汲取儒家文化，尽快得到广大汉族民众的认可，尤其是他们当中知识精英的支持与协助，是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急需解决的大问题。故康熙首次南巡即亲赴曲阜，举行隆重的祭孔典礼，向孔子神位三跪九叩，并称颂孔子曰：“仰惟先师，德侔元化，圣集大成。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永言光烈，罔不钦崇。”^③旋书“‘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中。”^④

嗣后，又令各地孔庙恭悬此四字匾额。

到江宁（今南京）时，康熙帝又亲谒明太祖朱元璋墓，亦率百官行三跪九叩大礼，其虔诚敬奉之情，令江宁“父老从观者数万人皆感泣。”第二次南巡时，康熙帝又特意“亲撰祭文，诣禹陵致祭。率扈从诸臣行三跪九叩礼，”并作《禹陵颂》。^⑤

乾隆帝六次南巡，亦均祭祀明太祖陵，并三次祭祀孔庙、两次谒孔林、三次谒苏州文庙，及举行祭泰山，祀禹陵、谒禹庙、祭周公庙、祭祀孟子等一系列崇儒重道的活动。

康、乾二帝在南巡中为收买人心，除巡视水利、蠲免赋税之外，还不断举行各种考试，增加江浙一带入学名额。^⑥同时，为体现崇文重道，乾隆帝在首次南巡时还把殿本的二十二史、十三经等分别赠予南京的钟山书院、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敷文书院。《四库全书》竣工之后，乾隆在第六次南巡时，又命将七部中的三部分别存放于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杭州的文澜阁。可见乾隆帝对江南的良苦用心。

另外，为避免“明朝末世，君臣隔越，以致四方疾苦，生民利弊，无由上闻”^⑦和“谐臣媚子惟知谄顺以求亲，公卿大夫又隔堂廉而难近”^⑧的政治弊端，康、雍、乾等诸帝时常利用园居环境

① 《清高宗实录》卷197，乾隆八年七月壬寅、庚戌，中华书局。

② [清]王之春，《清朝柔远记》，129页，中华书局。

③ 《清圣祖仁实录》卷117，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第231页。

④ 孔尚任，《出山异数记》张潮辑，《昭代丛书》乙集卷18，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第414页。

⑤ 《清圣祖实录》卷139，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壬子。

⑥ 如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康熙四十二年 and 四十四年两次南巡，即召取了江南举贡生监73人。

⑦ 《清圣祖御制文集》卷26。

⑧ 康熙《无逸篇》



拉近君臣之间的距离。如康熙时畅春园内“南书房”，张英、高士奇、陈廷敬、方苞等人与康熙帝一起饮宴游观、吟诗作画，无异于同堂师友。曾扈从康熙帝北狩木兰的张廷玉有诗记曰：“扈从塞外，蒙恩召入行宫，泛舟观荷，便览诸胜，赐宴于流杯亭。”^①雍正皇帝驻蹕圆明园时，亦“每逢佳时令节，必赐诸王大臣游燕，泛舟福海，赏花钓鱼，竟日乃散。故当时堂廉之间，欢若父子，无不可达之情也。”^②

这在极度封闭、殿宇巍峨的紫禁城中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做到的。故清礼亲王昭槤说：“盖堂帘之间，情意欢洽，浑如家人父子，实一代之美制也。视诸前朝高座深宫，寄耳目于宵小，警咳之际，诛夷立逮者，真不啻霄壤间也。”^③

（三）问农观稼，兴修水利

“农桑，王政之本也。”入关后的清朝统治者在农耕文化的汪洋大海中，深刻认识到粮食的丰歉与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密切相关。所以清帝园居理政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于园内园外均强调问农观稼。如康熙帝在《避暑山庄记》中言：“一游一豫，罔非稼穡之休戚；或旰或宵，不忘经史之安危。劝耕南亩，望丰稔筐筥之盈；茂止西成，乐时若雨暘之庆。”^④雍正帝在《圆明园记》中曰：“至若凭栏观稼，临陌占云，望好雨之知时，冀良苗之应候。则农夫勤瘁，穡事艰

难，其景象又恍然在苑囿间也。”^⑤也就是说，园居理政可为清帝直观了解雨情农作、进而推行一系列重农邵谷之举提供必要的条件。同时，清帝在往返紫禁城与避暑山庄以及三山五园之间的途中，亦常常“循视农桑，周咨耕耨”。这在乾隆帝的御制诗中随处可见，如其多首《西直门外》的诗中即有“合在宫中养体志，还从郊外验耕耘”“为修夏昃法宫旋，徐步轻舆阅大田”；多首《青龙桥西》诗中亦有“荷锄者农夫，警蹕何须避。眉放为逢年，我尔同兹意。”“石闸繁声才度轡，麦田翠色早依裙。别无嗜好频来往，只有耕桑系戚欣。”等等。故《日下旧闻考》的编纂者们在总结皇家苑囿的功能时也认为：清代“苑囿之设，所以循览郊原，节宣气序……实为勤政敕几、劭农观稼之所。”^⑥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清代自康熙朝始，即关注京西水利的整体开发，以便漕运、灌溉和京城用水。同时，亦重视江南的水利与河工，明确提出“治河乃立国之本”，把治理黄、淮、运三河作为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康熙皇帝曾言：“河防之事，甚属紧要，关系民生之休戚，田庐之存没”^⑦故他在六次南巡中多次亲临河干，指授方略。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月，第三次南巡时，康熙帝视察黄河以南、高家堰归仁堤等工。亲自“登堤，用水平测量、见河较高于田。行视

① [清]张廷玉《扈从塞外蒙恩召入行宫泛舟观荷遍览赐宴于流杯亭恭纪二首》。

② [清]昭槤《啸亭杂录》卷1，第10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③ [清]昭槤《啸亭续录》卷1，中华书局，1980年。

④ 《清圣祖御制文集》第三集，卷22。

⑤ [清]于敏中等编纂《钦定日下旧闻考》卷80，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⑥ [清]于敏中等编纂《钦定日下旧闻考》卷74，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⑦ [清]赵尔巽等《清史稿》第十三册，中华书局，1977年。

清口、高家堰，则洪泽湖水低、黄河水高，以致河水逆流入湖。湖水无从出，泛滥于兴化、盐城等七州县。”因此，提出新的治河方案，“以疏导修筑之法、指授河臣。”^①四十二年（1703）各项工程相继竣工，成效显著。

乾隆即位后，继承和发扬了乃祖重视水利与河工等“国之大政”的传统。他曾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②“临幸江浙，原因厘念河工海塘，亲临阅视。”^③故在其六次南巡中，有五次阅视河工，四次阅视海塘，对清代河工、海塘的修治，不无贡献。如首次南巡时，面对久拖未决的黄淮交汇处水患问题，高堰一堤开坝与否，河臣与下游民众意见不一。经反复勘察后，乾隆帝认为下游州县被灾，实由开坝泄洪所致。即明谕“天然坝断不可开”，命人立石永禁开坝。旋命在三滚坝的基础上加设两座石滚坝，合为“仁、义、礼、智、信”五坝。乾隆二十七年（1762）第三次南巡时，乾隆帝再次来此踏勘，最终确定于清口处“上坝增一尺之水，下口加开十丈之门”^④的解决方案，此即著名的清口水志。“嗣是，河臣恪守此法，数十年来下河免受水患，田庐并资保护。”^⑤

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帝复有“改迁陶庄河流之为”。即谕河臣萨载，于陶庄开挖一

条引河，以防止黄河河水倒灌清口。至第二年春完工，“新河大溜畅达，既免黄流倒灌之虞，更收清水刷沙之益。”^⑥

这种实地考察、亲力亲为的做法，较之身居大内，靠批阅章奏是不可能做到的。故事后河道总督李宏奏报，“徐扬各属，一切埽坝工程一律坚整”时，乾隆帝批谕：“设非南巡亲见，实虑不及此，他人亦见不到。此一节，实可为后世法。”^⑦

（四）肄武习劳，明示一统

自古以来，任何一个政权在夺得大统之际，首先要考虑的即是如何确立“正统性”的问题。对于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清王朝来讲，更是如此。欧阳修于《正统论下》曾言：“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病逝前的康熙皇帝在畅春园首次提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⑧其后，面对视清人入关“为神州陆沉，有同洪水之患”的鼓噪，雍正帝在圆明园发表了著名的“大一统”论。其言曰：“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而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并强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⑨

① 《清圣祖实录》卷192，康熙三十八年三月。

② 《清高宗御制文》二集，卷14，《南巡记》。

③ 《钦定南巡盛典》卷29，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初八日。

④ 阿克当阿等修纂《（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广陵书社，2014年，第59页。

⑤⑥ 《清高宗御制文》二集，卷14，《南巡记》。

⑦ 《清高宗实录》卷869，乾隆三十五年九月壬申。

⑧ 《清圣祖实录》卷300，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⑨ 《清世宗实录》卷83，雍正七年七月丙午。

除上述清帝在御园设计与园居理政中反复强调“宅中立极”一统天下之外，在四处出巡中，亦不断宣示一统，并对于与社稷安危、统一大业息息相关的各类问题非常关注。如康熙亲政后，即“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靡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① 而在其六下江南中亦从祭孔谒陵、加恩士绅、蠲免赋税、巡视河工、观民察吏、阅兵尚武等方面，明示清廷一统之正及控制天下的能力与举措。具体事例散于各节，此不赘述。

至于肄武习劳方面，清朝统治者在认同汉文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不易的就是满洲传统的清语骑射。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就提出：“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晏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习乎！”^②

入关后，清廷更将狩猎作为一种典制，订立“大狩猎从例”，每三年举行一次演武大典。顺治帝告诫满洲官兵，“虽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造精良。”

到康熙一朝，康熙帝在强调“骑射乃我国家振兴要务”的同时，一方面利用南苑举行了132次围猎阅武活动；一方面又开辟坝上围场，形成了清代大规模的木兰秋狝大典。晚年的乾隆皇帝总结说：“弓矢为我朝家法。即位以来，每率侍卫等较射习劳，凡阅武，必亲御弓矢示众。”嘉庆帝亦言：“木兰行围为秋狝大典，我朝家法昭垂，举行已久，所以习劳肄武，款洽外藩。”^③

除南苑阅兵与木兰秋狝外，清帝传承家法重视武功等在三山五园中亦表现的非常突出。如康

熙皇帝就曾于畅春园大西门马厂，频繁地举行步射骑射演练。圆明园建成后，出入贤良门外，山高水长楼前，绮春园含辉楼南等地，亦均是清帝频频阅视皇子、王公大臣及侍卫等人骑马射箭的地方。



《乾隆皇帝射猎图》（林琳供图）

雍正初期，清廷建营房万余间，设立圆明园八旗内务府三旗护军营。乾隆朝时，先是在香山静宜园外建八旗健锐营，接着又于蓝靛厂北建外火器营，两营下均分别设有水师营，从天津、福建水师营中选拔教练，于昆明湖操演水战。上述圆明园护军营、健锐营、外火器营的掌印大臣多为皇帝亲信的王公大臣，官兵总数一万三千有余。平时扈从清帝，保卫三山五园，有事则听从调遣，为八旗精锐。而香山致远斋即为清廷内外战争的指挥部之一。乾隆五十六年（1791），乾隆帝作《致远斋有会》诗，内中有：

静宜园中此斋久，初得即以致远名。
尔时正讨金川虏，园外驻兹健锐营。
平伊犁及靖回部，无不获力子弟兵。
金川先降后以剿，始之终之致远成。

① 《清圣祖实录》卷154，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辛巳。

② 《太宗文皇帝圣训》卷1，崇德二年四月丁酉。

③ 《清仁宗实录》卷99，嘉庆七年六月甲辰。

台湾蛮寇夸据险，曾未两月歼鯢鲸。

缅甸赦罪请封至，安南广平亲诣京。^①

八旗健锐营先后参与平定四川大小金川、新疆大小和卓之乱；反击缅甸犯滇、廓尔喀侵藏之战；剿灭台湾林爽文、川楚白莲教等农民大起义；以及抗击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斗。可以说，八旗健锐营为大清王朝，也为多民族统一的大中国作出了贡献。

清帝不仅在御园内外部署重兵，强化训练，而且在巡幸过程中亦重视校阅八旗骑射，以彰显满洲本色。如康熙十年（1671）九月，康熙帝首次东巡，于谒陵后即御大清门，命扈从官员及盛京将军以下文武各官步射，并“亲射数矢”。^②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康熙帝首次南巡时，于谒明太祖陵的第二天，即至江宁教场阅江宁驻防将军以下满洲官兵等射，并操弓“亲射，右发五矢，五中；左发五矢，四中。士民观者以数万计，皆踊跃舞蹈，欢呼动地。”^③

乾隆八年（1743）九月，乾隆皇帝首次东巡时，也格外关注八旗官兵武备。其谕曰，“朕此次至盛京，视其兵丁身材壮健、弓马娴熟，犹未失满洲旧制……尤为可嘉”。^④乾隆六次南巡，除巡视河工、观民察吏外，亦重视江南驻防八旗的武功骑射及水师营伍。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二月，乾隆帝二次南巡时，先是到嘉兴府乍浦水师营检阅八旗水师，接着又到杭州大校场检阅驻防

官兵骑射。阅兵后，乾隆写了首五言律诗，内中有：“百年偃虽可，一日备须明。诘戎伊古训，讵敢诩升平。”^⑤并镌刻立碑，以强调祖制，坚持安不忘危。

（五）尊崇黄教，孝治天下

在清朝统治者看来，藏传佛教与蒙古诸部的关系非同一般。要实现中原的稳定，就必须确保蒙古地区的安宁；而要确保蒙古地区的安宁，就必须尊崇和利用藏传佛教。康熙即位后，尽管多次表达对佛教及佛教徒的厌恶，但面对沙俄对蒙古地区的觊觎和侵蚀，他也充分认识到“佛教之兴，其来已久，使人迁善去恶，阴翊德化，不可忽也”^⑥

这首先表现在康熙皇帝对四大活佛的尊崇与安排。所谓四大活佛，即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和章嘉活佛。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掌管西藏藏传佛教事务，哲布尊丹巴掌管外蒙古藏传佛教事务，章嘉掌管内蒙古和京师地区藏传佛教事务。清廷通过四大活佛掌管藏传佛教，借以加强对蒙藏地区的控制。

史载，康熙三十四年（1695）四月，康熙遣使册立罗布藏伊喜巴桑布，为班禅呼图克图。五十二年（1713）正月，复封其为班禅额尔德尼，如达赖喇嘛例，颁给金印金册。康熙三十六年（1697）十月，清廷在顺治赐封五世达赖喇嘛的基础上，遣章嘉呼图克图等赴藏，迎仓央嘉错至布达拉坐

①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五集，卷65，第1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② 康熙起居注：第一册 东方出版社，2014年。

③ 《清圣祖实录》卷117，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子。

④ 《清高宗实录》卷200，乾隆八年九月乙酉。

⑤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二集，卷7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⑥ 康熙《宏仁寺碑文》。

床，加封为第六世达赖喇嘛，并大加赏赐。

另一方面，康熙三十二年（1693），清廷册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大喇嘛，于喀尔喀地方立为库伦，广演黄教”，^①并统管外蒙古喀尔喀部宗教事务。同年，册封章嘉呼图克图为“扎萨克达喇嘛”，旋以金印敕书封其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并谕其“黄教之事，由藏东向，均归尔一人掌管”。^②

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廷又将紫禁城中正殿改建为藏传佛教区，并设立专门管理宫中藏传佛教的机构“中正殿念经处”。

其次，清廷于御园内外及多伦淖尔、五台山等地广建黄教庙宇。如康熙改建畅春园时，即将周边原明时的庙宇圣化寺、清梵寺改为皇家寺庙，又于园西北角修建永宁寺。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首临五台山后，即拨巨款将台内诸多青庙改为黄庙，菩萨顶成为五台山黄庙体系之首。据《山西通志》载，显通寺、文殊寺、广宗寺、望海寺、法雷寺、灵应寺等均为康熙年间重修。其目的则是“国家绥柔蒙古，特兴黄教。宏启宗门，藉资控驭，是中外乂安，边民享升平之福者逾二百祀。”^③

雍正、乾隆二帝在修建圆明五园时，亦在园中广建佛寺，如慈云普护、日天琳宇（佛楼）、月地云居（清净地）、舍卫城、同乐园之永日堂、曲院风荷之洛伽胜境，长春园的法慧寺、宝相寺、梵香楼，绮春园的正觉寺、延寿寺、庄严法界等。三山五园中著名的庙宇，还有乾隆二十

年（1755）建成的万寿山须弥灵境和香岩宗印之阁（俗称后大庙）。和四十二年（1777）为迎接六世班禅进京祝寿而建的香山宗镜大昭之庙。



香山宗镜大昭之庙（林琳供图）

康熙三十年（1691），清军击退噶尔丹后，康熙帝于内蒙古多伦诺尔召集内、外蒙古四十八家王公会盟，并在此建一佛庙，后御赐名“汇宗寺”，成为清廷聚拢蒙古各部的纽带。五十二年（1713），蒙古各部王公为康熙帝祝寿祈福，齐集热河请建佛寺，旋谕准仿汇宗寺于避暑山庄修建溥仁寺和溥善寺两座喇嘛庙。其后，乾隆朝再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罗汉堂、殊像寺、广安寺、须弥福寿之庙及广缘寺等，形成规模宏伟的皇家寺庙群。

其三，清帝为什么在御园内外修建如此多的黄教寺院呢？用康熙御制的《汇宗寺碑文》来说，即“我国家承天顺人，统一寰宇，薄海内外，悉宾悉臣。”今蒙古“四十八家，家各一僧，佛法无二，统之一宗而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诸蒙古恪

①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卷974，第155页。

② 妙舟《蒙藏佛教史》第五篇，第二章，第二节。

③ 《山西通志》卷81。

守候度，奔走来同，犹江汉朝宗于海。”^①也就是说，黄教寺院如同佛海，能使蒙古诸部如百川汇聚，“统之一宗”。雍正皇帝也认为：“广布黄教，宣讲经典，使番夷僧俗崇法慕义，亿万斯年，永跻仁寿之域，则以佐助王化，实有裨益。”^②

乾隆皇帝不仅高度赞赏乃祖之远见卓识：“蒙古诸藩皆尊佛法重黄教，我皇祖于此建寺居于喇嘛，内外各扎萨克岁时来叩，亦神道设教之意也”^③，并在《昭庙六韵》诗中进一步强调：“因教仿西卫，并以示中华。雪山和震旦，一例普麻嘉。”^④用修建昭庙之由，引出清廷之所以大兴黄教，是因为西藏和中国为一统，共同享受着天下的安宁。亦可谓“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

同时，乾隆皇帝亦理所当然地利用其“文殊菩萨化身”与“转轮王”的称号，将自己标榜为天下共主。其在《法雷寺碑文》中曰：“朕以圣王之法治天下，而于法王（即佛的尊称。亦是藏传“佛教”对于转世喇嘛的称谓）之法蚤承先训，深契净因，故推演至义，为大众津梁。”^⑤

清代园居理政的另一大特点，即“以孝治天下”。入关以后，清朝统治集团在认同与实践儒家文化中，最突出的着力点之一即“孝道”。孔子讲：“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康熙皇帝认为：“孝为万事之纲，五常百行皆本诸此。”^⑥

清帝“首崇孝治”的理念，首先表现在御园里，如清代三山五园的每座园林中都建有太后宫。康熙《畅春园记》载：“机务少暇，则祇奉颐养游憩于兹，足以迓清和而涤烦暑，寄远瞩而康慈颜。”乾隆继位后，不仅将畅春园作“为皇太后高年颐养之地”，将圆明园长春仙馆作为太后节庆游赏时的驻憩之所，而且为皇太后做寿于昆明湖畔建延寿寺，最终形成万寿山清漪园。道光帝即位后，因畅春园年久失修，“殿宇墙垣，多就倾敝，池沼亦皆湮塞。”便命人“将绮春园相度修整，敬奉慈愉。”^⑦光绪朝重修颐和园时，则将面阔七间的乐寿堂作为慈禧太后寝殿。同样，承德避暑山庄也有孝惠皇太后（康熙嫡母）和孝圣皇太后（乾隆生母）的“松鹤清越”与“松鹤斋”两座太后宫。

在上述风景如画的御园中，清帝为践行“孝治天下”的理念，在园中为太后祝寿、侍膳、请安、送礼，陪太后看戏、赏花、游观，甚至在园中为太后居丧致哀。具体内容可参阅马维熙《清宫太后与三山五园史事钩沉》一文，此不赘述。

其次，是对先人的祭祀。古人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清朝统治者继承儒家“敬天法祖”的传统，将谒陵展孝成为典章制度，终朝遵行不替。如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帝前后十次东巡盛京，拜谒陵寝、寄托孝思。其中康熙帝3次，

① 故宫博物院编：《清圣祖御制文》四集，卷23，第13页，海南出版社。

② 雍正《御制惠远庙碑汉文碑文》。

③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五集，卷22，第14页《望海峰三依皇祖元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④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四集，卷7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⑤ 《清高宗（乾隆）御制文》初集，卷17。

⑥ 康熙《御制文选》第五集，卷31。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道光朝上谕档》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4-205页。



乾隆帝4次，嘉庆帝2次，道光帝1次。诸帝在盛京皇宫驻跸期间，除观瞻先祖所用宫殿之外，还在这里宴请百官、赏赐守陵官兵及年老致仕人员。另外，每逢清明、中元、冬至、岁暮、忌辰等大祭节日，清帝还要亲赴东西陵，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

除供奉和祭祀清代历朝皇帝的紫禁城太庙与寿皇殿之外，在三山五园中清帝同样践行“尊崇尊祖”的一系列家法。先是，雍正元年（1723），为给康熙帝荐福，清廷将畅春园清溪书屋改成佛寺，以供奉康熙皇帝御容，赐名恩佑寺。乾隆七年（1742），复于圆明园西北隅仿紫禁城太庙建安佑宫。乾隆《鸿慈永祐》诗序云：“敬奉皇祖、皇考神御，以申罔极之怀。堂庑崇闳，中堂有廬。朔望展礼，懔愆见闻。”^①深切表达对父祖的怀念。其后，每当遇到先帝的诞辰、忌辰或初一、十五时，清帝都会亲临安佑宫拈香行礼，虔诚祭拜。

其三，是清帝携同太后巡幸天下。据《清史稿》载，孝圣皇太后曾随同乾隆帝“南巡者三，东巡者三，幸五台山者三，幸中州者一。谒孝陵，猕木兰，岁必至焉”^②。其中，乾隆帝从圣祖实录中得知，乃祖南巡时“恭侍皇太后銮舆，群黎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交颂天家孝德，心甚慕焉。”故乾隆十六年（1751），其首次南巡时，亦侍奉皇太后“亲掖安舆，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良足以娱畅慈怀。”^③乾隆帝的母亲是

中国古代最长寿的皇太后，享年87岁。皇太后过八十大寿的时候，乾隆皇帝已经六十岁了，但他仍学着康熙帝为孝惠皇太后祝寿的样子，穿上华丽的服装跳起满洲“蟒式舞”，来为母亲祝寿。

其四，是举办千叟宴和九老会，以推广孝道。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其能否认同和继承儒家典章制度，是其能否维持政权继而长治久安的关键环节。清廷以孝治天下的另一种举措，就是举办千叟宴。康熙五十二年（1713）三月，康熙帝借60寿诞，于畅春园举办了三场千叟宴。首场是“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大学士以下，民以上”；第二场是“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大学士以下，闲散人等以上”；第三场由皇太后主持，召集“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七十岁以上年老妇人，至畅春园皇太后宫门前东西向列坐。”席间，命“诸皇子率诸皇孙暨宗室子弟分视赐宴，颁给果饵食席。”^④礼亲王昭槤在《嘯亭续录·千叟宴》中记录了康乾时期的几次千叟宴盛况：“康熙癸巳（1713），仁皇帝六旬，开千叟宴于乾清宫（应为畅春园），预宴者凡一千九百余人；乾隆乙巳（1785），纯皇帝以五十年开千叟宴于乾清宫，预宴者凡三千九百余人，各赐鸠杖；丙辰（嘉庆元年1796）春，圣寿跻登九旬，适逢内禅礼成，开千叟宴于皇极殿，六十以上预宴者凡五千九百余人，百岁老民至以十数计，皆赐酒联句。”^⑤

这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千叟宴，以及清廷所倡

①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初集，卷22，第9页。

② 赵尔巽：《清史稿》第30册，第8914页。

③ [清]高晋辑《南巡盛典》卷1，乾隆36年刻本。

④ 王揆等纂《万寿盛典初集》卷19。

⑤ 昭槤《嘯亭续录》卷1，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

导的“养老尊贤”“入孝出悌”等优老政策，在笼络民心、维护清王朝大一统方面，其作用实是不容小觑。其余乾隆时期仿唐代“香山九老会”（此香山在洛阳，亦称“洛中九老会”，即白居易等九位高龄诗人在东都洛阳集会唱和）而举办的京西“香山九老会”等，（亦称“三班九老会”，即乾隆“九老会诗”序所言：“恭值圣母七旬庆辰，命举“九老”之会，用晋万寿之觞。盖诸王与在朝文臣为一班，武臣为一班，致仕者别为一班，各得九人，统名一会”，并吟诗唱和，赐游香山御园。）因性质相仿，就不一一详述了。

九、结论

综前所述，清朝统治者在借鉴历朝政治得失，尤其是明代皇帝身居大内，上下之情不通，和草原民族进入中原之后的全盘汉化，以至最终覆亡的教训，在积极认同和学习儒家文化、典章制度的基础上，面对如此复杂彪悍的各边疆民族，一方面保持满洲弓马骑射的尚武精神和八旗制度，另一方面则重塑和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典章制度。其中，最突出的举措就是园居理政和巡幸天下。

园居理政的宜人环境缩短了君臣之间的距离，正如康熙皇帝所言：“凜遵祖宗之家法，思与天下贤才共图治理。常以家人父子之谊，相待臣僚，罔不兢业，以前代为明鉴也。”^①而巡幸天下，则是效法和发展古代“问俗观风”的传统，走下朝堂，不仅接近民间，更多的了解社情民意，而且缩短了行政链条，有效地解决了治国理政的

诸多问题。康熙皇帝说过：“古之人君居深宫之中，不知民间疾苦者甚多。朕巡行各处，曾目击之，故知之甚确。”^②乾隆皇帝亦言：“朕巡省所至，首在勤民，而河湖要工，所关尤巨，一切应濬应筑，奏牍批答，自不如亲临相度，得以随处指示也。”^③

清帝在长期园居理政和巡幸天下的过程中，一方面时时认知民间的稼穡之艰难，机杼之勤苦，一方面不断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同时，亦逐步得到广大汉族民众，尤其是汉族知识精英的认同。而这种文化认同，恰是清代中国大一统的首要条件，没有这种满汉民族之间的认同，十八世纪中国大一统的根基就不可能建立。其它如满蒙联盟、满蒙联姻，又是中国少数民族相互认同的核心，而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一系列边疆民族政策，同样也推动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以至形成“今天下大一统，以示无外，即鬼方靡莫故地，已进而中国之，与列省比肩。”^④最终为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换句话说，清廷的“园居理政”和巡幸天下，实际上是一种适合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动态和较为开放的理政模式。而以圆明园为核心的三山五园，既是清廷治理天下的大本营，也是历史上多民族之间相互认同，推动中国“大一统”形成的中枢平台。

① [清]张玉书编《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26，杂著。

② 《圣祖仁皇帝圣训》卷23，康熙五十五年闰三月壬午。

③ 《清高宗实录》卷533，乾隆二十二年二月癸巳。

④ 《钦定四库全书》《乾隆贵州通志》卷39。

清代三山五园地区水系的形成

 赵连稳

三山五园是人们对清代北京西北郊一带皇家苑囿的总称，泛指从康熙朝至嘉庆朝陆续修建起来的众多皇家园林。清代统治者之所以青睐这块土地，是和三山五园地区的山水环境密切相关的，同时，在陆续修建园林以及解决京城用水和漕运问题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因地制宜、因水制宜，使得这一地区的水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关于三山五园地区的水系问题，学术界已有一些成果，例如侯仁之先生的著述中较早对三山五园地区的河渠湖泊进行了研究，常征、于德源先生的《中国运河史》和蔡藩先生的《北京古运河和城市供水研究》书中则论述了元代郭守敬引昌平白浮泉济运河水和清代疏浚瓮山泊之事，还有一些论文也有所涉及。这些专家学者的研究给我诸多启发，本文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史料，特别是利用明清实录和一些档案资料，对清代三山五园水系形成的过程做比较系统详细的论述。

一、清代以前三山五园地区的水系

三山五园地区既有山，又有水，山清水秀、满目翠绿，其丰富的水源和这里的地形地貌是密

切相关的。三山五园地区的西部和北部都是太行山余脉，而东南则是平原，这种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使来自东南的潮湿空气在山前受阻，形成降雨，而且西山一带多石灰岩，溶洞较多，透水性强，容易形成山泉，如香山诸泉、玉泉山诸泉、金山泉水等；三山五园地区的平原地带曾是大约7000—5000年以前的永定河古道流经地，构成地下水溢出带，地下水丰沛；三山五园地区地势低洼，畅春园一带曾经是巴沟低地所在，平地泉涌，如万泉庄泉水。这就使得三山五园地区的水源来自两个水系：即从西部山区东来的水系，人们习惯上称为玉泉山水系；从巴沟低地北流的水系，人们称之为万泉河水系。

（一）玉泉山水系和万泉河水系

玉泉山水系源于樱桃沟泉水。樱桃沟泉（又名“水源头”）位于卧佛寺西北的樱桃沟内，是整个西山泉水的源头。香山静宜园内也分布着许多名泉，如玉乳泉、卓锡泉和双清泉等。

玉泉山东南地区，位于古永定河洪积扇下缘，地势低洼、平地泉涌，汇而为湖泊。金人赵著在

碑文中记载：“燕城西北三十里有玉泉，泉自山而出，鸣若杂佩，色如素练，泓澄百倾，鉴形万象。及其放乎长川，浑浩流转，莫知其涯……山有观音阁，玉泉涌出，有玉泉二字刻于洞门，泉极甘冽，供奉御用。”^①在玉泉山周围，众多泉源涌出，总名曰“玉泉”。明代成化进士乔宇在《白岩集》中说：“玉泉山泉出如沸，蓄为池，清可鉴毛发，此西湖之源也。”^②明朝天顺进士李东阳《怀麓堂集》记载：“玉泉出于山下，歆薄转激，散为谿池。”^③

玉泉山的泉水和香山的泉水以及西山的诸泉是相通的。樱桃沟泉水和香山泉水流经地下后，又从玉泉山喷涌而出，汇集于玉泉，玉泉山水又流入西湖。乾隆《麦庄桥记》记述了玉泉山水的来龙去脉：“如京师之玉泉汇而为西湖，引而为通惠，由是达直沽而放渤海。人但知其源出玉泉山，如志所云巨穴歆沸随地皆泉而已。而不知其会西山诸泉之伏流，蓄极溢涌，至是始见，故其源不竭而流愈长……盖西山、碧云、香山诸寺皆有名泉，其源甚壮，以数十计。然惟曲注于招提精蓝之内，一出山则伏流而不见矣。玉泉地就夷旷，乃腾迸而出，渚为一湖。”^④玉泉山一带地势较香山低洼，使得樱桃沟和香山的泉水顺势汇集到这里。

万泉河水系源于其西南部的巴沟低地上游，巴沟低地是古永定河北去的故道，海拔比昆明湖还要低。万泉河是乾隆命名的，之前叫“八沟水”或“大河”。金朝以前的万泉河水源有玉泉山的

泉水和万泉庄一带的泉水两部分构成，金朝修金水河，引玉泉山水南流，把玉泉山泉水与万泉河分开，此后，万泉河水源就主要是万泉庄和巴沟村周围的泉水了。

但万泉河流域仍可接收到来自玉泉山的泉水。在巴沟村和万泉庄周围，平地淙淙出乳穴者，不可胜数，这些泉是由古永定河故道中的水溢出汇集而成，在万泉庄西南一带形成四个小湖泊，俗称水泡子，分别是位于最南端的后泡子、北面的前泡子和黑鱼坑以及最北边的小泡子。泉水顺地势自南向北流经巴沟桥汇成万泉河，然后注入丹棱洪，由丹棱洪再往东北流进清河。

（二）金元明时期三山五园水系变迁

如果说金代以前三山五园地区的水系还是处于原始状态的话，那么自金朝开始，至元明两朝，就是通过人工改造致使三山五园地区的水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国家政治中心向北京转移，北京城对水的需求量大增，统治者便对三山五园地区的水系进行改造，修建水利工程，将玉泉山泉水引进城内。

1. 金朝整合玉泉山泉水，开挖金水河

金代在建造中都城时，因考虑到京城用水问题，所以将城址选择在西湖（即今天的莲花池）的东边，但后来西湖已经无法满足京城御苑用水，为此，金代把西山诸多泉水汇集到金海（即后来的昆明湖），又将金海加以疏浚，从金海的东南角开挖一条20余里的人工河，使金海湖水自此向东南而去，从都城西北角的会城门处的水门流入

① 李兰盼等：《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山川》，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12页。

②③ 周家楣、缪荃孙：《（光绪）顺天府志》卷15《京师志·水道》，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④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99《郊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8页。

城内。因为河水来自西边的玉泉山和樱桃沟，而按照五行学说，西方属金，所以这条河便命名为金水河。这条金水河至元代兴建大都城时废弃，遗址就是现在玉泉山南的南旱河。

2. 元朝重修金水河

元代为了解决皇宫用水，水利家郭守敬重修金水河，把玉泉山水单独引入大都城内，以供御用。《南村辍耕录》记载：“至元四年（1267）正月，浚太液池，派玉泉水，通金水。”^①元代金水河进城路线和金朝不同，《元史·河渠志》记载：“金水河，其源出于宛平县玉泉山，流至和义门（今西直门）南水门入京城，故得金水之名。”^②元代金水河自玉泉山向东，沿着昆明湖、南长河西侧向东南行进，至车道沟处，折而向东，沿南长河南侧东流到和义门南水门入城。元代金水河为皇家专用水道，所经河流，使用“跨河渡槽”的办法，以保持水质，并且根据《都水监记事》记载：“金水入大内，敢有浴者，澣衣者，弃土石瓴甌其中，驱马牛往饮者，皆执而笞之。”^③沿途“濯手为禁”，至元十五年（1278）十二月还下令“丙午，禁玉泉山樵采渔弋。”^④以确保金水河水不被污染。

3. 元朝修建白浮瓮山河

元代以前，玉泉山的部分泉水顺着地势，由北长河（古称玉泉河、玉泉山河，全长2千米）经过万寿山西北侧，流入东北方向的萧家河。元

初，城内开凿太液池，为让瓮山泊湖水接济城内用水，便在瓮山泊北边的青龙桥设水闸，汛期开闸放水，平时拦住流入萧家河的湖水，提高瓮山泊的水位。至元二十八年（1291），郭守敬又修建白浮瓮山河，把昌平白浮泉水引向西方，绕过沙河与清河谷地，再沿西山脚下开渠筑堰，途中与许多西山的泉水合流，经过青龙桥，流入瓮山泊。蒋一葵《长安客话》记载：“瓮山迤北五里为青龙桥，元时白浮堰之上游也。”^⑤这样，从玉泉山来的泉水和从昌平白浮山来的泉水汇集瓮山泊，使瓮山泊的水量大增，然后再由瓮山泊开挖水渠引水入城，这条水渠从瓮山泊东南开始，流经巴沟低地和万寿寺高地，与高粱河相接，过今紫竹院公园、北京动物园、西直门北侧，流入积水潭。这就是今天的长河（即南长河），成为流入城内的一条主要水道。

4. 明朝增加西湖蓄水量

明朝初年，白浮泉枯竭，金水河上游废弃，西湖（昆明湖）水门缩小，为此，明初对西湖进行修治。

永乐五年（1407）五月，北京刑部言：“自西湖景至流通（当为通流，闸名，在今通县）凡七闸，河道淤塞。自昌平县东南白浮村至西湖景东流水河口一百里，宜增置十二闸，请以民丁二十万，官给费用修置。”“命运粮军士浚道，其置闸俟更议。”^⑥朝廷同意清淤，但搁置增加

①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1《宫阙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29页。

② 宋濂等：《元史》卷64《河渠志·金水河》，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91页。

③ 苏天爵：《元文类》卷31《都水监事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影印版，第7页。

④ 宋濂等：《元史》卷10《元世祖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7页。

⑤ 蒋一葵：《长安客话》卷4《郊垞杂记·青龙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

⑥ 《明太宗实录》卷67，永乐五年五月丁卯。

水闸之事。同年九月，完成379丈的湖堤修建任务，“修顺天府西湖景堤三百七十九丈”。^①玉泉山水汇集西湖后，由白浮下游故道流入德胜门水关，至积水潭后，一支流进三海，有诗为证：“玉泉之山下出泉，泉流树色镜中悬。却带西湖连内苑，直下通津先百川。”^②是说玉泉山水流进西湖后，又流入内苑中的三海，最后汇入通惠河。

金元明时期，通过整合玉泉山泉水、开挖金水河和白浮瓮山河、疏浚西湖；在青龙桥处建闸，把水流尽量汇集到西湖，再从西湖把西来的诸多泉水通过金水河与南长河引入城内，三山五园地区水系流向首次发生重大变化。

二、清代三山五园地区水系的形成

至清代，统治者依山傍水，在西北郊大规模兴建皇家园林，西起香山，东至圆明园，园林遍布，随着园林用水量的大增，清圣祖玄烨、世宗胤禔和高宗弘历对三山五园地区的水系进行大力兴修，至乾隆时期，三山五园地区的水系基本形成。

（一）万泉河水系的形成

1. 圣祖玄烨整治万泉河水域

康熙年间是清代三山五园修建的起步阶段。

康熙十六年（1677），清圣祖玄烨在香山寺旧址的东边，建造香山行宫，供自己游憩使用，规模不大，设施简单。康熙十九年（1680），在玉泉山修建行宫，二十一年（1682）建成后命名“澄心园”，三十一年（1692）改称“静明园”。

不过，康熙年间建造的最大的皇家园林还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圣祖玄烨南巡归来，开始在明朝武清侯的清华园旧址上仿照江南园林修建的畅春园，这也是清朝皇帝在西郊的第一处常年居住、避喧理政的行宫。康熙帝又在该园周围为7位皇子修建赐园，其中有位于畅春园北边的彩霞园（后来的蔚秀园）、位于畅春园、圆明园之间的承泽园等。

建造畅春园时，通过整修万泉河水系和叠山理水，将河水引入园中，在北部形成以水景为主的园林布局，为防止水患，还在畅春园西面修建了西堤（今颐和园东堤）。

畅春园的水来自玉泉山和万泉河，主要是万泉河水系。流入瓮山泊的玉泉水经过嵎河流入畅春园大宫门前面的丹棱泮。清人王鸿绪在《赐游畅春园恭纪》中云：“西岭千重水，流成裂帛湖。分支归御苑，随景结蓬壶。”^③是说玉泉山的一部分泉水流进了皇家御苑畅春园。同时，万泉河的泉水经过整治后形成奔流之势，也汇入丹棱泮，致使清初丹棱泮的水域很大，清圣祖玄烨的《畅春园记》曰：

“自万泉庄平地泉涌，奔流瀲，汇于丹棱泮。泮之大，以百顷，沃野平畴，澄波远岫，绮合绣错，盖神皋之胜区也。”^④清圣祖玄烨通过修建圣化寺，进一步整治万泉河水域，使万泉河成为“大河”，史载：

“出小西厂之南门二里许，为圣化寺北门，

① 《明太宗实录》卷71，永乐五年九月甲寅。

②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7《西山》，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6页。

③ 吴长元：《宸垣识略》卷11《苑囿》，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18页。

④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76《国朝苑囿畅春图》，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8页。

内西为河渠，东为稻田，前临大河。”^①

2. 高宗弘历疏浚万泉河

万泉庄、八沟等地是万泉河发源地，流水沟宽度仅仅一二尺，而“流泉支岔错综，全赖疏引入河而注菱茭泡蓄养。”^②至水位低时，蔓草丛生，落叶积聚，加上水沟两边沙土冲入，致使水沟常有湮塞。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廷下令对万泉庄水源进行疏浚。乾隆二十九年（1764）和三十一年（1766），清高宗弘历两次命令开挖万泉河道，疏导泉水，“圣化寺园近万泉庄，河中泉眼亦因岁久淤塞，并命疏浚。”^③乾隆二十九年，《御制虚静斋诗》记载了这次疏浚万泉河的状况，曰：“挑划茭泥引泉眼，为穿新脉自溪源。”

该诗注释曰：“圣化寺园近万泉庄，河中泉眼亦因岁久淤塞，并命疏浚。”^④乾隆三十一年又一次在万泉河流经地兴修水利，在《由万泉堤上至圣化寺即景杂咏》诗中，弘历写道：“甲申疏治起农功，泉利就遗可扩充。春仲鸠工辟塍圳，稻秧今看已菁葱……茭葑剔淤前岁为，引泉曲注已成池。”该诗注释到：“万泉久湮塞，甲申岁始命疏浚，即其地开水田，今春复加垦辟，稻畦鳞次，属以长堤，迤迤至圣化寺，宛然江乡风景。”^⑤后来由于官吏的疏忽，万泉河道又淤积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二月，被弘历发现，即命内务府的苏楞额全权负责疏浚工程，再现“万泉水涌波澜阔，二麦云齐饼饵香”的景象。

经过清圣祖玄烨、世宗胤禛和高宗弘历的不懈努力，万泉河水系终于在乾隆时期形成。万泉

河的水汇集丹棱洪后，从畅春园西南部的进水闸与船坞南边的水闸进入园内，继续北流，从东、西、北三面环绕彩霞园，再由东北角流入睿王府（今北京大学内中心区）后，从今北大未名湖的东北角流进睿王府北边的鸣鹤园和朗润园北墙外的万泉河，向东、向北流去。绮春园引一股万泉河水入园，曲折迂回到东南部和其他的水合流，又分成两股水道自西向东流过熙春园（今清华大学内），经此处排出东墙外的万泉河。

万泉河的河水在畅春园外的双桥分成东西两支，万泉河东支从双桥向东，过大宫门和畅春园东南角，自清梵寺向北，和流经畅春园园内的河水在畅春园东北角出水闸外汇集，向东北流去，和万泉河西支合流；万泉河的西支自双桥顺畅春园西园墙北流，一部分进入圆明园，在圆明园西北角沿着北墙东去，在东北角与万泉河东支汇合；一部分流入东边的承泽园，再出东墙，也和万泉河东支相会，最后流进清河。

（二）玉泉山水系的形成

雍正乾隆时期相继对圆明园、静宜园、静明园进行大规模扩建，同时又修建了颐和园，使北京西郊的皇家园林连成一片，三山五园进入鼎盛阶段，对水的需求量大增。这一时期，整合玉泉山水系，疏浚昆明湖，通过建立水闸，使水流向圆明园，玉泉山水系形成。

1. 整合玉泉山泉水

乾隆七年（1742）到九年（1744），随着圆明园的大力扩建、京城用水的增加，加上瓮山泊淤积，使其蓄水量减少，明显不能满足用水的需

①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78《国朝苑囿·圣化寺》，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内务府奏案·和尔经额奏请添派闸军管理万泉庄水源折》，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

③④⑤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78《国朝苑囿·圣化寺》，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要，高宗弘历决定对瓮山泊进行大规模开挖、淤和疏浚，而整合玉泉山泉水则是其前奏。

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就曾经对玉泉山水道进行过疏浚，二十二年（1683）在北长河建设玉泉新闸，二十九年（1690），又建玉泉山石闸一座。雍正十年（1732），对静明园内外河进行疏浚，“静明园内河由闸夫挖掘”，静明园外河，因“被泥土堵塞”，^①也进行疏通。

乾隆十四年（1749），高宗弘历根据派人勘察玉泉山水系的结果，亲笔写了著名的《麦庄桥记》，对玉泉山水系的来龙去脉有了充分了解，于是对玉泉山周边的泉水进行整合，最后形成8个泉：山阳泉、裂帛泉（亦称裂帛湖）、涌玉泉、宝珠泉、试墨泉（也叫坚固林泉）、镜影涵蓄泉（简称镜涵泉）、迸珠泉和涵漪斋泉等。

玉泉山宝珠泉和涌玉泉原为两个细流，高宗弘历在修建静明园过程中，把堵塞泉眼的砂石清理出去，使得二泉喷涌，并分别为它们命名为宝珠泉和涌玉泉。关于清理二泉的经过，在乾隆御制诗中有反映。^②宝珠泉水南流，和试墨泉水合流，形成静明园东北部最大的镜影湖，镜影湖南长22米，东西宽9米。最后，玉泉山的水都汇集到玉泉（玉湖），玉泉水面“南北均长七十二丈，均宽五十二丈五尺”，是玉泉山最大的湖水。玉泉水一支向西南流，过垂虹桥自南园墙的水城关进入高水湖；第二支流向东南，经东宫门前的南闸出园，也流入高水湖。（高水湖的湖水一部分流入玉河）；第三支是汇集裂帛湖水流向东北，

途中与北边引来的宝珠湖和镜影湖水一起，自东园墙出三孔闸流为玉河，在此和流入的高湖水合流，奔向昆明湖。

2. 疏浚瓮山泊，赐名昆明湖

由于明朝末年以来瓮山泊久未疏浚，导致淤积，储水量大为减少，乾隆十四年（1749）冬天，雇佣农夫，开始大力疏浚，“芟苇茭之丛杂，浚沙泥之隘塞”^③，次年一月完工。乾隆十五年的《御制西海名之曰昆明湖而纪以诗》中记载了疏浚工程：“西海受水地，岁久颇泥淤。疏浚命将作，内帑出余储。乘冬农务暇，受值利贫夫。藏事未两月，居然肖具区。春禽于以翔，夏潦于以潴。昨从淀池来，水围征泽虞。此诚近而便，可习饮飞徒，师古有前闻，赐名昆明湖。”^④据《清高宗实录》：

“谕，瓮山著称名万寿山，金海（西湖）著称名昆明湖，应通行晓谕中外知之。”^⑤疏浚后的昆明湖水面，向东拓展到畅春园外的西堤，水面南北长1930米，东西最宽处达1600米，两倍于前，又在湖西部筑起南北大堤，称为西堤。乾隆还命人在昆明湖的西北部开凿干渠，经瓮山西麓后，一支东流汇集马厂诸水，流入圆明园，一支过青龙桥闸门，流入清河。

为了调节水量和灌溉稻田，乾隆时期，还在玉泉山和昆明湖之间，在玉泉山东南开挖高水湖和养水湖，两湖水的来源为雨水、玉泉水及其湖底的泉水。高水湖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修成，主要接纳从垂虹桥南下的玉泉山泉水，分别流入玉

① 《内务府满文奏销档·总管内务府奏修理京城内外河道等事折》，雍正十年四月十九日。

② 《书画舫》记载：“山后亦有泉，呖咽隐砂石。疏剔导其流，潏汨淙乳泽。喷出双珠圆，汇成一湖碧。”

③④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84《国朝苑囿·清漪园》，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⑤ 《清高宗实录》卷360，乾隆十五年三月丙辰。



三山五园水系形成示意图（作者供图）

河、金河和养水湖，还有一部分用来灌溉稻田。

为了发挥昆明湖蓄水、排洪和灌溉的功能，乾隆时期在昆明湖的东南端修建了绣漪桥闸，如城内需水，便开闸放水；北端修建了青龙桥闸，作为泄洪闸；东北角修建了二龙闸，水东北流，过马厂桥在颐和园大宫门前和由后山湖而来的水流汇合后东流，与万泉河的西支合流，经西马厂到达圆明园西南角，从圆明园西南角的一孔闸（藻园）流入园内，成为圆明园的主要供水道，然后在园内形成几支分流，顺着地势，自西北向东南流去，迂回到福海，再泄入长春园，水在长春园环绕后，从该园的东北角的七孔闸流入清河。诚如《日下旧闻考》记载，玉泉水“发源玉泉山，由西马厂入进水闸，支流派衍，至园内日天琳宇、柳浪闻莺诸处之响水口，水势遂分，西北高而东南

低，五空出水闸在明春门北，一孔出水闸在蕊珠宫北，水出苑墙经长春出七空闸，东入清河”；^①另外一小部分水流则进入圆明园墙外的护墙河，向北、向东流去。向北流的护墙河转向东流后，一直到长春园北墙才融入到西洋楼一带的水面；沿圆明园南墙东流的护墙河，则到绮春园东北角，转而南流，于绮春园东墙外与万泉河汇合。

为了保证圆明园河流畅通，清朝不断对本地区的河道进行疏浚，例如雍正十年（1733），就曾经疏浚过圆明园前后河。^②至此，三山五园地区的水系基本形成。

三、余论

在三山五园地区水系基本形成以后，为了收集更多的泉水，增加昆明湖的蓄水量，乾隆三十八年（1773），又把西山卧佛寺樱桃沟和碧

①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80《国朝苑囿·圆明园》，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4页。

② 《内务府满文奏销档·总管内务府奏修理京城内外河道等事折》，雍正十年四月十九日。



西山引水槽示意图（作者供图）

云寺以及香山诸泉的水流，利用长约两公里的石凿水槽下注到四王府村广润庙内的石砌水池中，然后引水东流至玉泉山，再合流玉泉山诸泉，注入昆明湖。《日下旧闻考》对此记载道：“西山泉脉随地涌现，其因势顺导流注御园以汇于昆明湖者，不惟疏派玉泉已也。其自西北来者尚有二源：一出于十方普觉寺（即卧佛寺）旁之水源头；一出于碧云寺内石泉，皆凿石为槽以通水道。地势高则置槽于平地，复以石瓦；地势下则于垣上置槽。兹二流逶迤曲赴至四王府之广润庙内，汇入石池，复由池内引而东行，于土峰上置槽，经普通、香露、妙喜诸寺夹垣之上，然后入静明园。”^①出静明园流入昆明湖，对此，样式雷资料

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条水渠在以后的岁月里，经常维修加固，例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粘修松坞云庄到中宫一带的水沟涵洞 101 丈 3 尺余，疏通樱桃沟到妙喜寺的引水沟 851 丈 3 尺余。

乾隆四十九年（1784），拓宽月河、改修养水池，在广润庙西边修建 44 丈的引水沟等等。

综上所述，清代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时期，统治者依山傍水，在北京西北郊建造了绵延几十里的皇家园林，为了满足园林用水，对河湖水系进行人工改造。乾隆年间，既是三山五园地区的水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又是基本定型的时期，之后的统治者基本上维持了这个局面，没有大的改变。

①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101《郊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2页。

中关村论坛的前世今生

王 鹏 马 坤

中关村论坛是我国科技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更是海淀区塑造国际一流创新生态的战略引擎。自2007年首届论坛启幕以来，在国家、北京市的大力推动下，海淀区作为承办主体之一，一路服务保障这一盛会的高标准举办。从三山五园旁的思想激荡，到世界顶尖科学家的同台论道，从本土技术成果的初次亮相，到跨国协同创新的深度链接，中关村论坛不断升级成为展示中国科技成就、集聚全球创新资源、推动高水平国际合作的国家级平台。

积厚启序，逐光起步

中关村论坛的诞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二十世纪9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国际机构、知名学者，甚至许多国家领导人对中关村产生兴趣。在此形势下，海淀区政府和中关村管委会于1998年联合创办首届“中关村电脑节”，此后连续举办八届。这一产业节庆成为早期展示区域科创形象的鲜明标识，也在实践中积累了举办大型科技活动的宝贵经验与资源，为后续中关村论坛的孕育打下了深厚基础。2005年前后，国际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科技

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攀升，很多科技大国通过深化合作、有序竞争实现飞速发展。而彼时的中关村作为我国科技创新高地，虽已汇聚大量科研机构、高校及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资源高度集聚，但各创新主体之间，以及他们和外界之间，缺乏常态化、高层次的交流协作机制。2005年，中关村管委会承办国际科技园年会，并据此看到科技论坛的联通性作用，意识到中关村的发展同样需要这样一个高规格的沟通交流平台。

经过多方协同筹划，这一承载着中关村国际化愿景的构想加速落地。2007年11月28日，一场聚焦国际科技园区创新与发展的论坛——“2007科技园区北京论坛”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开幕。它由科技部、中科院、中国科协、北京市政府主办，中关村管委会、市科委、北京市政府外办、海淀区政府等单位承办，主题是“创新、合作与发展”。来自全球11个国家的科技园区代表与中关村科技园等国内高新区的代表，在两天时间里，围绕区域创新、政府作用、全球合作等议题进行学术探讨。主办方希望，这场论坛能够

为国际高科技创新园区提供一个加强信息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推进技术经济合作的高端对话渠道。这就是中关村论坛的开端，之后又被称为首届中关村论坛。

这届论坛虽然规模较小、议题较集中，但仍为中关村创新资源整合提供了首个官方交流共享平台。次年，中关村论坛的名称被正式确定下来，“创新与发展”成为永久主题。^①

中关村论坛的成长，历经多个关键节点

早期，论坛主要围绕科技创新的基础议题，聚焦于搭建国内外交流桥梁，如2008年研讨“科技——全球创新挑战”，剖析全球科技趋势对我国的影响；2009年关注“创新创业能力与企业家精神”，力求从企业家精神的维度，充分激发创新创业活力。随后，国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视程度提升，2010—2011年，论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策源地”“创新驱动”等为主题，助力产业布局与发展，推动协同创新落地见效。中关村论坛紧扣科技前沿与国家需求，其历年主题的调整不仅映射创新趋势，更主动引领发展风向。

其间，海淀区积极做好承办相关的服务保障工作，进一步配合完善论坛组织机制。一是建立政企联动承办模式，由中关村管委会与海淀区政府联合牵头，百度、联想、用友、新浪等龙头企

业参与协办；二是增设成果对接专场，如2010年论坛设立“技术转移与产学研合作”专场，促成高校与企业技术合作项目30余个，签约金额超5亿元；三是积极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参会，如科技界、产业界领袖及政策制定者，持续提升论坛的专业性与影响力。^②

2011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提出将中关村论坛打造成“展示自主创新成果、提升国际合作水平的重要平台”^③，推动其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对话高地迈进。2012年，论坛首次发布“中关村指数”。作为一套对标“硅谷指数”^④的权威评价体系，它以6大维度、122项指标，全景式解码中关村的创新基因，让一组组数据来讲述中国科创高地的崛起故事。^⑤无论是对于科技工作者还是普通市民来说，他们都能通过这份既有深度分析，又有直观数值的“晴雨表”，了解中关村过去几年中，在创新能力、辐射带动、创新环境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伴随对创新规律认识的加深，论坛议题设置也不断深化，从关注创新产出的量化呈现，转向对创新生态本源的深度探讨。2014年，论坛以“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协同·分享·共赢”为主题，首次重点关注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要素和内涵。美国湾区委员会首席

① 石春晖：《荣耀十八年·中关村论坛的科创蝶变》，《中关村》，2025年第3期。

② 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已核实。

③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2011年2月22日。

④ 每年发布一次的“硅谷指数”是硅谷的晴雨表，也是全美乃至全球科技发展的风向标。具体说来，它是一份反映硅谷地区发展状况，分析硅谷经济成长与社区发展情况，从而为领导层和决策者提供分析基础的年度报告。参考《中关村最新发展指数发布 创新能力有了“晴雨表”》，《北京日报》，2023年2月12日。

⑤ 《“中关村指数”发布：打造中国版“硅谷指数”》，新浪财经官网，2012年9月13日。

全球商务官德尔·克里斯坦森 (Del Christensen) 详细介绍硅谷创新及创新生态系统有关情况, 他认为开放性模式 (人才及思想的自由流动) 是建立全球创新中心最成功的方式。论坛活动除开幕式、主论坛外, 还同步举办四场平行分论坛, 聚焦大数据应用、互联网金融、跨境创业及国际技术转移等前沿热点, 深入研究技术与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①

2017年, 北京市将中关村论坛纳入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点任务, 要求其发挥全球创新资源对接功能, 为海淀区乃至全市创新生态优化提供平台支撑。这一年, 论坛迎来了十岁生日, 在“创新与发展”的永久主题基础上又增加“智能”和“新经济”两个关键词, 此后, “人工智能”成为中关村论坛的常客。在论坛持续释放的创新活力带动下, 十年间, 中关村先后涌现出百度、联想、京东、小米、紫光、滴滴、今日头条等一批世界级领军企业, 上市公司总数达到318家。^②

2018年, 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关村五周年。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北京市明确为中关村论坛的主要承办单位之一, 后设立中关村国际会展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运营机构, 着力探索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办会机制。^③ 这届论坛将主题定为“全球化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而这一主题的提出, 正

是基于中关村深厚的创新底蕴。作为世界知名的“创新名片”, 中关村不断涌现重大创新成果, 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芯片、无人驾驶、高清和液晶显示技术等领域走在国内乃至国际前列, 它正一步步从“中国硅谷”成长为“世界的中关村”。截至2018年, 论坛参会人数已从2013年的3000余人增长至1.2万余人, 累计吸引全球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会者近5万人次, 其中国际参会者占比由10%提升至30%; 促成国际合作项目100余个, 推动技术交易额超40亿元。^④

这场看似静水深流的变革, 实则标志着中关村论坛正从区域创新的策源地, 跃迁为全球科技治理的共建平台——它不再满足于学术研讨和技术展示, 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开放、包容、共通、互鉴的创新共同体, 让中国智慧在人类共同面对的科技命题中, 发出愈发清晰而坚定的声音。

习近平主席的三次致贺

当前,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演进, 创新发展、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中国愿积极参与全球创新合作, 同世界各国共享创新发展成果,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关村正努力打造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和创新高地。举办中关村论坛, 共议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发展趋势, 共商全球创新规则

① 《共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2014中关村论坛年会在京召开》, 今日中国官网, 2014年9月26日。

② 《那些年, 中关村论坛探讨过的“事儿”》, 中关村杂志 (海淀区融媒体中心运营账号), 2025年4月17日。

③ 中关村发展集团课题组编著: 《创新生态集成服务 来自中关村发展集团的探索与实践》, 企业管理出版社, 2024年, 第70-74页。

④ 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已核实。

和创新治理，促进各国共享全球创新思想和发展理念，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研讨、充分交流，增进共识、促进合作，使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于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推动世界科技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2019年习近平主席向中关村论坛致贺信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肺炎疫情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复苏面临严峻挑战，世界各国更加需要加强科技开放合作，通过科技创新共同探索解决重要全球性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共同应对时代挑战，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当今世界，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紧扣人类生产生活提出的新要求。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致力于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协作，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国际科技交流，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网络，共同推进基础研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塑造科技向善理念，完善全球科技治理，更好增进人类福祉。

中关村是中国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论坛是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中国支持中关村开展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为促进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作出新的贡献。

——2021年习近平主席向中关村论坛视频致贺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类要破解共同发展难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中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愿同世界各

国一道，携手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北京要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优势，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持续推进中关村先行先试改革，进一步加快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在前沿技术创新、高精尖产业发展方面奋力走在前列。

——2023年习近平主席向中关村论坛致贺信



2023 年中关村论坛开幕式（林琳供图）

2019年、2021年和2023年，习近平主席三次向中关村论坛致贺，充分肯定其在链接全球创新资源、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中的重要作用。主席对中关村的殷殷期望，不仅关乎一地一区的发展，更深刻体现了党中央对我国科技创新全局的战略擘画与长远谋划。

2019年，中关村论坛规格和层级实现大幅度提升，由国家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会期扩展至三天，共开展30余场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全球科技界的“朋友圈”。

在前沿科技成果展上，多项颠覆性技术惊艳亮相。清华大学展出“水汽发电”技术，通过纳米功能材料自发吸附空气中的水分子，诱导正负电荷分离，从而将无处不在的湿气转化为绿色清

洁能源；国产 C919 飞行模拟机按 1:1 比例完美还原真实驾驶舱，打破国外厂商在该领域的长期垄断，为国产大飞机的飞行员培训与型号研制提供关键技术保障；英特尔中国研究院则带来“有温度”的自适应交互技术，赋予机器人自主学习与逻辑推理的“大脑”，使其能精准识别环境并感知人类习惯，为未来智慧养老等场景提供了充满人文关怀的解决方案。这些来自 10 多个国家、116 家单位的近 170 项科技成果，不仅展示了科技发展的最新风向，彰显了中关村论坛作为全球创新思想交汇高地的蓬勃生机，更为中关村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勾勒出无限可能的未来图景。

2021 年，习近平主席在致贺中明确指出“中关村论坛是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这成为论坛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论坛规格全面升级——国家层面专门成立中关村论坛组委会和执委会，由国务院领导同志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分别担任组委会主任和执委会主任，将主题确定为“智慧·健康·碳中和”，重点在数字经济、生命健康、绿色低碳等前沿领域发力，体现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全球的高度共识以及国家的重大战略^①。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论坛吸引来自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嘉宾，包括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顶尖科学家、著名企业

家、知名投资人等，围绕全球关注的重大科技议题，开展广泛而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成果丰硕的技术交易大会汇集近 3000 项技术交易项目、700 多项国内外新技术新产品，并成功促成 29 个项目现场签约，累计发布百项新技术新产品榜单及金额达 100 亿元的接力科技投资基金。同时，论坛发布第三批 30 项应用场景建设项目清单，并举办国际前沿科技创新大赛，面向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 12 个重点领域征集项目近千个，其中国际化项目来自英国、德国、爱尔兰等多个国家，开启了全球科技创新高端对话与合作的崭新一页。^②

2023 年，论坛进一步突出国家级、前沿性、国际化等特点，主题定为“开放合作·共享未来”，邀请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嘉宾出席，近 200 家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参与，17 位诺奖级嘉宾在内的近 120 位顶尖专家发表演讲，外籍演讲嘉宾占比超 40%。^③55 场平行论坛深入探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清洁能源等全球性议题，凝聚起应对共同挑战的国际共识。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就人工智能热点话题发表观点，他认为，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到来，而这次革命的标志就是人工智能。应对这一新浪潮，拥有先进 AI 技术的国家需要通力协作，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制定规则。^④

论坛上，诸多新晋科技成果的密集发布令人

① 《国新办举行2021中关村论坛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网，2021年9月15日。

② 《应用场景发布、前沿大赛颁奖、技术交易签约……2021中关村论坛举办技术交易暨合作签约活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官网，2021年9月29日；《〈焦点访谈〉解读2021中关村论坛》，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官网，2021年10月9日。

③ 受疫情影响，原定于2022年11月25日至30日举办的中关村论坛改于2023年5月25日至30日举办。

④ 《〈人民日报〉专题报道2023中关村论坛：深化开放合作 共享美好未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官网，2023年6月2日；《2023中关村论坛25日在京启幕》，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官网，2023年5月16日。



永久会址全景（宁葆新供图）

震撼：下一代云化开放无线网络新型空口试验验证平台、30 微米厚度柔性可折叠玻璃、新一代“人造太阳”、深脑成像微型化三光子显微镜……大量原创性、引领性的科技新星闪耀，让美好未来触手可及。^① 全球技术交易生态伙伴大会、世界知名高校技术转移发展大会、中关村论坛技术经理人大会、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联袂登场，如同一座座连接世界的“立交桥”，让技术供需双方精准“牵手”，累计签约 129 个合作项目，签约金额超 810 亿元，每一份创新价值都在这场“全球买、全球卖”的盛会中找到最佳归宿。^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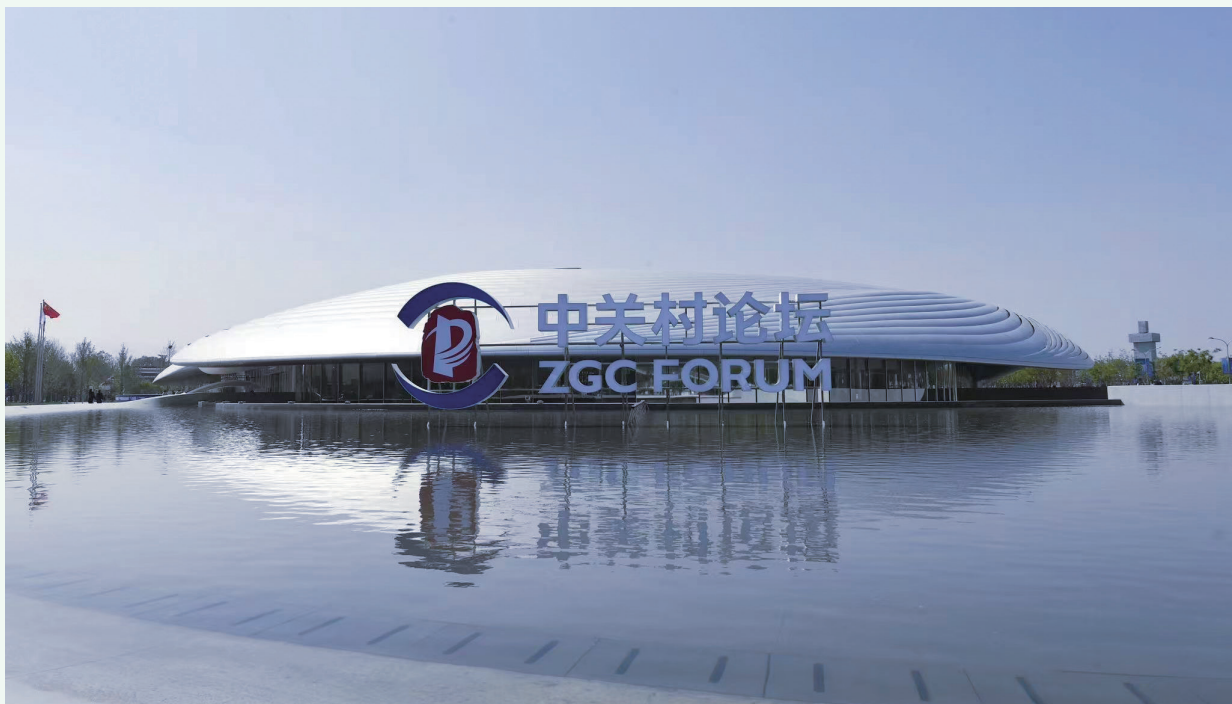
习近平主席的三次致贺为中关村论坛的升级跃迁提供了根本遵循，清晰勾勒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时代脉络。从“共议趋势”到“国家级平台”再到“先行先试”，字里行间传递的开放信号，推动着中关村论坛从区域性创新盛会，蝶变为向世界传递中国科技自立自强决心、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的顶级舞台。

永久会址熠熠新生

当全球创新思想交汇需要空间回响，一座融科技、生态与文脉于一体的地标应运而生。2021 年，北京市委、市政府作出按照“南有博鳌、北有中关村”高标准建设中关村论坛永久会址的重

① 《<人民日报>专题报道2023中关村论坛：深化开放合作 共享美好未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官网，2023年6月2日。

② 《<人民日报>专题报道2023中关村论坛：深化开放合作 共享美好未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官网，2023年6月2日。



永久会址入口（宁葆新供图）

大决策。2022年8月，海淀区启动中关村论坛永久会址项目建设工程。该项目作为市、区两级重点项目，由海国投集团下属子公司与海淀镇合作经济联合社设立的中街（北京）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承建，位于新建宫门路1号，总用地面积60783.76平方米，建设用地面积59099.34平方米。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克服地铁避让、建筑限高等4大限制条件及16项技术难点，创新采用覆土式设计，巧妙融入三山五园历史风貌。2023年，中关村论坛永久会址——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正式亮相，为论坛提供世界一流承载空间。

2024年，论坛首度在刚建成的永久会址隆重举行，围绕“创新：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主题，汇聚100余个国家和地区嘉宾，这一数字是2019年的2倍，外籍致辞嘉宾占比首次超过50%，包括10位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得主及118位中外院士。^①他们共同参与论坛会议、技术交易、成果发布、前沿大赛、配套活动等五大板块128场活动。^②突出前沿探索是这届论坛的一大特点——各方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脑机接口、6G、区块链与隐私计算、空间科学、碳中和等多个前沿热点议题展开分享与研讨，共同创造出一个前沿思想碰撞与交流的“强磁场”。论坛

① 石春晖：《荣耀十八年 中关村论坛的科创蝶变》，《中关村》2025年第3期。

② 《2025岁末年初话创新② | 回望2024中关村论坛：链接全球智慧，共启科技未来》，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官网，2025年1月3日；《从“中国的硅谷”到“世界的中关村”——从2024中关村论坛看科技创新》，人民日报海外网，2024年4月29日。

首次举办“人工智能主题日”活动，精准锚定通用人工智能、可信 AI、医学 AI、6G 与 AI 融合等人工智能产业链重点环节与关键要素，加速赋能北京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高地建设。^①

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大赛首次将“擂台”搭向全球，在北美洲、欧洲、亚洲及中国港澳台地区设立境外赛区，共吸引来自境外 74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80 个项目参与，占比超 40%。论坛首次举办的“科技外交官地方行”创新合作对话会，以及设置的中英、中意、中德、中芬等重点国别技术交易对接会，更像一条条“跨国纽带”，将不同国家的创新资源紧密串联，深入推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和跨国项目交易，让全球创新成果在这里实现“双向奔赴”。^②

2025 年，中关村论坛品牌影响力与规则标准输出呈现强劲拓展态势。论坛以“新质生产力与全球科技合作”为主题，设置五大板块 128 场活动，包括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获得者在内的 1000 余位嘉宾发表精彩演讲。335 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与机构，29 个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252 个国内外高校、304 家创投机构、千余家科研机构和近万

家科技企业参与，164 家境内外媒体的 1756 名记者开展报道，数量均再创新高。^③

论坛国家级平台作用进一步增强，科技部等 12 个国家部委牵头主办 21 场平行论坛，占论坛总数的三分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首次在论坛发布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科技部重磅发布《国家创新指数报告 2024》，工信部启动国家高新区新赛道培育行动，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十条倡议，中国农科院发布 ARC 生物耦合技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支持发布商业航天保险共同体等成果荟萃。^④ 这一系列高规格动作，进一步凸显了中关村论坛作为彰显国家意志、服务发展大局的国家级核心平台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论坛首次大规模组织 130 余台机器人在迎宾、交流、主持、表演等多场景提供服务，机器人科技秀火爆出圈。中关村展示中心常设展集中展示 490 多项前沿科技成果，其中首发首展项目 130 余个，包括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合成生物制造、创新药与高端医疗器械等前沿科技领域。^⑤ 从“炫技”机器人表演到尖端成果展示，中关村论坛生动诠释了北京在培育新质生产力、

① 《中关村论坛“人工智能主题日”官网正式上线！》，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官网，2024年4月18日；《2024 中关村论坛年会“人工智能主题日”成果丰硕》，新华网，2024年4月28日。

② 《新华全媒+ | 2024 中关村论坛年会展现中外科创交流合作新动向》，新华网，2024年4月28日；《国际前沿科技大赛涌现一大批颠覆性技术》，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官网，2024年4月30日；《同世界一道瞰未来——写在2024 中关村论坛闭幕之际》，中央人民政府官网，2024年4月30日；《2025 岁末年初话创新② | 回望2024 中关村论坛：链接全球智慧，共启科技未来》，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官网，2025年1月3日。

③ 《中关村论坛年会成为新技术新产品“首秀场”“试验场”》，千龙网，2025年4月1日。

④ 《2025 中关村论坛年会闭幕 北京科技成果亮眼 | 关注2025 中关村论坛》，北青网，2025年4月1日。

⑤ 《2025 中关村论坛年会闭幕 北京科技成果亮眼 | 关注2025 中关村论坛》，北青网，2025年4月1日。



2026 年主会场入口处的迎宾机器人（林琳供图）



2026 年中关村论坛主题（林琳供图）

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上的雄厚实力。

2026 年，中关村论坛紧扣“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题，精心布局论坛会议、成果发布、技术交易、前沿大赛、配套活动五大板块，百余场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吸引了来自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嘉宾共襄盛举。这届论坛呈现出四大鲜明亮点：一是聚焦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扩围。立足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大局，京津冀三地联手举办协同创新与高质量发展论坛、技术交易成果对接会，重磅发布深化合作的相关政策，合力推进区域创新协同与产业协作，加速“六条重点产业链、五个产业集群”的深度融合发展。二是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赋能。瞄准 6G、脑机接口、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赛道，举办多场专题论坛，深入研讨相关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应用路径。同时，依托前沿科技大赛、技术交易大会等载体，为科技成果转化搭建精准高效的对接平台。三是聚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广泛邀请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及领军企业深度参与，汇聚卓越工程师、青年科技人才等创新主力军，共同探讨以科技发

展和战略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充分激发创新人才的内生动力与活力。四是聚焦高水平科技开放合作。扎实落实双边、多边国际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发布《2025 全球工程前沿》《开放科学国际合作行动计划》，通过举办多场主题论坛活动，推动开放科学国际倡议落地见效。^①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自 2007 年创办以来，中关村论坛已成功举办 17 届，通过前瞻议题设置、资源网络构建、机制创新探索，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科技发展注入思想动力、开辟实践路径，而竞相涌现的创新成果又反哺论坛议题深化，形成“主题引领—实践验证—生态迭代”的良性循环，不仅映照出中国对科技创新规律的深刻把握，更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在全球科技共同体中的广阔胸怀与使命担当。^②

（王鹏系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

① 《2026 中关村论坛年会有何特点？官方回应》，央广网，2026 年 3 月 19 日。

② 《中国科技部：构建全球科技共同体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中国新闻网，2025 年 9 月 21 日。

香山公园的创新举措

李妍

一、引言

2022年8月，教育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①，从思政课到“大思政课”，表面上是一字之差，实质上是办好思政课的理念再更新、视野再开阔和格局再拓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指明了方向——“大思政课”建设必须坚持推动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有效融合，实现育人效能全面提升。

然而，在实践层面，如何将“大思政课”理念真正落地，如何让思政教育“活起来”“实起来”，仍然是许多教育工作者面临的现实挑战。传统的思政课堂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教学方法较为单一，课堂参与度有待提升。一些思政课流于形式，不仅达不到课程目标，更影响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香山公园以中共中央“进京赶

考”重要纪念地为依托，以体育赛事为载体，以科技赋能为手段，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大思政课”实践路径。

二、时代召唤：国家“大思政课”建设的政策演进与实践要求

（一）从“思政课”到“大思政课”：理念的重大跃迁

2022年8月，教育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标志着思政建设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从“思政课”到“大思政课”，蕴含着办学治教理念的深刻变革：视野从“小课堂”拓展到“社会大课堂”，资源从“单一教材”拓展到“全社会资源”，格局从“学校单打独斗”拓展到“全社会协同育人”。

“大思政课”建设的核心要义在于善用社会大课堂，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落实思政实践教学学时学分，组织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教学。这一理念要求思政教育走出教室、走出校园，

^① 教育部等十部门，《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2022年。



中共一大会址（林琳供图）

走进红色场馆、走进田间地头、走进科技前沿、走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二）2025—2026年：政策密集出台的“大思政课”深化期

2025年至2026年，“大思政课”建设进入政策密集出台和加速落地的关键时期。教育部于2025年下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5-2026学年高校思政课课堂教学提升行动的通知》^①，围绕规范集体备课、创新教学方法、完善听课机制、有效数字赋能等方面进行系统部署。《普通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划（2025—2027年）》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任务书和时间表。

各地也纷纷推出各具特色的“大思政课”品牌。北京“中轴线上的大思政课”、浙江“真理的味道”、福建“行见八闽”、湖南“我的韶山行”、广东“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等，把党的创新理论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这些政策与实践的推进，为香山公园探索体育赛事类思政课提供了宏阔的政策空间和坚实的制度支撑。

（三）从“纸上谈兵”到“脚下有路”：实践教学的需求

尽管政策框架日益完善，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大思政课”建设仍面临一些深层次挑战。从教育理念层面看，思政课流于形式的问题依然存在。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有些思政课

^① 教育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5-2026学年高校思政课课堂教学提升行动的通知》（教科厅函〔2025〕10号），2025年。



上海市静安区发布红色研学、城市漫步地图（林琳供图）

“创新不够、质量不高”，“不仅达不到课程目标，更影响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①。从教学方法层面看，许多思政课仍以“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模式为主，教学内容与学生需求贴合度不够、教学方法较为单一。

从资源整合层面看，虽然各地红色资源丰富，但如何将资源转化为系统的、可持续的思政教育资源，如何实现“文物活起来、思政入人心”，仍然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国家文物局、教育部联合推广以革命文物为主题的“大思政课”优质资源项目，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

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践教学将是未来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重点之一”已经成为共识。如何让青少年“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脚下有路、心中有梦”，如何让思政教育从“纸上谈兵”走向“脚下有路”，成为“大思政课”建设必须回答的核

心命题。香山公园的探索，正是对这一命题的积极回应和生动实践。

三、百花齐放：全国各地“大思政课”创新实践的多维审视

（一）场馆融合型：中共一大纪念馆“树德课堂”

上海市黄浦区作为党的诞生地所在区，率先探索将“周一闭馆日”变为“红色课堂日”，依托中共一大纪念馆真实场景推出“树德课堂·红色周一大思政课”^②。这一创新实践将体育课、道德与法治课、语文课、历史课等多门课程搬进纪念馆，实现学科融合与场馆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二）城市行走型：上海静安“漫步红色静安”研学路线

上海静安区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禀赋，创新打造“静安红课堂”品牌，深度研发红色跨学科融合课程，不断推动红色资源与大思政课深度融合。2026年，静安区策划推出六条红色主题精品研学线路，串联起全区20多处红色资源点位，将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嵌入实地研学场景，引导青少年在走访感悟中筑牢国家安全意识^③。

（三）以体育人型：天津理工大学“跑道思政”

在高校领域，“体育+思政”融合育人模式正在蓬勃兴起。天津理工大学自2024年首届基地班成功实践后，将晨跑活动延续至第二届，形成“团队跑+自由跑”“师生共跑+朋辈引领”的成熟机制，成为学校“体育+思政”融合育人

① 吴丹，《如何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人民日报，2026-01-23(1)。

② 任朝霞，《上海黄浦区推出“树德课堂·红色周一大思政课”——到中共一大纪念馆上课》，《中国教育报》，2026-04-16。

③ 《不只在课堂！静安发布6条红色研学路，边逛边筑牢国家安全意识》，《文汇报》，2026-04-14。

的一项常态化实践^①。北京体育大学联合中国教育电视台打造的《体育大思政课》(第二季),以体育实践为切口、以冠军故事为载体、以理论阐释为升华,推动奥运冠军、国家队运动员与思政课教师同台讲述,促进思想性、专业性与传播性的有机统一^②。

(四) 红色研学型:各地“行走的思政课”探索

红色研学是“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各地各校以本土红色资源与历史文脉为教材,把思政课搬到古迹与展馆之间,通过沉浸式体验、互动研讨等方式,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浙江绍兴“名士乡的思政课”以阳明故里、周恩来祖居、鲁迅故里三大实景阵地为依托,实现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③。

(五) 上述模式所面临的瓶颈和挑战。

场馆融合型模式最大的优势在于“真实性”和“专业性”,学生能够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学习,学习材料本身就是第一手史料。但场馆容量有限、课程开发周期长、师资要求高,难以实现大规模、常态化的覆盖。

城市行走型模式的优势在于覆盖面广、可及性强,能够将思政教育融入城市的日常空间。但如何避免“走马观花”式的形式主义,如何确保行走过程中“学”的深度,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

以体育人型模式的优势在于参与门槛低、覆

盖范围广、操作性强,能够实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但如何将体育锻炼与思政内涵真正融为一体,而不是“两张皮”式的简单叠加,是这一模式面临的核心挑战。

红色研学型模式的优势在于主题鲜明、资源丰富、形式灵活。但如何避免“一次性”体验,如何将研学活动系统化、课程化、常态化,是这一模式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

香山公园的创新探索,恰恰是在深刻把握上述模式优势与不足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融合各方之长、独具特色的“大思政课”新路。

四、香山实践:从“进京赶考”乐跑到“赶考·香山”思政课堂

(一) 香山红色资源的深厚底蕴

香山公园作为中共中央“进京赶考”的重要纪念地,拥有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自2019年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开放以来,香山公园已累计接待各界游客1131万人次,开展义务讲解5万余场次,举办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场^④。作为新中国成立主题片区的红色地标之一,香山公园正通过打造北京市“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推动红色文物活化利用与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让革命旧址成为思政课堂,让红色文物成为生动教材。

(二) “进京赶考”乐跑活动的创意缘起

2025年,香山公园首次推出“进京赶考”主题乐跑活动,将“进京赶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① 褚夫晴《这堂“跑道思政”持续升温》,央广网,2025-12-02。

② 北京体育大学《以体铸魂深耕思政——2025年体育大思政建设十大要事》,2026-01-21。

③ 《浙江绍兴“名士乡的思政课”开讲,以城市为学堂传承红色基因》,新华网,2026-04-16。

④ 杨一凡《香山公园举办纪念中共中央进驻香山77周年主题活动》,《海淀报》,2026-04-09。

与全民健身运动创造性结合^①。活动的创意内核在于：通过奔跑的方式，让参与者在身体力行中感悟“赶考”精神的深刻内涵——这种精神既是历史的精神，也是时代的精神；既是对革命先辈的致敬，也是对当代奋斗者的激励。

2025年国庆期间，香山公园推出“红色印记·赶考之路”主题游览路线，以香山革命纪念地八处（旧址）为核心，串联双清别墅、来青轩等重要革命足迹，游客可参与在双清别墅举行的升旗仪式，聆听红色宣教员讲述历史故事，并参加“赶考·香山”主题研学活动，适合青少年家庭在行走中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②。这一实践为后续的乐跑活动积累了宝贵经验。

2026年，活动进一步升级，香山公园推出“千人童心逐光赓续红色血脉——爱我大美海淀·跑遍三山五园之香山站”主题乐跑活动^③。活动以“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脚下有路、心中有梦”为育人目标，将运动健身、红色研学、文化浸润融为一体，打造了一场沉浸式、智慧化的红色思政实践。

（三）北斗科技赋能：从“传统跑步”到“智慧研学”

2026年“北斗乐跑·科普中国”运动激活大脑科学探索活动在香山公园成功举办，标志着香山公园的“大思政课”建设进入了科技赋能的新阶段^④。北斗乐跑竞赛系统的引入，是本次活动最大的技术亮点。亲子家庭手持设备，沿着香山

步道一路前行，每抵达一处打卡点位，系统便自动触发红色故事讲解与趣味知识问答。孩子们在奔跑中完成答题打卡、解锁历史知识点，在沉浸式寻访中感悟“进京赶考”的峥嵘岁月，让红色文化真正入脑入心。

这一技术赋能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将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探索知识。在传统的思政课堂上，学生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知识是“灌进去”的；而在北斗乐跑活动中，学生需要用奔跑去“寻找”知识，用答题去“解锁”知识，这种主动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学习。

更具创新意义的是脑科学可视化测评环节。活动通过专业脑电设备，对参与儿童进行运动前后脑波数据采集与对比分析，测评结果直观显示：运动后孩子专注力、情绪调控、大脑协调性等核心指标均显著提升，以科学数据实证“运动激活大脑、运动促进成长”。这一环节将科技赋能从“工具层面”提升到“效果验证层面”，让思政教育的育人效果有了可量化、可验证的科学依据。^①

（四）历史与现实的链接：以1:1000比例重走长征路

2026年乐跑活动的另一大创新是线路设计的“历史叙事化”。活动以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为参照，将其换算为千米数12500千米，并将赛事路线分为五大主题路线，串联起来的总长度为12.5千米，以1:1000的比例让亲子家庭在奔跑中

① 池梦蕊《红色基因融入劳动教育香山公园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堂”》，人民网-北京频道，2025-04-29。

② 《十一假期香山开启新玩法！推出四条主题游览路线》，千龙网，2025-10-01。

③ 王斌《新春登香山，解锁专属孩子的“赶考之路”与“寻古之旅”》，《北京青年报》，2026-02-14。

④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官网《燃动香山！“北斗乐跑·运动激活大脑”科学探索活动圆满落幕》，2026-04-08。

直观感受长征历程的艰辛与伟大。这一设计将抽象的历史概念转化为具体的身体体验。让参与者既能够感受到长征的不易，又不会因为距离过长而产生畏难情绪。

更重要的是，五大主题路线各有侧重，分别对应长征历史中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精神内涵。参与者在奔跑过程中，不仅是在丈量脚下的土地，更是在重走革命先辈的足迹、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这种“身体参与+精神共鸣”的双重体验，是任何书本学习和课堂讲授都无法替代的。

（五）双清别墅红色文化体验：让革命旧址“活起来”

双清别墅是香山红色文化的核心地标，也是香山公园“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阵地。2025年4月，香山公园联合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在双清别墅举行主题“劳动铸魂·赶考力行”沉浸式爱国主义教育项目，首次将双清别墅东侧平房改造为沉浸式劳动体验区，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主题菜园中，青少年们通过“触、视、听、动、思”五感联动设计，体验蔬菜种植^①。丰富多彩的沉浸式体验项目，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闭环，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感悟革命精神，在亲身体验中厚植爱国情怀。

（六）“赶考·香山”思政课堂：体系化、常态化的思政育人生态

香山公园的“大思政课”探索，并非一次性的活动策划，而是系统化、常态化的制度安排。2026年3月，“香山公园协同育人”计划正式启动，作为该计划核心内容的“赶考·香山”思政课堂同步亮相^②。香山公园联动大中小学，构建

“时时可学、处处能悟”的红色育人生态，让革命旧址成为沉浸式思政教育主阵地。

“赶考·香山”思政课堂以“大思政课”建设为核心，采用“菜单式”课程与预约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全年分四期开展，聚焦大中小院校青少年群体，在八处革命旧址开展现场教学与实景研学活动。公园还首次推出了思政研学地图，清晰标注各研学点位，青少年既可自主参观，也可在宣教员带领下，体验四季特色活动，实现红色教育与实践体验的深度融合。

五、香山模式“体育+科技+红色文化”的独特性与创新性

（一）与传统院校宣教演讲类思政课的根本差异

传统的院校思政教育，尤其是中小学的思政课和爱国主义教育，大多采用“宣教演讲类”模式——在教室里听老师讲革命故事，或者在大礼堂里听报告。这种模式虽然能够系统传递知识，但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知识是单向传递的，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课堂参与度往往不高。革命历史和红色精神被浓缩为文字和图片，学生难以建立与历史的情感连接。传统思政教育的形式以“听”和“看”为主，缺乏“做”的环节，学生的身体参与度和情感投入度都相对有限。

相比之下，香山公园的沉浸式体验类思政课实现根本性的转变：从“教室”到“现场”，从“听讲”到“体验”，从“被动”到“主动”。学生在双清别墅的实景中触摸历史，在奔跑的汗水中感悟精神，在答题的探索中学习知识，在劳动的操作中体验奋斗。这种“全身心参与”的教

① 池梦蕊《红色基因融入劳动教育香山公园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堂”》，人民网-北京频道，2025-04-29。

②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赶考·香山”思政课上线，大中小学生专属研学来了》，北京青年报，2026-03-25。

育模式，让思政教育从入耳走向入脑、入心。

（二）“体育+科技+红色文化”三维融合的创新路径

香山公园“大思政课”模式的核心创新，在于实现“体育+科技+红色文化”的三维深度融合，形成1+1+1>3的协同育人效应。

1. 体育维度：让思政教育“动起来”。香山模式将思政教育与运动健身相结合，让学生在奔跑中学习，在汗水中成长，身体的参与能够加深记忆和理解。团队协作能够培养规则意识和合作精神。

2. 科技维度：让思政教育“智慧化”。北斗乐跑竞赛系统的引入，实现思政教育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自动触发的红色故事讲解、趣味知识问答、积分累计等功能，让学习过程变得像游戏一样有趣。

3. 文化维度：让思政教育“有根魂”。香山公园的红色文化资源是这一模式的“魂”。双清别墅的红色历史、八处革命旧址的文物遗存、“进京赶考”的精神内涵，构成香山模式的独特文化基因。这种根植于真实历史场景的思政教育，具有任何虚拟场景都无法替代的“真实感”和“厚重感”。

“体育+科技+红色文化”的三维融合，让香山模式在形式上有创新、在内容上有深度、在效果上有保障，形成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素质教育新模式。

（三）“行走的思政课”与“大思政课”要求的高度契合

香山公园的实践，与“大思政课”建设的核心要求高度契合。

在“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方面，香山模式将思政教育从教室搬到革命旧址、

从书本移到实景体验，实现“课堂”与“社会”的无缝对接。在“善用社会大课堂”方面，香山公园充分调动红色文化资源、科技资源、体育资源等全社会力量，形成协同育人的合力。从与海淀学区的校地合作，到与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的技术合作，再到与多所大中小学的课程共建，香山模式体现了“大思政课”开放、协同、融合的特质。

在“打造实践育人大课堂”方面，香山模式以实景奔跑、实景研学、实景感悟为主要形式，让青少年在“做中学、学中悟”。这种实践导向的教育方式，与教育部提出的“增加实践教学比重”“推动实践教学深入开展”等要求高度一致。

在“运用技术赋能活化思政实践教学场景”方面，香山模式的北斗科技应用走在了全国前列。教育部明确要求“推动数智赋能思政实践教学”，香山公园以北斗乐跑竞赛系统为载体的实践探索，正是对这一要求的积极响应和先行先试。

六、香山模式的推广价值与实践启示

（一）从“香山经验”到“全国样本”：可复制性的思考

香山公园的“大思政课”模式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其核心经验和做法具有一定的可复制性和推广价值。

一是“红色资源+体育赛事”的模式可复制。全国各地都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如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以及各地的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等。这些红色资源都可以借鉴香山模式，将红色文化教育与全民健身运动相结合，打造各具特色的“红色乐跑”活动。

二是“科技赋能思政教育”的思路可借鉴。北斗乐跑竞赛系统的应用证明，科技可以成为思政教育的“放大器”和“催化剂”。各地可以依

托当地的科技资源,开发具有本地特色的“智慧思政”项目,如AR/VR沉浸式体验、AI辅助学习、大数据效果评估等。

三是“校地协同育人”的机制可推广。香山公园与海淀学区的合作模式表明,学校与红色场馆的深度合作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各地可以推动建立类似的校地协同机制,让红色场馆成为学校思政教育的“第二课堂”,让学校成为红色场馆教育功能的“延伸触角”。

当然,香山模式的复制也需要因地制宜。各地在借鉴香山经验时,应当立足本地红色资源的禀赋特点,进行本土化的创新和调适,切忌“照搬照抄”。

(二) 对全国“大思政课”建设的启示

香山模式的探索,为全国“大思政课”建设提供了若干有益的启示。

启示一:走出教室、走向现场。传统的“小课堂”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大思政课”的精髓在于“大”——大资源、大空间、大格局。香山模式证明,当思政教育走出教室、走进历史现场,其育人效果会有质的飞跃。

启示二:“入脑入心”。有些思政课流于形式,学生听完了就忘了,没有真正入脑入心。香山模式通过身体参与、沉浸体验、互动探索,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中浸润学生心灵,实现了从“知道”到“感悟”的跃升。

启示三:与时代同频、与科技共振。“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香山模式以北斗科技为支撑,将红色教育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体现了思政教育与时俱进的时代气息。

启示四:构建“时时可学、处处能悟”的育人生态。香山公园通过系列研讨,将思政教育从

“一次性活动”升级为“持续性生态”,为“大思政课”的常态化、长效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

香山公园“进京赶考”乐跑活动的探索实践,生动诠释了“大思政课”建设的核心要义。从2025年的初创到2026年的升级,从单纯的红色研学活动到“体育+科技+红色文化”三维融合的沉浸式智慧思政体验,香山模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思政教育创新之路。

在这条路上,青少年不再是坐在教室里被动听讲的“听课人”,而是奔跑在革命旧址中主动探索的“体验者”。他们在双清别墅的实景中触摸历史的温度,在北斗科技的辅助下叩开知识的大门,在挥洒汗水的奔跑中感悟“赶考”精神的深刻内涵。公园正通过打造北京市“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推动红色文物活化利用与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让革命旧址成为思政课堂,让红色文物成为生动教材,助力青少年在实景体验中感悟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大思政课”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不懈努力。香山公园的探索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将有更多的地方、更多的学校、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到“大思政课”的建设中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思政教育真正走出教室、走向社会,当青少年真正在行走中感悟、在体验中成长,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就一定能够更好地实现,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就一定能够茁壮成长。

“赶考”永远在路上。香山公园的“大思政课”探索,也将在这条“赶考”路上不断深化、不断升华,为培养“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脚下有路、心中有梦”的新时代青少年贡献香山力量、书写香山篇章。

(作者系香山公园管理处人员)

海淀皂甲屯：清末商绅李春圃的传奇崛起

高建军

清末，海淀区皂甲屯村因一位民间商绅的崛起，书写了一段别样的传奇，这位商绅便是李春圃——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木材商人李光昭的原型。

在皂甲屯村东西向主街路南有一座很大的清代宅院及花园，这座宅院的主人是清末皂甲屯村人李春圃。李春圃自幼丧父，母子二人靠烙烧饼糊口，家境非常贫困。李春圃18岁时，亲戚托人把他送入北京城里木材厂当学徒。李春圃年龄小，但很有灵性，木工活一看就明白，也会设计，一来二去，就成了木器厂的业务骨干。

几年后，李春圃同别人合伙，在护国寺西口路北开办了一家木厂，铺号为森昌木厂。那几年李春圃结识了清宫内务府管工程的官员，承揽了不少皇家工程，他还跟庆王府上的管家挂上了关系，打着庆王府的招牌，也承揽了不少公家建筑工程。十几年的时间，森昌木厂誉满京城，生意越做越大，并且发了大财。



2023年的皂甲屯村主街（作者供图）

光绪二十八年（1902）慈禧下令重修颐和园“贵寿无极”建筑。负责此次承修的大臣是慈禧太后的宠臣世续和继祿，工程监督官员有户部郎中成和、方培鑫等，修缮工程通过招商的方式由森昌（此时由李春圃之子继承）、天德木厂承修，

贵寿无极与听鹂馆、山色湖光共一楼三处的承修工程共耗银四万三千二十六两五钱。

李春圃发迹以后，在西四牌楼北大街报子胡同（今西四北三条）修建了一座多进式四合院，做为李春圃在京城住宅。

他又在家乡皂甲屯村街中大路南，分别给两个儿子并排建造了东、西两座一进四合院。两座四合院格局一样，共用一个大门出入，两院之间有5米宽的甬道相隔。大门为歇山大式筒瓦门楼，进门迎面砖砌雕花纹影壁一座。折而西有屏门四扇，前院建倒座南房四间，院落宽阔，种植树木两棵。正北建大式垂花门一座，东西各出抄手廊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正北建歇山顶筒瓦北房五间，东西各出稍间一，正厅前廊后厦，非常宽阔，北房正厅中间为会见宾客之处，东西次间，一为主人书房，一为藏书室，西稍间为寝居室，东稍间为卫生间。大门外放置上马石两方，门楼外对面，建整砖到顶悬山式一字影壁一座。

后院北房后面建了一排坡子房（房子只有前坡顶），用来当花房，房中一年四季培植名贵花卉。在东侧四合院南墙外面，有一眼自流井，为院中的生活饮水，水质甘甜，一年四季不枯不冻。

四合院大门外南侧建一所花园，花园建东西粉墙一道，中开月亮门，进月门见园之东南隅建单檐四角方亭一座，四周散置峰石，园西墙建园房三间，园中广植果木，每至春夏，郁郁丛丛，青绿一片。

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春圃去世后，李家在皂甲屯村宅院外西南角建造了五间祠堂，为歇山起脊筒瓦顶。祠堂内正间供桌上，摆放着硬木雕制精细神龛一个，龛内供奉李家祖宗牌位。

李春圃家这两所四合院在土改时，改成皂甲屯村小学校，小学校后来迁新址，这里成为大杂

院，出租开设工厂。

现在东院的西厢房、西院的东厢房和大门楼已经被拆除。花园处也成为了民居，只有门楼外两棵高大国槐，仍叶茂枝繁，成为李春圃发迹、修建此宅的历史实物见证。

据传光绪六年（1880），凤凰岭龙泉寺住持僧崇祯，将龙泉寺山门外的两棵巨柏卖给李春圃的森昌木器厂，木器厂派人来伐树，发现这两株巨柏一夜之间扭曲了丝纹，无法锯成板材，李春圃认为自己触犯了神灵，自己筹资重修了山门殿。从此这两株柏树被称为“神柏”。



神柏（作者供图）

邓之诚：穿越史海的思想灯塔

祁建



邓之诚像（宁葆新供图）

邓之诚，字文如，号明斋、五石斋，祖籍江苏江宁，生于1887年。童年的他沉浸在小镇私塾朗朗的书声里。长大后，他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和昆明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文科毕业后，

转身成为《滇报》编辑。那时的他满怀热血与激情，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护国军运动等时代浪潮中，以文字为武器为理想而战。后来，他踏上了教育的神圣殿堂，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多所名校任教，成为众多学子心中的“灯塔”，照亮他们在史学海洋中前行的道路。

邓之诚治学严谨得近乎苛刻，每一个历史细节都不放过。他的著作堪称经典，每一部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见解。《中华二千年史》，这部凝聚着他无数心血的巨作，是由邓之诚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的《中国通史讲义》上、中两卷精心改编而成，后来更是凭借其卓越的学术价值，成功入选《大学丛书》。在这部著作中，他以细腻的笔触将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朝代的兴衰更迭、人物的悲欢离合，都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仿佛穿越时空，呈现在读者眼前。

《骨董琐记全编》则像是一个装满历史珍宝的神秘宝盒。书中杂糅了明清两代的朝章典故、里巷杂谈，每一个故事都串联起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文景观。邓之诚用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深



厚的学识，将这些看似零散的历史碎片拼凑成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古老的年代，亲身感受着历史的温度。

而《清诗纪事初编》更像是一部清代诗人的“群英谱”。邓之诚精心收录了大量清代诗人的诗作和事迹，为后人研究清代文学和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邓之诚通过对这些诗作的解读和分析，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清代社会和文化的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文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百态。

他还是史学教育界的“泰山北斗”，培养了一大批在文史考古领域光芒四射的杰出人才。黄现璠、王重民、朱士嘉、谭其骧、王钟翰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他的课堂，仿佛有一股神奇的魔力，能将枯燥的历史知识变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他用充满激情的讲述，带着学生们穿越时空的隧道，领略历史的波澜壮阔。学生们沉浸在历史的奇妙世界中，如痴如醉。

逐梦史学：从私塾少年到热血青年

大概在1900年，邓之诚跟着父亲去了云南，一头扎进六代史的浩瀚海洋。在这片知识的汪洋里，他穿梭于朝代更迭的波涛、人物兴衰的漩涡中。这段时光，为他的史学大厦打下了无比坚实的地基，每一块“基石”都饱含着他对历史的热爱与执着。

求学岁月里，邓之诚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和云南两级师范学堂，近乎疯狂地吸收知识的甘霖。教室里，阳光倾泻而下，他坐在窗边，时而奋笔疾书，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像在演奏一首知识的交响曲；时而托腮沉思，目光深邃，仿佛穿越时空，与历史名人促膝长谈。下课后，他和同学们在花香四溢的花园里讨论学术，你一言我一语，碰撞着思想的火花。

毕业后，邓之诚成了滇报社编辑。报社在繁华市区，车水马龙。他的办公室虽小，却堆满了书和文稿，像座宝藏。夜晚，昏黄的油灯下，他全神贯注地写作，满怀热血，立志用文字划破黑暗，为那风雨飘摇的时代带来希望之光。

1910年，他又兼任昆明第一中学史地教员。站在讲台上的他，仿佛是历史的“魔法使者”，轻轻一挥手，就把对历史的热爱像星星一样洒进学生们的心里。校园里绿树成荫，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回荡在操场上。他的课堂活力满满，学生们的眼睛紧紧盯着他，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他用生动的语言描绘历史画卷，带着学生们穿越时空，领略历史的波澜壮阔。

武昌起义的号角吹响，如同天边的惊雷。邓之诚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在报社拼命宣传革命。他的文字像一阵狂风，有力地推动着时代变革的浪潮滚滚向前。

学术风云：坚守传统与迎接挑战

1917年，邓之诚迈进北京大学的校门，他还兼任教育部国史编纂处的工作，办公室里满是古籍文献，墨香萦绕。

在北大的课堂上，他带领学生们在历史的海洋中遨游。他声音洪亮地说：“历史者，所以明人群之进化，为国家之精神所寄也。”让历史画卷在学生们眼前徐徐展开，讲到精彩处，他眼神放光，手舞足蹈，那感染力简直能把学生们都“卷”进历史。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一会儿为历史的辉煌惊叹，一会儿为历史的沧桑感慨，课堂气氛热烈得像“燃烧”。

但是学术之路哪有一帆风顺？新史学思潮如海啸般袭来，一些激进学者盲目推崇西方史学，对邓之诚等坚守传统史学的人发起猛攻。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上，一个激进学者气势汹汹地指责邓

之诚。邓之诚则面色沉稳，目光坚定，大声反驳：

“传统史学是咱中国千年智慧的结晶，像那深埋地下千年的美酒，越陈越香，是民族的根脉，绝不能丢！我们要在传承中创新，不能数典忘祖！”

为坚守传统的学者照亮了方向。

随着时间推移，邓之诚在多所高校任教，声誉传遍学界。1930年，他来到燕京大学，这里的校园如宁静的花园。他的课堂充满活力，鼓励学生探索求知。他像一位智慧的领航员，带着学生在历史的海洋里乘风破浪。

信念如磐：牢狱磨难与精神传承

然而，平静的生活被战争打破。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的铁蹄踏破了燕京大学的宁静。邓之诚和一些学者因坚守信念，被日军逮捕入狱。监狱里，环境恶劣得像地狱，牢房狭小阴暗，老鼠乱窜。但邓之诚毫不屈服，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和威逼利诱，他坚硬如铁。敌人审讯时，他怒吼：“历史之正义，如日月高悬，容不得你们这些宵小玷污！”那声音，震得牢房墙壁都在颤抖。

敌人安排亲日文人对他辩论，试图从思想上击垮他。那些亲日文人对他恶语相向。邓之诚强忍着伤痛，义正辞严地反驳：“历史是公正的，你们这些卖国贼终将被历史唾弃！”在这场思想交锋中，他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在漫长的囚禁日子里，邓之诚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夜晚，他躺在冰冷的石板床上，在脑海中反复梳理历史，坚信历史的智慧是永恒的珍宝。他像黑暗中的灯塔，等待着黎明。

1942年，邓之诚终于重获自由。走出监狱的那一刻，尽管他身体虚弱，但精神如钢铁般坚韧，目光坚定而炽热。他知道，自己的使命还在继续。

1946年，燕京大学复校，校园充满生机。邓

之诚回到心爱的校园，站在讲台上，看着学生们充满期待的脸庞，心中满是感慨。他带着更饱满的热情投入教学和研究，像一位勤劳的农夫，在知识的田野里辛勤耕耘。

1952年，邓之诚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专任明清史研究导师。他虽已是学界前辈，却依旧谦虚勤奋。他对明清史研究深入，见解独特，还为新中国史学发展积极出谋划策。

邓之诚在学术上成就斐然。他研究宋史，让宋代历史鲜活起来；在清史研究上，开创以诗文治清史的先河，为史学研究注入新活力。

但他的学术观点并非人人认同。面对质疑，他耐心解释，用成果证明。他在教育上也是大师，培养了众多优秀学子。

1960年1月6日，时光的指针仿佛在此刻沉重地顿了一下，邓之诚，这位在中国史学界举足轻重、光芒万丈的泰斗，在历经了波澜壮阔的一生后，缓缓合上了双眼，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邓之诚的离去，对学界而言，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损失。他曾像一座灯塔，长久照亮着史学研究的漫漫征途，如今灯塔熄灭，留下的是无尽的悲痛与怀念。

然而，邓之诚虽然离开了，但他留下的宝贵财富却如同璀璨星辰，永远闪耀在中国史学的天空。他的学术著作，一部部都是心血的结晶，《中华二千年史》《清诗纪事初编》《骨董琐记全编》如同坚实的基石，支撑起中国史学研究的大厦，为后来的学者们提供了无尽的启示和借鉴。

邓之诚虽然已经远去，但他的名字和他所留下的一切，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史学的史册上。他的学术著作和教育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激励着后学们不断追求真理，勇攀史学研究的高峰，继续书写中国史学的辉煌篇章。

文人王国维与颐和园

王 忠



王国维像（林琳供图）

王国维、字静安，亦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王国维才华

横溢，被称为我国近代“国学泰斗”和“一代大师”。1927年初夏，端午节的前两天，他步出北京清华园，坐黄包车来到颐和园，购票入内，径直到佛香阁排云殿下的昆明湖。他漫步过长廊，开始在石舫前兀坐沉思约半个小时，然后进入鱼藻轩，点燃了纸烟，慢慢抽了一支。掐灭烟头后王国维就从鱼藻轩的石阶上纵身跃入湖中。

此时大约是十一时左右，距鱼藻轩十几米处正好有一个清道夫，见有人跳水，即刻奔来跳入水中救其上岸，前后不超过两分钟时间。王国维并未呛水，背后的衣服都未浸湿，但由于水浅，湖底都是淤泥，国维死志坚决，入水时用力并头先触底，口鼻都为淤泥所塞窒息。

清华大学这边，王国维的家人见他不回来吃午饭也未引起重视，因为那几天正逢期末校内应酬较多。到了下午三点还不见王国维的影子，家人着急了，电话催问也无确切答复。三儿子王贞明正好从燕京大学回家吃午饭，见父还未回家，他就外出寻找。他听一人力车夫说父亲上午是坐了35号车去了颐和园，顿感事情蹊跷，马上就叫了一辆人力车直奔颐和园。路上碰上35号人

力车，车上坐一巡警，由于人力车夫间认识，便停了下来，巡警问清了王贞明的身份，马上就将其领至颐和园，王贞明到颐和园看明尸体，然后去警察局立案。由于要等法医，故不能翻看尸体。

消息传到清华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校方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此事。八时多由校长曹元祥、教务长梅贻琦亲自带队，教职员、学生等二十多人赶赴颐和园。由于北京那时政治空气紧张，晚上戒严，颐和园守兵不许师生入内。经反复交涉，只许校长、教务长等人入内，众人只能返回。学校当夜组织治丧委员会，由教务长梅贻琦任主席。

第二天治丧委员会发讣告，组织众人前往颐和园。这时王国维的遗体仍放在鱼藻轩亭子的地上，上面覆一破席，四周用砖压着，景象煞为不忍，观者人人呈惨淡之色。移开草席，哭声大恸，死者面目紫胀，四肢蜷曲，匍匐在地，惨不忍睹。天气已渐渐趋热，法医不来尸体不能翻动更不能入殓。下午四点法医才到。验尸时发现衣袋中有遗嘱一张。验尸后尸体被抬至颐和园西北角的三间空屋，由校医梳洗后入殓。

晚九时棺柩运往清华园，黑暗中扶柩队伍一路缓行一小时，夜里十一时半才到达清华园。

王国维的死，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了清华园，震动了学术界，震撼了神州大地，人们为失去一位“通方知类”“十斗之才有八斗”的国学大师而惋惜，同时对他溺水而死的举动众说纷纭。从王国维衣兜里发现遗书上面写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看来，他是经受不了“世变”给他带来的“辱”而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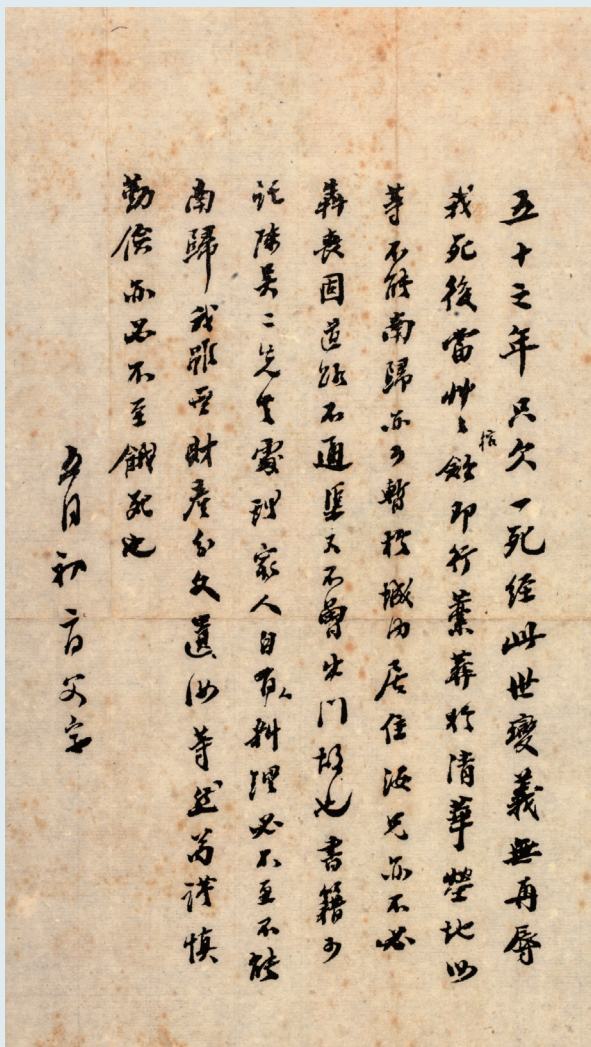
王国维经了哪些“世变”呢？当时，最大之“国事”，最要之“时变”，就是举世瞩目的北伐战争。当时在京的许多知识分子，其中包括王

国维、吴宓等，既厌恶“气数”已尽的军阀，又惧怕北伐军打进北京，与盘踞北京的张作霖军队大战，怕乱军进入清华园烧杀抢掠。另一件更使王国维忧虑的事情，就是梁启超所谓“恐怕北方不久也要学湖南”，这是指湖南农民运动，在运动中杀了一个“学问甚好”的学者叶德辉。叶德辉是留日学者，是因写诗词侮辱农民运动而被处死的。

王国维是清朝“遗老”，做过清朝南书房行走，当过溥仪的老师，写过对慈禧太后歌功颂德的《颐和园词》，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于刚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孤忠之心，哀痛不已，“安得不与之共命而自尽”，诚如他的老友陈寅恪所言：“凡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心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程度愈宏，则其所受苦痛亦愈甚，迨即达极深之度，殆非先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不料，1926年7月26日，王国维的大儿子潜明在上海英年病亡，年仅27岁。儿子的早逝，给将届“五十之年”的王国维及其家人带来的巨大悲痛，是难以用语言表述的。当时王国维的儿媳罗孝纯年仅24岁，她与潜明结婚已8年。

王国维在沪借债办理了潜明的丧事（包括购墓地）。丧事完后，王国维的亲家罗振玉一声不响将女儿罗孝纯带回了天津。之后，王国维把死去儿子的三千元寄给罗振玉，不料，被罗氏退了回来，并说他还能养活起自己的女儿。再寄，再退，三寄三退，并在信中用偏激之语刺激王国维。几十年的挚友和亲家需要互相安慰的时候非但没有精神支持，反而裂痕突现，他们大概是三天一信，六天一往返，历时20天，往来书信七通。书信的抬头称呼变了，罗氏将原来的“雪



王国维遗书（林琳供图）

堂亲家”之尊，改为“静公”，去掉了“亲家”二字；书信中的口吻也变了，特别是罗氏咄咄逼人，他对王国维信中的“圣人之教”“蔑视他人人格”“我辈皆老”等词语十分不满，在信中说王是“轻礼重财”，说：“死者尸骨未寒，此款迟早均可往取，何必亟亟？”，说自己是“博爱”的墨家，而王是“自爱”的杨朱，还翻出了王国维早年上海《时务报》馆“抑郁不自聊”的老账，取他诗中“豫章生七年，在染不成株”之句加以挖苦。王国维虽气愤，但仍能珍惜友情，笃

守信义，给罗氏写了回信。

半年之后，罗氏听到王国维去世的噩耗，立刻赴京为之经纪丧事，后又在津为之刊印遗书。晚年，罗氏对儿辈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五十之年”的王国维，经此种种“世变”，深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难以实现，不愿受辱，便走向绝路，蹈水自尽了。

王国维的自沉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有形势的、家庭的、友人的、健康的、理想与现实矛盾等等，生活在社会上的人不可能不受社会环境等因素制约，王国维也不例外。

王国维走了，但他的著述，他的学说犹存，他的治学精神将永放光芒！

更正

第111期，第21页右侧第二行末尾“这就证李家……”，应为“这证明李家……”；同页同侧倒数第四行“1942年2月……”，应为“1949年2月……”；

第67页左侧第二行“……三十匀生日……”，应为“……三十岁生日……”；

第79页右侧倒5行“明正統十四年（1436）”应为“明正統十四年（1449）”。

特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川北圣人”——张澜在颐和园

唐 润



张澜像（宁葆新供图）

张澜（1872—1955），四川南充人。字表方，清末秀才。他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同盟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被国人称之为“世纪老人”“民主斗士”，他为从愚昧的封建专制向文明科学民主奋斗毕生。他有过传奇般的人生际遇。辛亥革命前参加立宪派，而后，任川汉铁路股东大会董事长、成都大学校长、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抗日期间，被聘为参政会参政员。他积极参加抗日民族运动，坚决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和行为。抗战胜利后，他对蒋介石发动内战、镇压民主革命运动的反革命罪行予无情地揭露，支持并援助爱国学生、爱国民主人士并以各种方式批判、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言行，千方百计保护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大批党员和进步学生。解放前夕，因拒绝参加国民党召开的代表大会，张澜被蒋介石囚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后经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周恩来亲自指挥，在上海地下党的竭力营救下，才把张澜和罗隆基救出，免遭沉江之噩。1949年5月29日，上海解放，陈毅代表党中央亲往张澜的秘密住处拜访，转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

问候。

张澜很早就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有过密切的交往，同毛泽东心心相印。他的一生光明磊落、刚直不阿，为追求真理，寻求民主和民族解放奔走呼号。几十年来，他一直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在我党和广大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人们称为“川北圣人”，被毛泽东称之“表老”。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49年6月1日，即上海解放的第三天，毛泽东主席就代表党中央及他本人致电时居上海的张澜。电文中说：“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受毛泽东的邀请，张澜等民主同盟代表，在周恩来精心关怀和安排下，于6月24日顺利到达北平站。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沈钧儒、郭沫若等党、政、军、民代表到站迎接。朱德头一个迎上去，没等张老伸手，已挺身立正，敬了一个至高至重的军礼说：“老师，您好！”

张老连忙拉住朱德的手说：“玉阶呀，你现在是解放军总司令，我这个过去的老师可担当不起啊！”朱德笑着说：“一日受教，终身为师。老师万万不能不认我这个学生呀！”两个人的对话，引得在场的人笑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投去敬慕的目光。然后，张澜一行人被送到北京饭店暂住下来。不久，毛泽东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了张澜等人，就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后来，张澜及家属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下，由北京饭店移居颐和园听鹂馆后的一所院子中休养将近三个月。时间虽说不长，却给我们留



颐和园听鹂馆（宁葆新供图）

下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一天夜晚，风雨大作，张老正在客厅里看报，忽然听到敲门和呼叫老师的声音。拉开门一看，原来是朱德来拜访他，这让张老非常感动，他赶紧将朱德拉进屋，说：“这么大的雨还来看我，快坐！快坐！”朱德见到当年的老师如回到了家一般，开口就问：“恩来给您找的房子看中了没有？”

张老真诚地回答说：“太大，又太好，退了，我要了另一处一栋小楼。”

朱德责怪起老师来：“照顾您，是我和恩来商量的。您啊……”

张老笑着接过话说：“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新社会要建设，许多地方都需要钱呀！省下钱多搞点建设，发展经济更重要。”

朱德听了老师的话非常佩服，心想难怪是“川北圣人”，他怀着无限的敬意向老师点了点头。

这时外面的风雨慢慢地停了下来，张老觉得时间不早了，便催着朱德快回城休息。朱德临出屋对老师说：“老师，您多保重身体，好好休养。过几日我再来看您！”说完，就大步下了山坡。张老站在房外，深情的目送着他的学生渐渐远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入口

(林琳供图)



北平各界群众在热烈庆祝会议召开

(林琳供图)

青山碧绿、玉泉滴翠、金粉楼台、苍松翠柏、曲廊回合的颐和园，如仙境一般，这对于一位多年来奔走革命、过度劳累、体弱年高的张老来说，确实是一处休养生息、愉悦心情、有益健康的地方。张老自青年时期从日本留学归来，还未曾如此休闲、惬意。一天清晨，朝霞映着湖水，波光粼粼，宛如无数银蛇飞舞，花木扶疏，百鸟啼转。张老在女儿搀扶下从住处顺着山坡，信步往平地走来。忽然，听到一群小孩雅气十足、银铃般的歌声和笑声，张老不由得意兴大发，神采奕奕，循声来到孩子们身边，才知道这些可爱天真的小朋友正在扭秧歌，又蹦又跳又笑的，快活极了。小朋友们玩得正兴高采烈，突然看见来了一位长着大胡子的老爷爷，立刻蜂拥上来，围着一位长着大胡子的老爷爷扭跳起来。

张老看着小朋友们幸福、快乐的样子，也被孩子所感染，竟忘了自己已是七十七岁高龄的老人，举起手杖合着节拍，一顿一顿的、一扭一弯地“跳”将起来，乐得张老的女儿在一旁掩嘴大笑！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当毛主席走上讲台郑重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时候，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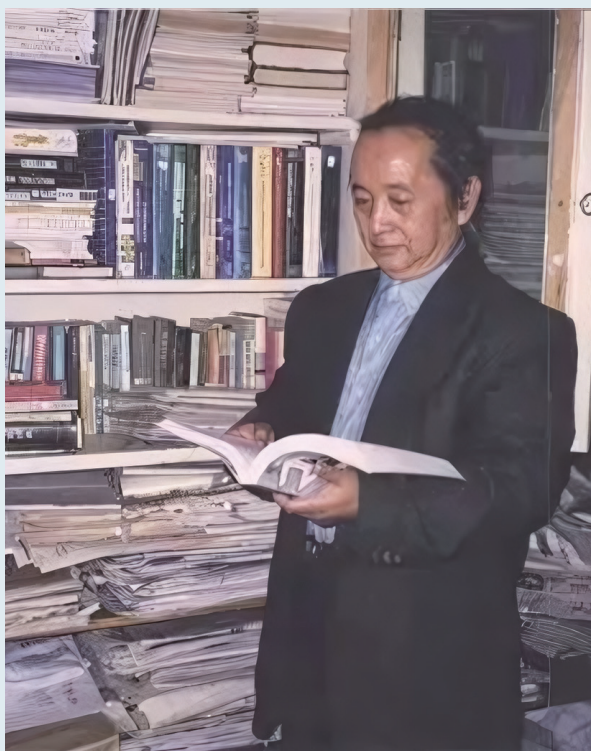
会代表掌声雷动，欢呼雀跃，经久不息，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张老也同大家一样，那种快乐、高兴、荣耀的劲儿难以言表。会上，他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的身份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他讲道：“革命难、建设亦不易……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之下，精诚团结，共享勉励，以完成这个建设新中国新社会的历史使命”时，全体代表长时间热烈鼓掌。

散会后，张老在工作人员搀扶和众多代表簇拥下走出会场，满怀兴奋地坐上了专车往回走。坐在车里，他忽然觉得车去的方向不对，急忙问身边陪同人员。他们神秘地说：“没错，一会儿您就知道了。”说话间，车停在了一栋小楼前，张老还在疑惑不解时，车门打开了，一下子看到家人正在小楼门口迎接他呢！这时，他才恍然大悟道：“啊！这就是周恩来依我的要求给我安排好的家啊！”他下车后没有急着进楼，而是站在小楼前仔细打量一番，满意地笑了，连声说：“好！好！然后，他在亲人们的簇拥和搀扶下，兴高采烈地走进了楼房。

共和国的高层领导对老朋友们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啊！

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小传

李国珩



陈春先在家中工作（林琳供图）

陈春先是一名共产党员，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他自改革开放以来对科技界改革的建议和

身体力行创办民营科技公司，对科研体制的改革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北京市海淀区志（1996—2010）》称其为“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的开拓者”。他古稀之年辞世，被北京市海淀区内各界公认为“中关村第一人”。2006年6月21日，他被海淀区评选为2005年“海淀创新特殊贡献人物”。

现在“中关村”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科技创新高地。陈春先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实至名归。研究陈春先对中关村的贡献就显得十分必要。

笔者阅读了大量有关资料，本着拾遗补缺的初衷，不揣浅陋。尽可能系统地研究这位“先驱者”的一生，笔述如下。

陈春先，1934年8月6日出生于南京。其父陈之长时为中央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在四川成都读高中（成都于1949年12月27日解放）。1951年，他考入四川大学物理系。

那时在刚解放的城市，我们党注意在学校（包括中学和大学）发展思想进步、品学兼优的学生入党。

1952年10月，陈春先被吸收入党。此时赶上国家要大规模派出学生到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留学。据教育部档案记载：从1950年到1965年国家共派出7955人到苏联学习。陈春先被选中，并于1952年先到北京留苏学生预备部（根据1951年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示：办留苏预备部而设）学习。从1952年开始，统一学习一年，主要内容是俄语和政治理论课。他于1953年10月去苏联乌拉尔大学学习地球物理探矿专业。后于1956年转入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学习，师从玻哥留博夫教授，完成理论物理等课程，并在超导理论、多体问题等领域做出了成果，在苏联《实验和理论物理》杂志发表了6篇论文。毕业时，导师曾想留他做研究生未果。

留学期间，他听过毛主席第二次访问苏联时对中国留学生的讲话（1957年11月17日）：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是最讲认真……”

他毕业时曾代表留学生讲话。还受到当时苏联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接见。（因赫鲁晓夫的女儿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读书，托她请来）。他是在留学期间见到中、苏两位国家领导人的学生。

1959年6月，陈春先毕业回国，先是被分配到国防科委搞原子弹工程研究。中国科学院的物理所党委委员孟宪振^①得知后，闯入时任国防部

长兼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军事工程院、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的办公室，提出将陈春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理论室。这样，陈春先又到了中国科学院物理所。

二

陈春先从1959年6月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到1986年主动辞职离开。先后在此工作了27年。他从助理研究员被破格提拔为正高级研究员。先后任研究室课题组长、室主任、学术秘书和研究所专职技术副所长，在党内担任过支部书记等职务。

他在中科院工作的27年分为两个阶段。

从1959年6月至1980年的21年中，主要是从事物理学科的研究工作。

从1980年下半年至1986年的6年，则主要做“技术扩散”的工作。

分述如下：

（一）1959年6月，他在物理所七室（固体理论室）工作。刚参加工作不久的12月，国防科委主任让中国科学院指派物理所陈春先和郝柏林二人去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参与高分子半导体大会战（是绝密任务）。至1960年1月6日完成任务后参与十室（高分子半导体室）工作。

1960年冬，陈春先与陈世刚、霍祝平、郝柏林自发组成研究物理学基本问题的学习小组，于淥于1961年也参加进来。国内物理学界对此戏称“陈春先学派”。后来，除陈春先外，其余4人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春先在物理所先后成为从事理论物理、激光理论、有机半导体、等离子体受控核聚变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带头人。

^① 孟宪振（1931—1967）时任物理所党委委员，孟昭英之子。

物理学的研究需要一些必要的实验设备、仪器，也需要自制一些设备仪器。他与中科院北京器材供应站的联系较多。购买设备、仪器、材料花钱不少，失误难免。因此，他又被戏称“天才的败家子”“败家子作风”。

1966年夏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陈春先因曾在苏联留学期间受赫鲁晓夫的接见而受到影响。一些工作被排斥在外，他也乐得成为逍遥派，乐得有时间、精力研究课题。

受大形势的影响，陈春先被下放到安徽中科院“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1年，与计算所的毕慰萱结婚。

1972年，陈春先结束了干校的劳动锻炼，回到北京。这时，所内正常的研究工作逐渐恢复。他从一份国外的资料上看到，1968年苏联核聚变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美、英国认为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高端技术研究成果。

这项研究成果就是“托卡马克”超高温核试验装置。

托卡马克（TOKAMAK）是俄文缩写的音译，是一个利用磁约束实现可控核聚变的环形容器，是解决人类永久能源的重大基础研究装置。也被称为“人造太阳”。

陈春先注意这一研究成果的报道，并立即在物理所提出负责“托卡马克”装置的研究，并成立代号为（TC-6）的104组，他任组长。研究所需的材料，由中科院北京器材站供应。

课题于1974年7月1日完成，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托卡马克”（TC-6）装置，放电成功。成为中科院1974年唯一的科研成果。直到1984年，这台装置的指标也一直保持国际先进水平。此装置现存于中国科学技术馆。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推荐10位代表参会，陈春先位列其中。

大会表彰了862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工作者、7675项优秀科研成果。陈春先完成的“托克马克”（CT-6）装置，获得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大会后，中国科学院评陈春先为研究员。同时获评的还有陈景润、杨乐、张广厚，后三人均来自数学所，当时他们被人称为“四少研究员”。

国家学位委员会审定陈春先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除上述奖励和荣誉外，中国科学院还为他分了新居，由中关村69号楼13平方米的住房搬到804号楼4居室（87平方米）。1983年又搬到816号楼7层（100多平方米）3居室。

1978年9月，中国科学院在安徽合肥成立中国科学院合肥基地并成立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陈春先于1979年7月1日至1981年11月16日担任该所业务副所长。其间1980年回到北京物理所为一室主任。他联合北京市有关单位成立“北京市等离子体学会”，做一些专业普及工作。

（二）1978年夏中国科学院组团访美，陈春先在访问团中。这次访问团是陪同两位领导，不能到各地去。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问美国，与美国签订科技合作和文化协定。由此开启中美科学家的互访交流，这样陈春先有了第二次访美机会。1980年10月，陈春先与严陆光（严济慈之子）、项志遴（胡绳之弟）去美国访问，这次访问前，陈春先抓紧时间恶补了英语。访问时陈春先详细观看了美国“托卡马克”装置，回国后，准备落实建设自己的国内装置。

美国陪同人为美籍华人刘金胜教授。

他们首先看的是普林斯顿等离子物理实验室、环型聚变实验室反应堆的“托卡马克”装置，并签订了交流协议，后来又走访了20多个城市，参观了十多个核聚变实验室，去了波士顿128号公路和旧金山的硅谷。这两地有上千家新技术公司，这种公司有技术人员，还有投资家和企业家。陈春先意外地发现，美国实验室技术含量很高的设备都是技术扩散区的一些小公司制造的。这些公司多则百人少则几十人。其核聚变研究室是军用和民用相结合，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促进了技术和经济的发展。

在硅谷他目睹了科技与市场结合所迸发出的巨大能量，即依靠附近的大学和研究所，用不到全国1%的人口创造了全国5%的GDP……

1980年，以美国核聚变研究所权威为首的代表团来中国交流访问，访问北京、合肥、乐山的核聚变基地，陈春先全程陪同。

这些经历使陈春先有所触动。他想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和住地中关村和波士顿128号公路和硅谷两地差不多，都有不少的大学和科研院所。于是萌生了把中关村办成中国“硅谷”的想法。

他先是从自己从事的事业想起：二十世纪60年代，我国第一台激光器研制成功，与美国仅相差半年，20年过去了，美国已形成了强大的激光产业，而我们的科研成果还停留在实验室和纸上，被禁锢在科研单位的深墙大院里，远离生产实地。国家每年都向物理所投入3万元，可是却没有计算每天产出的是多少？

我们落后了一个时代，我们几千人的工厂才能生产的设备，人家几个人、几十个人就能生产出来，而且都是教授在那开公司干出来的。他

确实感受到，科研体制之间的差异。他觉得美国科研体制里，一些有强大生命力的东西是可以借鉴的。

这次访美回国后，他主持筹建（CT-6）装置的后续扩建工程，因经费困难暂停。

他系统地把访美的收获、思考的意见包括美国硅谷发展的历程整理好，准备向有关部门和关心的人士做宣传。

他逢人就说，遇会就讲，被称为“鼓动家”。此时他这个研究人员，已从实际和思想上转向以推动“技术扩散”为发展方向了。

第二次访美回来后，基于以上的思想变化，他认为“技术扩散”比他的专业研究更重要，决定走“技术扩散”的路。他先是向物理所打报告试办服务部。但那时正是老所长施汝为与新所长管惟炎交班的时候，没有得到回应。他便通过“等离子体学会”提出这种想法，得到了二位老科学家的支持。终于付诸实现。

1980年10月23日，北京市等离子体学会常务理事会召开，陈春先有机会把他思前想后的所有观点做了《技术扩散与新兴产业》的发言。其基本内容是：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以技术扩散发展，以吸收新技术，组织更大规模的技术发展，同更多的工厂挂钩协作。

他还说，技术扩散还没人搞，我愿意做第一人。

这一报告会听众主要是以条条管理的方式的中国科学院有关人员和块块管理方式的北京市科协的有关人员共约200多人。此前，经过一年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陈春先先于1980年10月12日向北京市科协提交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试办《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的报告。这一



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林琳供图）



北京市海淀区劳动服务公司培训结业照（林琳供图）

报告是在学会内部征得谈镐生院士^①和潘良儒^②教授的首肯后，又得到了北京市科协的支持下，于1980年10月23日的北京市等离子体学会常务理事会上提出，宣布成立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服务部由物理所陈春先、纪世瀛、崔文栋联系电子所、力学所、清华大学等单位15位同仁发起，从北京市科协借200元做为开办经费。

服务部利用物理所一间常年不用的10多平方米的仓库作为办公地点。开始的业务是利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科协的关系到北京市乡镇企业搞设计、解决具体的问题、讲课培训和传授实用技术。服务部的经营原则是“两不四自”^③。

服务部成立一年的时间里承办了7个科研项目：长脉冲电源、高压火花间隙性开关、激光仪器等。与海淀区合办计算机课程的培训班和讲座，共培训了210人，还帮助海淀区劳动服务公司创建了三个技术服务部和一个电子器件厂。

1981年，陈春先第三次访美，这一次是自费去的。一位华裔工程师送给他“电感储能电烙铁”的生产资料，这在当时属于新技术的电动工具，回国后仿制成功，广受用户欢迎。当年即赚到3万元。

服务部用这笔钱在中关村老67号楼附近盖起130多平方米的木板房，一间为办公室、一间做教室，为待业青年做技术培训用。并挂起两块牌子：“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服务部”和“北京等离子体学报编辑部”。

这一年，服务部的运营还算顺利，其利润有40万，到1982年上半年承担了27个咨询、开发、研究项目。

有了收入，为了酬谢参加服务部工作的人员，开始发放7—15元的津贴。在当时工资普遍不高、又多年未调整的情况下。这笔钱相当于级差的一至二级，引起了物理所内部人员的不满和矛盾，也引起了中科院、物理所两级和北京市科

① 谭浩生（1916—2005），科学院院士，1965年从美国回国。

② 潘良儒（1917—2002），教授刘美，等离子体动力学家。

③ 两不四自：不占国家编制、不要国家拨款，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协的矛盾。此时，物理所所长管惟炎^①在管理上处于两难的状态。因为他基本上不支持陈春先，采取了一些过激的做法，加剧了中科院和北京市科协的矛盾。改革者们采取一些办法来化解这个具体的矛盾。

他们通过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兼职翻译（物理所的职工），找到方毅副总理的一个讲话：科研人员业余时间从事技术咨询、技术开发工作，允许每月发放不超过7元到15元的补贴。稳定了所内不同意见的争论。

与此同时，北京市科协赵绮秋通过丈夫周鸿书（时任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派资深记者潘善堂两次到物理所采访陈春先。写成《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一稿。于1983年1月6日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也称内参）第52期刊出，7月8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相继批示，肯定了陈春先的做法。

《科技之光》主编齐忠在他写的《中关村的故事》一书中详细谈了这一历史过程，这是一场很激烈的思想和做法的争论。由于中央支持改革派的做法，才有了如今科技发展的大好局面。

1983年3月，国家科委召开科技改革会议，陈春先作典型发言。4月15日陈春先在中共海淀区区委书记贾春旺和北京市科协协会支持下，由“北京市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与海淀区科委、海淀区工业公司和北京市科协咨询部签订协议，由海淀区工业公司提供工作场地，同时借款十万元作为开办经费，在中关村创办“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陈春先任所长。海淀区政府在1984年（84）128号文件中正

式批准该研究院列为正式建制，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

不久，北京市和海淀区两级政府出台在中关村办公司的政策，随后一大批中科院的研究人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创业，陆陆续续在北起燕园，南至白石桥这条几千米的大街上办公司，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到1987年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企业有148家。这条街因之更名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1988年，国务院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建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这是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也是我国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

华夏所成立后的一年，完成了15项国家计划外的技术项目。开发研制出ESS—1型快速储能电烙铁（国家空缺产品），还有DLH—5型电缆查漏仪及信号发生器（转让给一家无线电厂，创产值60多万元）。对工业自动化等工厂急需的项目开展了应用研究和开发……逐渐形成了技、工、贸一体化的雏形。在所内管理上进一步在原有“两不四自”的基础上，增加“技工贸结合”这一条，形成“两不四自一结合”的模式。

1984年6月21日，华夏所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器材供应站签订“MIC—1微机管理系统开发委托协议书”。规定由华夏所开发、提供100套用于科研单位器材管理系统，须有完整的硬件、软件、外部设备配套的微型计算机操作系统，总货款320万元，130天内交货。

这一委托协议书规定的指标、期限，放在现在不算多难，但在那时既是一个大项目，又有一

^① 管惟炎（1928—2003）1945年入党，苏联莫斯科科学毕业，1980年科学院院士，1981年5月—1985年任物理所所长，1987年离开大陆，1991年去台湾，2003年3月20日因车祸去世。

定的难度。主要是微机主机、中文输入和显示还不很成熟，其主机美国 IBM-PC 机是 1981 年诞生，Intel 公司的 X86 系列 286 主机是 1982 年才开始使用。而能显示中文输入和显示的汉卡 1983 年才陆续出现。随后的配套软件等操作系统只能跟随开发出来。

华夏所提供的微机主要是通过香港买入。其质量可靠性不是很高。这为以后的交付埋下了隐患。

华夏所自签订此合同后就从银行贷款 275 万，为赶工期于 10 月 4 日租用一架专机，从广州将 66 套近万千克的微机和附件运至北京。10 月 11 日，又将第二批用 4 个集装箱用火车发至北京，经过 4 个多月的日夜奋战，完成了组装、编程、调试等项目。于 10 月 29 日经国内权威的计算机专家组评审实验，通过了质量鉴定。由于甲方在合同期限最后一天提出了终止合同，华夏所迫走上了诉讼之路。

华夏所向工商局申诉，这样原属中国科学院的二个单位，关系变得疏远。1985 年 8 月 28 日，海淀区工商局经济仲裁委员会以裁决书（85 裁字第 58 号）判华夏所胜诉，但要按协议延期交货，器材站应付罚金。器材站不服上诉至北京中级人民法院。

1986 年 12 月 26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标准计量局对华夏所提供的微机系统进行检定，结论基本符合协议。以市中院（1985）中经字〔第 17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华夏所与器材站所签“协议”为“有效协议”但应交付逾期交货违约金 7240 元。

1988 年 7 月 16 日，器材站仍不服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高院驳回重审。

1989 年 9 月 6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于（1989 年）中经字〔第 339 号〕判决华夏所胜

诉。器材站仍不服，又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1990 年 11 月 12 日，高院基本上推翻了前两次北京市中院裁定和判决，以华夏所与器材站签订的协议无效为主要理由，在未开庭的情况下判决华夏所败诉。

这场从 1985 年至 1990 年近 6 年的合同纠纷官司，最后使华夏所倒闭。

而与此同时，中关村其他的改革家一直在坚持走下去。

（三）在此期间，华夏所的三位骨干

陈春先和夫人毕慰萱于 1985 年从中国科学院辞职，据他自己说：“中科院部曾让我停薪留职，档案放在所里，我没有同意。”

陈春先辞职后，于 1987 年 4 月 7 日创办“华夏技术实业有限硅谷公司”。其业务是为美国的公司做“数据录入”。这是中国最早的大规模信息加工的企业，它以“金融租赁”的方式，筹集资金购买设备，在全国如深圳、天津等地建立分公司，在香港还有办事处。

后来，陈春先办的公司因国外订单取消，项目萎缩而停工。接着他又做过一些寻呼机之类的项目，也因各种原因未发展起来，1996 年，已 62 岁的陈春先退出了经营性的活动。

陈春先曾说：“从退休到真正不能工作还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完全可以做很多事。我经历了许多事情，所以还想研究一些事情。现在我的精力主要放在学习、研究、交流上。”“我有这么多经验可以教给后来者”。

1997 年 10 月，陈春先被聘为北京市科委科技创业中心的高级顾问。

1998 年，陈春先与美国科学家企业发起成立“金门楼科技发展中心”。

1999 年，陈春先任合肥中国科学院核聚变基



陈春先在大会上发言（林琳供图）

地客座研究员和高级顾问。

2002年，陈春先建立“陈春先工作室”。曾与他一起创业的崔文栋之子崔宏自愿做工作室的志愿者。

2004年8月9日，陈春先辞世，并捐献眼角膜。

2004年8月13日，中国科学院发布“等离子体创建人陈春先与世长辞”的消息。

纪世瀛于1986年4月12日创办了“北京市理化应用技术研究所”并担任“北京市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第一任会长。

崔文栋则因躲债不知去向。

参考资料

1. 中国现代史，360百科。
2. 《当代人应当修一部当代信史》，阎长贵，《北京时报》，2008年3月17日。
3. 《北京市海淀区志（1996-2010）》。
4.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物理》杂志有关文章。
5. 海淀区宣传部《中关村》杂志有关文章。
6. 海淀区史志办《海淀史志》杂志有关文章。

7. 互联网各网站有关文章。

8. 《中关村的故事》，齐忠，团结出版社，2020年。

9. 《中关村第一村民的创业传奇》龙景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

10. 《何以中关村：走进神州第一村史馆》，黄雨寒，新华每日电讯，2025年5月16日。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北京日报》，2019年9月28日。

12. 《中国共产党历史简明读本（1921—2016）》红旗出版社，2017年5月。

13. 《扎根科学岛，逐梦“种太阳”》，《中国科学报》，2024.11.25，陈欢欢 王敏。

14. 《珍惜时光 创新未来——浅谈青年才俊成长成功之路》，张英，2018年5月月18日，2019年8月3日发布于天津。

15. 《中关村笔记》，宁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

羊坊店地区曾存在过的古庙（上）

孟 化

报因寺

报因寺始建于明代天顺元年（1457），由僧录司左讲经然胜向明英宗奏请赐额得名。成化七年（1471）秋，奉御蔡瑄捐资东迁重建。后逐渐衰败，寺宇无存，仅存有明代成化七年（1471）《敕赐报因寺重造记》《敕赐报因寺崇善记》石碑两方，初被移至法源寺保存，现存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成化七年（1471）七月，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商辂受蔡瑄之邀，撰《敕赐报因寺重造记》，记录了报因寺的由来、重修的状况。该碑由商辂撰文、孙添济正书、杨圻篆额。碑阳高 223 厘米，宽 93 厘米；额高 52 厘米，宽 29 厘米。额书“敕赐报因寺重造记”，额篆书同首题。此碑为研究报因寺历史的核心实物证据。在挖掘过程中，此碑断为两截。

据《敕赐报因寺重造记》碑文记载，报因寺初建在顺天府宛平县玉河乡古幽州城西琉璃厂之阳。根据史料考证，“古幽州城西”指的是金中都城西，而金中都西墙大致位于今北京西站以南的会城门至羊坊店一线。“琉璃厂”在辽代时称“海王村”，位于当时幽州城的东郊；到明代，此地属顺

天府宛平县玉河乡。所谓“阳”指山南水北的方位，结合地理走势，应为琉璃厂南面的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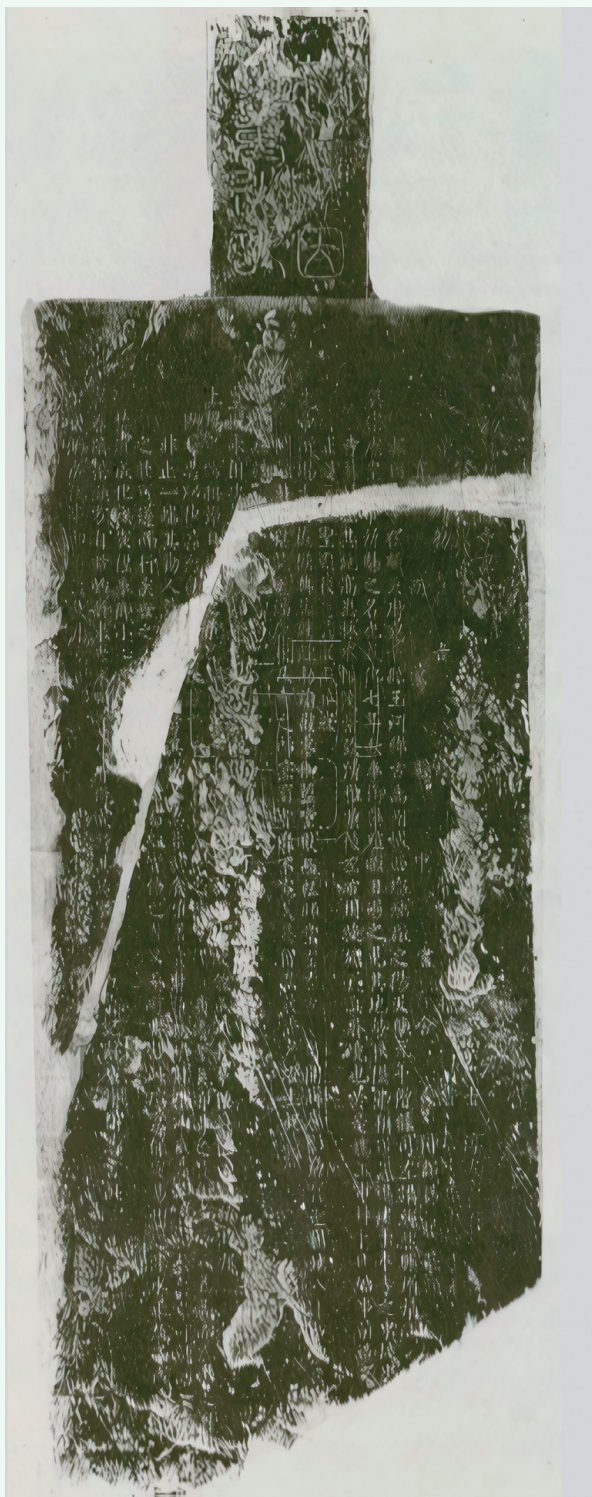
然胜和尚为明代的高僧，曾是智化寺第一代住持，也是庆寿寺（大兴隆寺、双塔寺）第四代住持，并在僧禄司有职务。寺名中的“报因”二字在佛教语境中具有双重深刻寓意：既指“以果报为因”的修行逻辑，也蕴含“报答恩德”的实践精神。

1471 年秋，奉御蔡瑄见报因寺地方狭隘，遂捐助资金，重新择址，后向东迁移至古幽州城西一处“高爽清雅”的旧寺遗址上重建。新建寺院规模完备，前建天王殿，中造三圣殿，后立昆庐殿，供奉皇帝所赐《大藏经》及护经敕谕；东设伽蓝堂，西立祖师堂，左右配建方丈与廊庑；寺内彩绘释迦因地八十四像，钟鼓楼、香积厨、福廩庾等一应俱全。凡寺院所应有的建筑和设施，无不完美齐备。

现将全文辑录如下（根据碑拓整理，部分字迹因风化已不可辨）：

敕赐报因寺重造记

学士淳安商辂撰文先帝敕旨赐习楷书东吴孙



国图藏敕赐报因寺重造记碑拓片（作者供图）

添济书丹直南薰殿中书舍人同（吴）郡杨玘篆额

报因寺在顺天府宛平县玉河乡古幽州城西琉璃厂之阳。天顺元年，僧录司左讲经然胜所请，英宗睿皇帝所赐之名也。

成化七年秋，奉御蔡瑄，暇日过之，见其地形势狭隘弗称，遂谋迁建于本寺之东，故□□□寺旧址。其地高爽，林木畅茂，景致清雅，前后左右周旋拥护，真胜境也。于是鸠工市材，卜日始事。前造天□□，正造三圣殿，后造毗卢殿，奉安先帝所赐大藏经典及护经敕谕。殿东伽蓝堂，殿西祖师堂，左右方丈，周围廊庑彩绘释迦，因地八十四尊像□□□门钟鼓楼殿，庖湢廩庾，凡寺之所宜有者，靡不完美。集僧众晨香夕灯，上祝□□无疆，□□□□皇图永固。次□□□□□□□□□□□□□□□□上赐之物，撙节日□之费，已□□□一□□□□于□□故能成此善事，种此福田□□□报国之忠以伸其念，亲召蔡瑄于为□□□□□□□□者矣。抑非之□□□为□□□□□□，非止一端，其劝人莫浮，其戒人莫要于贪嗔。盖贪能损物，嗔能损人，戒是一□□□□之可勉而□□□□之教可遵而行矣。世之□□□□□□□□□□而心实信之者，又悉可与谈此。

瑄□保定易州之涑水，正统壬戌□□禁近。成化戊寅升奉御，小心宠眷，跻荣显方，自兹始，将来者未可量也。寺即成，特具始末来征予记，辞不获，□□书此。

大明成化辛卯年孟秋月吉日

□ □ □ □ □ □ □ □ □

文中虽有部分字迹漫漶，但核心信息清晰。可知，蔡瑄系保定易州涑水人，正统壬戌（正统七年，1442）入宫，成化戊寅（天顺二年，1458）升奉御。成化辛卯年即1471年。

重建之后的报因寺“其地高爽，林木畅茂，景致清雅，前后左右周旋拥护，真胜境也。”周



国图藏敕赐报因寺崇善记碑两面拓片（作者供图）

围环境优美。“集僧众晨香夕灯”反映出当时报因寺香火繁盛，信众云集的场景。商辂撰此文还劝戒人莫浮、莫贪嗔。表彰蔡瑄“报国尽忠、积善修福”之志。

成化七年（1471）十二月，明代官员刘志全撰《敕赐报因寺崇善记》，记录了奉御蔡瑄主持迁建报因寺的经过，以及寺院布局、建寺缘起和佛教劝善思想等。碑阳高 202 厘米，宽 98 厘米；额高 58 厘米，宽 29 厘米。碑阴高 255 厘米，宽 95 厘米；额高 63 厘米，宽 30 厘米。额书“敕赐报因寺崇善记”，额篆书同首题；碑阴额篆书题：“付□□□扬名□□”。碑阴拓片原物状况为“碑泐甚”，风化严重、字迹模糊不可辨识。

现将《敕赐报因寺崇善记》碑阳全文辑录如下（根据碑拓整理，部分字迹因风化已不可辨）：

敕赐报因寺崇善记

惟久远莫大于善，故佛□□行亦莫□□化人为□□……其君亲则人道于是乎盛矣。□□□不古若□□□□□知向□□□非籍大慈化访劝道于其问何由同……有功于世而世人好□者亦必虑心事佛以为依归□□□□□世居江宁早岁被选获……内廷□事。五朝圣主偕宠眷而……

今上皇帝□□加隆显及宗嗣，恩深德厚，虽□□不足□□□□循省欲报□□念惟……万……将皇崇□寺宇□□表好善之□焉……玉河乡有寺曰报因……英宗睿皇帝之所赐名，□既

未完地亦……出前后所受赐賚之……材……居寺，故基地势高爽，林木□秀，□□而□，闻待于兹，前为天王殿，中为□□，后为……方丈有室，钟鼓有楼，山门廊庑彩绘鲜洁，庖湍廩庾，制度咸具。□□□然远过□皆俾□众安居于……

恭祈圣寿绵长同天地之悠久，皇图巩固并日月之照临。圣子神孙继继绳绳于千万乎！宜君宜王而治化隆盛，□宇宁谧然后副，志全祝愿□□……弗克完成已而诸同，志钦宗善道者咸发心施财共盛□灵，于是用有余裕而寺□□成……同此□故□发兴起之易□□佛之愿力使然□。夫同此善因则□□受福利之益，非予敢……而后有为焉。

成化七年歲次辛卯冬十二月吉旦

佛弟□□刘志全谨记

此碑文缺失较多，但将之与前面的《敕赐报因寺重造记》比对，有些文字恰好可以互补缺失，丰富我们对于报因寺的认知。

报因寺虽然实物无存，但是这座寺庙的建立和命名却蕴含着多重深刻的历史意涵，交织着明代的政治风云、宗教生态与人文脉络。

天顺元年（1457），对于明英宗朱祁镇而言，是一个充满戏剧性转折的年份。通过“夺门之变”，他从弟弟明代宗朱祁钰手中重新夺回皇位，开启了第二次统治生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报因寺的赐名之举绝非单纯的宗教事务，而是皇权与宗教势力互动的重要体现。英宗复辟后，亟需巩固自身的统治合法性，重塑皇权的威严。宗教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凝聚人心的重要力量，自然成为他争取的对象。僧录司左讲经然胜适时奏请赐名，无疑为英宗提供了一个展示皇权

恩宠、拉拢宗教界的契机。通过赐名，英宗不仅彰显了自己对佛教的支持，更向外界传递出皇权的至高无上，表明新政权能够为宗教发展提供庇护。而对于然胜来说，作为僧录司的重要官员，他深知皇权在宗教事务中的决定性作用。奏请赐名，既是为了提升报因寺的地位，也是为了巩固自己在僧团中的影响力。一旦寺院获得皇帝的赐名，便拥有了官方认可的合法身份，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在宗教界的地位也会随之提升。

“报因”二字，蕴含着深厚的佛学内涵，是佛教因果轮回思想的集中体现。在佛教教义中，“因”指的是导致事物产生的原因，“报”则是指由“因”所引发的结果，即因果报应。报因寺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如今，报因寺虽然历经岁月的沧桑早已不复存在，但它的命名故事却依然流传于世。

崇寿寺

崇寿寺位于羊坊店西南，建于明代正德年间。因寺门前置有两尊铁狮，又被称为“铁狮子庙”。今崇寿寺遗址已无存，仅在《日下旧闻考》《宸垣琐略》等文献中留有一些记载，可供人追忆。

据乾隆年间于敏中、英廉等人奉敕编纂的《日下旧闻考》中所引《行国录》记载：

补白云观西六里羊坊店市西有崇寿寺，创于明正德癸酉，司设监监正刘允乘所建。寺临官道，山门内正殿三楹，东西廊各三楹。殿前碑二：一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国史副总裁西蜀温仁和撰文，武定侯郭勋篆额，南京兵部尚书乔宇书。一为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铅山费宏撰文，惠安伯张伟篆额，户部尚书无锡秦金书。^①

① 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第五册卷九十五，1589页。



可知，崇寿寺创建于明正德癸酉年（正德八年1513），由司设监监正刘允乘主持修建，位于白云观西六里羊坊店市西，临官道而建。寺内布局规整，山门内有正殿三间，东西廊各三间。殿前立有两通碑刻，分别由温仁和、费宏撰文，郭勋、张伟篆额，乔宇、秦金书丹。由所记录的碑刻撰写者的官职，可见当时崇寿寺规格极高。

温仁和（1475-1543），字民怀，成都华阳（今四川省成都市华阳县）人，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官至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太子少保。费宏（1468—1535），字子充，号健斋，一号鹅湖，晚号湖东野老，江西广信府铅山县（今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状元。正德六年（1511），由礼部尚书入阁，历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为官四朝，三入内阁，先后辅佐明武宗、明世宗近十年。郭勋，名山藏，郭英五世孙，正德三年（1508）嗣武定侯，进封翊国公。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引《行国录》并非黄宗羲所著南明史书，而是清代一部由沈进撰写的同名游记类文献，内容涉及京师地理与寺庙分布。沈进（1628-1691），初名叙（一作驭），字山子，号蓝村，晚号知退叟，浙江嘉兴人。沈进为诸生，工诗，康熙时与朱彝尊并称朱沈，与周贫并称周沈。早年诗尚清丽，晚期归于冲淡。家贫，授徒以自给。著有《行国录》《蓝村稿》《袁溪文稿》等。

在引用《行国录》中记载的同时，《日下旧闻考》的编者也有按语，对崇寿寺进行了进一步的描述：

崇寿寺，土人呼铁狮子庙。寺门外铁狮二，跌

下有镇宅狮子，弘治七年造等字。寺内明费宏、温仁和所撰二碑，今尚存。又后院中仆方石尺许，为住持僧伦公塔记。东偏碧霞元君祠磬一，天启六年造。^①

首先，寺庙门外有两尊铁狮子，因而当地人亦称崇寿寺为“铁狮子庙”。狮子底座上刻着“镇宅狮子，弘治七年造”等字，可知此狮子造成于1494年。

寺里由明代官员费宏和温仁和撰写的两块石碑，至乾隆年间还保存着。寺庙后院倒卧着一块大约一尺见方的石板，是当年寺庙住持僧人善伦公的石刻塔记。

崇寿寺东侧有碧霞元君祠。崇寿寺原为佛教寺院，东偏殿设道教祠，符合传统“左青龙、右白虎”之制，东方主生，契合碧霞元君“司生育、护童稚”之神职。这亦是明代“一庙多神、佛道共祀”的普遍模式。祠里还有一口刻着“天启六（1626）造”的铜磬。这里所用的“造”字非“铸”非“制”，用词质朴，当为地方信众或寺院住持自发集资所铸。根据《洞玄灵宝钟磬威仪经》《上清灵宝大法》等明代道教仪轨文献可知，铜磬在斋醮中承担三重核心功能：节律控制、通神媒介、阴阳调和。1626年前后，明代宦官魏忠贤权势如日中天，全国生祠遍立，民间祈福活动空前活跃。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可以遐想到当时崇寿寺的盛况。

在按语后，还增补了温仁和崇寿寺碑略。

阜成门外十里许，乃玉河乡之池水村。西望秀峰奇巘，苍翠如画，回瞻京阙，岿然天表，真近畿佳境也。佛寺一区，金碧辉映，靓丽雄伟。前为土山，嘉木荫翳。敕赐寺额曰崇寿，且以大兴

^① 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第五册卷九十五，1589页。

隆寺僧善伦兼崇寿寺住持，是殆不可无记。弘治七年九月增塔记。示寂僧录司右讲经兼崇寿堂上开山第一代住持，仍兼大兴隆寺本师序堂伦公大和尚灵塔。僧录司右讲经兼崇寿寺第二代住持仍兼住大兴隆寺了元。崇寿寺第三代住持钦依广善戒坛传戒宗师义念等。嘉靖九年三月初一日建。^①

这篇碑文详细介绍了崇寿寺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寺庙位于阜成门外大约十里地玉河乡的池水村。西边，秀丽的山峰奇特又幽深，翠绿的颜色像画一样美。东边，回望京城的宫阙，高高耸立在天际。崇寿寺就建造在这一块京城近郊的风水宝地上，寺庙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壮丽雄伟。寺庙前有一座土山，山上长着茂盛的树木，枝叶浓密，形成一片阴凉。

此外，文中还记载“崇寿寺”乃为皇帝赐名，且任大兴隆寺的僧人善伦兼任崇寿寺的第一代住持。大兴隆寺为明代京师重要官寺，其住持多由皇帝敕命，说明善伦深得皇室信赖。他被指派为新建的崇寿寺“开山第一代住持”，意味着皇帝对崇寿寺的看重。善伦圆寂后，崇寿寺为其建立灵塔，并于弘治七年（1494）九月，增做《伦公大和尚灵塔塔记》。

碑文末还记载了僧录司右讲经同时兼任大兴隆寺住持的崇寿寺第二代主持了元，以及钦依在广善戒坛传戒的第三代住持义念等人的人名。“僧录司”是明代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最高机构，设左右善世、左右讲经等职。“右讲经”，属中层僧官，负责讲习经义、主持法会，具有官方认可的宗教权威。这一职位通常由学识渊博、德行出众的高僧担任。崇寿寺的第一任、第二任主持就都曾任此职，亦可见其佛界地位。

在明代，“广善戒坛”并非单一固定地点，北京多座寺院如天宁寺、潭柘寺等均曾称此名，这类戒坛由僧录司管理，每年定期开坛，召集全国僧人受戒，具有国家级宗教职能。“钦依广善戒坛传戒宗师”由中央僧官机构从全国高僧中遴选，候选人须为通晓《四分律》《梵网经》等戒律典籍、戒行清净、德望卓著的住持或讲经僧。僧录司将候选人名单呈报礼部，由礼部复核其出身、师承、戒牒记录与过往寺务表现，确保无违戒、无私度、无依附权贵之嫌。皇帝以“钦依”之名正式下旨任命。崇寿寺第三代住持义念为“钦依广善戒坛传戒宗师”，这一称号意味着义念实为国家佛教体系中的高级执礼官。其“传戒宗师”身份不仅限于本寺，更可能在其他设坛寺院轮值主坛，影响范围超出崇寿寺本身。

由碑文最后可知，此碑建于嘉靖九年（1530）三月初一。

崇寿寺原二碑已佚，无确切拓本流传记录，仅有温仁和崇寿寺碑略因《日下旧闻考》的系统辑录而得以保存。

将《行国录》中的记载与温仁和崇寿寺碑略进行比对，可以进一步梳理崇寿寺的历史如下。

崇寿寺最初由明孝宗敕建于弘治七年（1494），并赐额“崇寿”。当时寺庙已有完整规制，山门外铁狮即为此时所铸。此为官方正式建寺之始。到正德年间，司设监监正刘允乘出资大规模重修或扩建该寺，使其“金碧辉煌，靓丽雄伟”，故清人误记为“创于正德癸酉”（即正德八年）。实际上，刘允乘并非初建者，而是重建者。《宸垣识略》《日下旧闻考》等后世文献沿袭此说，导致“创建”之名流传。

^① 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第五册卷九十五，1589页。



另外所谓“司设监监正刘允乘所建”中的“刘允乘”一名，尚存异说。明武宗正德年间有一位太监名为刘允，担任司礼太监，1515年曾奉旨出使乌思藏迎请“活佛”。刘允此次出使排场浩大，携带重宝、动用万人，但最终因“活佛”隐匿不出，部众遭袭、财物被夺，仅以身免，返京后被嘉靖帝治罪，成为明代宗教外交中的争议事件。《明史》及多份可信文献均记作“命中官刘允乘传往迎”，其中“刘允”为人名，“乘传”为出使行为。后人若断句不当，易误作“刘允乘”。且存此说，待日后更多史料来辨析。

永安寺

永安寺，就目前所见史料，有两座。一座建于明嘉靖时期的玉河乡，一座建于清道光时期蔡公庄村十一号。但时至今日，均无存。

有关永安寺的记载，最早见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纂修完成的明《顺天府志》。由时任顺天府尹谢杰发起并主持初纂，后经府丞谭希思主持、大兴县丞张元芳汇总编次，继任府尹沈应文参与校正后刊刻成书。全书共六卷，分为地理、营建、食货、政事、人物、艺文六志，约二十万字，收录了当时顺天府所辖五州二十二县的内容。该志是现存第一部保存完整的明代北京府志，有万历刻本存世。

书中记录有“永安寺有敕建碑。”^①“敕建”二字多用于寺庙、祠庙、陵墓、书院等重要建筑或碑刻，为奉皇帝诏令建造之意。永安寺有敕建碑，说明永安寺为皇帝下旨修建，地位极高。

《日下旧闻考》中在引述明《顺天府志》的内容外，又进行了补录：

永安寺，明嘉靖四十四年碑一，都察院右金

都御史安邑胡志夔撰。碑称寺在玉河乡，经始于万历四十年，落成于次年。万寿戒坛宗师法讳惠安者，行戒精严，住持兹寺。^②

永安寺立有一块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石碑，由时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胡志夔撰写。胡志夔，字许南，山西安邑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富平知县，有循绩，迁御史；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嘉靖四十五年（1566），以黄甫川失事，被劾回籍听勘。

碑文中仅记载这座寺院坐落在玉河乡，并未详述其具体位置。万历四十年（1612）开始动工修建，万历四十一年（1613）就建成了。最高佛教戒坛“万寿戒坛”的宗师惠安，其人持戒严谨，为当时佛教界有威望的高僧，担任该寺住持，侧面印证永安寺的官方宗教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称石碑撰于1565年，而寺院于1613年才建成，中间出现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明代也存在过先立碑、后建寺的先例。但差了几十年还是很少见。那么这里是传抄之误，还是确实如此呢？

由于文中所言最重要的实物石碑尚未及见，且有关永安寺的一手史料寥寥无几，笔者就试着查找永安寺主持惠安的史料，以期有所得。在明人张文宪的《爻山先生遗稿》中，笔者发现有三篇文章论及万寿戒坛宗师惠安。

张文宪（1491—1567），字廷鉴，号爻山，浙江崇德县人（今属浙江桐乡）；七岁工书法；嘉靖二年（1523）进士，官至工部尚书；撰有多篇墓志铭，如《朱陶父妻卢氏墓志》（1561）、《郭守乾妻谭氏墓志》（1553）、《王以言妻徐氏墓志》（1560，徐阶撰文，张文宪正书）、

^{①②} 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第五册卷九十五，1590页。

《赵旺墓表》（1560）等。曾为白马寺相关古碑撰文。被视为明代中期文坛与金石学的重要参与者。张文宪与惠安的叔叔黄成庵为同年（同年考中进士），因而与惠安有交往，知之甚深，因而他的文字记载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在《旻山先生遗稿》卷二中，先后收录有《恩显录后序》《恩显录序》《赠安上人膺戒坛传教序》三篇文章。前两篇为记录僧官选拔盛事而作的序文，核心内容是记述朝廷为万寿、广善二戒坛遴选传教宗师的全过程，并阐明此举“为世道计”的深远意义，最终倡议将入选僧人名录刻录成书，包括其官职、家世、宗派、籍贯、年庚等信息，以彰盛举、警策后人。后一篇《赠安上人膺戒坛传教序》是为赞颂高僧安上人（法号惠安）荣膺万寿戒坛宗师之位而作的贺序，全文通过记述其家世、出家因缘、师承、孝行、修持与德业，高度赞扬了他“以戒为本、明心见性”的修行风范，并寄望其弘扬宗风、为国祈福。

现将这三篇短文原文依次复录：

显恩录后序^①

刻《恩显录》既成，侯万寿戒坛宗师惠安者，予昔与相识，因征予文以跋诸末简。予惟事迹颇末，前序尽之矣。窃念：僧官者，所以掌其教也；宗师者，所以阐其教也。二者相资，法门始振。爰自建置以来，曾有兼收并用如今日之盛者乎？曾有远寿诸梓如今日之举者乎？故叙官阶，所以彰君泽也；叙家世，所以笃亲亲也；叙宗派，所以答师恩也；叙名号、年庚、籍里，所以惇朋友

之谊，以示久要不忘也。一举而众美具焉！然则兹录，允乎可传，而匪徒为无益者比矣！敬识之，以纪岁月云。

恩显录序^②

我皇明混一区宇，酌古图治，其创制立法，宏纲众目，靡悉具举，要之皆所以为世道计也。于时设僧录司于京师，而建官自善世以下，列有数员。其在外则设僧纲司、僧正司、僧会司，胥总于礼曹。凡天下衲子，或授官、或授牒者，文移先达于僧录，而后上诸部。是则僧录之司，乃诸衲经宗会元之所也。又建立万寿、广善二戒坛，各设传教宗师数员，俾天下之衲禀受誓戒者，每岁一入京，俯首坛下：一则闻法旨以开其心胸，一则领戒律以消其妄念。是则各戒坛者，乃诸衲行远集高之基也。国制诱掖群迷，使归于善，其详且密，盖如此。

迺嘉靖壬戌夏四月，适万寿戒坛缺员，礼曹移文僧录司，慎简僧众谙通经典旨趣、戒行端庄者，亟加举用。而左善世义念、右善世慈源相与秉公推选申保以应之。大宗伯养斋严公糊名精试，得五十二人合式，题奉钦依：以性聚等十人候僧录缺，法登等二十二人候万寿戒坛缺，真念等二十人候广善戒坛缺，挨次替补。一举而三事备焉，寔旷舆也。

已而候僧录官了心谋于众曰：“今日之事，畴昔罕闻，欲垂恒久，不可无录。曷不以世系甲籍、宗派名号，叙铎诸梓，各篋而藏之，俾方来有考乎？”群议佥同，板刻将竣，固请予言以弁

① 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8集部，明别集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旻山先生遗稿》卷二，910-911页。

② 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8集部，明别集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旻山先生遗稿》卷二，914页。



诸首简。

予惟吾人置身穹壤间，凡可以著誉流徽者，初未尝限以地。即观诸僧，超拔乎俦品，登晋乎荣阶，凡宗门事无巨细，必经裁定。宗师升法座，出言有章，众胥信服。向非戒律之严，行业之端，何能获履斯任耶？矧遭际圣明，恩波游被，其为宠光，匪小小者。予用是备述之，良以纪一时之盛云。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诸僧登斯录者，其尚靖共再位，以图所以保厥终乎？是为序。

赠安上人膺戒坛传教序^①

上人惠安者，字大宁，号月川，姓黄氏，世为任丘人。乃太守成庵黄公之侄，实诗礼名族也。少因多疾，奉母命授礼同乡高僧天济为师，住京都正法寺。天济戒行庄严，精通典教，诸衲悉皆宗之。于庚申夏偶宁示灭，上人扶柩送归故土，藏诸寿域，累设斋筵以资冥荐，人称其孝思不匮。自是上人潜修顿悟，湛澄圆觉，深契如来法旨。辛酉夏，移居崇国宝刹，即禁足百日，亲写佛经。其于大乘妙典，寻绎研究，心领神会，诸檀越深加礼敬。

乃今岁四月，礼部以万寿戒坛适缺宗师，特慎遴选，简用数员，上人登名前列，奉旨以次需用，盖奇遇也。同邑听选官朱承禄并张承恩第会合上人交厚诸公，相与装轴驰贺。间请予文以荣之。

予惟大雄氏之教，原出西方，其来逖矣。祖祖相传，灯灯相续，大率以明心见性为要，以济人利物为功。国制建演法，每岁于夏令，寓内衲子云集坛下，宗师升座宣演戒律，诸衲听而受之，

盖所以一众心而惕至教也。然师非正己，焉能正人？原大乘本旨，不假语言，亦不离语言。其入门者，须于五法三性八识究竟了达，始契真宗。

上人于斯数者，不独明其奥妙，复能身体力行。平居调经持斋，亹亹弗倦，且博学强记，旁通数理，信能以守戒为禅定智慧之本。繇兹一心既净，五蕴皆空，自然百尺竿头更能进步，宗风大阐，为国祝釐。将来行高业广，立教传经，端可俟矣，岂不增光于师范乎？予与成庵为同年友，盖知上人之深者，故以是言期之。

通过对这三篇文章的梳理可知，安上人，法号惠安，字大宁，号月川，俗姓黄，世代居住在任丘，是太守成庵黄公的侄子，出身于诗书礼乐的名门望族；年少时因体弱多病，奉母亲之命，拜同乡高僧天济为师，出家于京都正法寺。天济法师戒行庄严，精通佛教经论，众僧皆尊崇他为楷模。庚申年即嘉靖三十九年（1560）夏，天济法师圆寂，安上人亲自护送灵柩归葬故乡，安葬于家族墓地，并多次设斋供养，超度先师，人们都称赞他孝心深厚、始终如一。自此之后，安上人潜心修行，顿悟佛理，心性澄明圆满，深深契合如来的佛法真义。辛酉年即嘉靖四十年（1561）夏，他移居崇国寺，随即闭关百日，亲手抄写佛经。对于大乘佛教的精妙典籍，他深入研读，反复推究，心领神会，因此深受在家信众的敬重。

嘉靖四十一年（1562）四月，礼部因万寿戒坛正缺传戒宗师，发文至僧录司，要求慎重遴选僧人。选拔标准明确：通晓经典、志趣坚定、戒行端庄。由左善世义念、右善世慈源公正推选，再由礼部尚书严公（养斋）糊名考试，杜绝徇私。

^① 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8集部，明别集类，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笈山先生遗稿》卷二，916页。

最终选出 52 位合格僧人，按名次分配：性聚等 10 人，候补僧录司官员；法登等 22 人：候补万寿戒坛宗师；真念等 20 人，候补广善戒坛宗师。惠安名列首选，奉旨按序任用。

选拔结束后，候补僧官了心向众人提议将所有入选僧人的世系、户籍、宗派、法号等信息，编纂刻印成书，分藏各处，以供后人查考。众人一致赞同，刻成《恩显录》一书。惠安邀请张文宪为之作序，故有《恩显录》前后序之撰写。

在得知惠安获得这个难得的机缘后，其同乡候补官员朱承禄与张承恩等几位交情深厚的友人共同装裱书画，驰书祝贺，并邀请张文宪写做一篇《赠安上人膺戒坛传教序》，以增添荣耀。

这几篇文章详细记述了明代僧官体系与戒坛的设立，可谓是关于明代国家佛教管理制度的珍贵文献。其中亦可以明确，惠安是通过嘉靖四十一年四月礼部和僧录司的选拔而荣任万寿戒坛宗师。

如果永安寺建寺时间为万历四十一年（1613），那根据高僧惠安的生平，其年龄恐难以胜任。而嘉靖四十一年这个时间，惠安在佛界深受推崇，且刚好得任万寿戒坛宗师，适逢皇帝敕建的永安寺建成，为表示对永安寺的重视，朝廷遂将惠安委以永安寺主持，这一时间线，显得更为合理可信。

因而，笔者以为，清代官修《日下旧闻考》中对明代永安寺的建寺时间“经始于万历四十年”应为“嘉靖四十年”之误。当然这是笔者基于所见史料的考证和推测。还有待于更多文献的发掘和文物的出土进一步加以佐证。

除了明代的玉河乡永安寺外，在 1928 年北平

特别市所做的寺庙登记档案中亦有一座建于道光年间的永安寺。

永安寺 坐落西郊一区蔡公庄村十一号，建于道光年间，属私建。本庙面积约五亩，佛殿六间，住房十五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庙内房屋出租，如有阴雨塌漏处，用房租随时修补。庙内法物有天王像四尊，关帝像一尊，配童两个，弥勒佛一尊，韦驮像一尊，均泥塑，木供桌一张，黑琉璃瓦五供一堂，铁钟一个，铁磬一个，另庙内有槐树八棵。^①

这座永安寺坐落于西郊一区蔡公庄村十一号，建造于道光年间（1821—1850），正值晚清社会动荡与民间信仰活跃并存时期，许多地方士绅或信众集资建庙以祈平安。该寺为私建寺庙，占地面积约五亩。由六间佛殿和十五间住房构成。部分房屋出租，房租租金用于寺庙的日常维护（如阴雨塌漏修补等）。庙内供奉有四尊天王像、一尊关帝像、两个配童、弥勒佛以及韦驮像各一尊，均为泥塑。此外还有祭祀用具若干，如一张木供桌、黑琉璃瓦五供一堂、法器铁钟和铁磬各一。庙内还栽种有八棵槐树。“槐”谐音“怀”，寓意怀德，以示吉祥。

从上文可知，永安寺以租养庙，至 1928 年依然存在。从法物配置来看，应该还有着日常诵经、节庆祭祀等活动，但规模有限。

鉴于明代的永安寺在玉河乡的具体位置未知，不能判断和清代道光间的永安寺有没有关联，但亦从一个方面可知，羊坊店街道寺庙文化的悠久绵长。

（未完待续）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工作人员）

①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档号J181—15—560），283页。

中央领导与京西稻

 杜振东

位于北京海淀区区域内的三山五园是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两条文化带的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著名的进京“赶考”红色印记中，还有段京西稻插曲。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乘汽车离开西柏坡赴京。25日凌晨3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涿州换乘专列驶向北京，清晨抵达清华园车站，改乘汽车至颐和园。出发前，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是进京“赶考”。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都应当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对于进京“赶考”细节，《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在香山》《进京赶考》《杨尚昆日记》及多位民主人士《年谱》中都有记载。西柏坡纪念馆、唐县纪念馆、涿州纪念馆、香山革命纪念馆、双清别墅、清华园车站、颐和园益寿堂等处均有展示。这说明，中央领导强调要学好党史、做好党史工作，是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

在进京“赶考”中，中央领导为什么会从特别简陋的清华园车站下车，而且不搞欢迎仪式呢？原海淀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负责人蔡

景惠（《中共中央在香山》编委）讲到，一是不铺张浪费，不搞张扬；二是从安保角度出发，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警卫及相关人员从涿州出发后，安排3列火车各拉8节车厢，分别在前门车站、西直门车站和清华园车站警戒。然后转乘汽车分别奔赴颐和园和香山。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大家定会感兴趣地问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京后第一餐有何特色呢？

对此，我采访了新中国成立前就住在颐和园内的老住户高永泉。他对我们说，在上初中前他是居住在颐和园石舫东侧古建筑楼内。他爸爸叫高连元，是听鹂馆最早的厨师。小时候他爸爸对他讲，当年他们曾为毛主席等贵宾做过进京“赶考”第一餐。主食中有京西稻米饭，菜中有从昆明湖打捞的大鲤鱼等。进餐地点是在益寿堂，饭菜是在听鹂馆做的。那时昆明湖里的鱼又肥又大，颐和园四周不仅有大片的稻田，附近的青龙桥、西苑、海淀、蓝靛厂等地，起码有几十家粮店经销京西稻大米。

原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谢荫明指出，所

谓进京“赶考”第一餐，实际是党中央用来招待重要民主人士的。当天下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从颐和园乘车到西郊机场，举行新中国成立前的第一次阅兵仪式。活动结束后，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领导直接从西郊机场入驻香山来青轩。只有毛泽东、周恩来重回颐和园益寿堂，宴请20位在京民主人士代表，商议重大国是。是夜1:30，毛泽东离开益寿堂入驻香山双清别墅。周恩来入驻离双清别墅90多米处的来青轩。出于安保需要，此时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对外号称“劳动大学”。

中共中央入驻香山约半年时间内，毛泽东等领导经常乘车往返于香山与中南海之间，途径普安店、玉泉山、青龙桥、颐和园、西苑、海淀镇等地，沿途观看到海淀区境内的冬小麦由绿变黄，观看到京西稻的出苗、分蘖、拔节、孕穗、出穗、开花、乳熟和腊熟等环节，还看到境内的果树、蔬菜、玉米等农林作物。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天安门前举办升国旗、奏国歌活动，但没有悬挂国徽。直至1950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首次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国徽上有金色的五星、金色的天安门、金色的齿轮和金色的谷穗。

大家会问，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为什么没有悬挂国徽呢？原来是中央领导认为当时的国徽设计方案不理想，需要专家们继续修改完善。

提起国徽的设计，还有段与水稻关联的动人故事。1942年冬，在重庆宋庆龄寓所，为欢送董必武返回延安而举行茶话会。周恩来和邓颖超应邀出席。桌上摆着近郊农民送来的两串颗粒饱满的谷穗，当大家赞美它“像金子一般”时，宋庆龄说：“它比金子还宝贵。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便可丰衣足食了。”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等到全国解放，我们要把谷穗画到国徽上。”

在北京玉泉山下的大片稻田中，同样有与稻禾之间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初期，玉泉山下北坞村有位稻农叫刘宝峰，由于父母早逝，他和妹妹相依为命，从10岁起就经营着几亩稻田。刘宝峰回忆说，在稻田旁和毛主席一共见过六次面，毛主席操着浓重的口音和他打招呼，这是他一生中最引以为傲的大事。有一次毛主席还和他坐在大石头上聊天，并说走合作化道路后集体经济就更好了，再说个媳妇，你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此外，刘宝峰还在玉泉山下北坞村一带见过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

提起海淀区四季青及北坞村，有一张珍贵的照片。内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有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有时任海淀区委书记的张还吾，还有一位北坞村民。北坞京西稻种植传承人潘桂江指出，站在周总理和西哈努克亲王身后的那位小伙子，好多人都以为是穿便衣的警卫人员，其实他是当时玉泉大队的财务队长危得山。

我们采访危得山时他讲道：“我正好从周总理和西哈努克亲王身后走时，被摄影师拍照下来了。”危得山还对我们说些小花絮，当周总理、西哈努克亲王等贵宾看完京西稻后，由于天气酷热，周总理担心西哈努克亲王中暑，自己带头脱掉礼服上衣，只穿一件背心，并招呼其他嘉宾都脱掉外衣。在场同志也随后照办，西哈努克亲王感动地也脱掉了礼宾服。

海淀区多本书籍记载，1958年8月16日下午，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到北坞京西稻田视察。当时周总理亲切地问周围同志：“一亩能打多少斤？”一位社员回答：“每亩1500斤。”总理稍一思索，和蔼地询问了每亩稻秧墩数和每墩株穗数，这时他面部神情有些沉



1958年8月周恩来总理陪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视察北坞村的京西稻（四季青镇提供）

重，意味深长地对周围干部说：“我们既要鼓足干劲，也要讲求科学态度。”在场干部都明白总理此行目的和讲话的重要意义。周总理临走时对大家说：“你们不要满足，还要争取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你们这里，是京西稻的故乡嘛！”

海淀区四季青镇原党委书记王德贵讲，北坞在清代朝廷绘制的《五园图》中是有标注的老村。1958年后隶属玉泉行政村，归四季青公社管辖。据老同志说，过去许多外国元首不知道有海淀区却知道四季青。由于四季青经常有外事接待任务，在乡机关院内专门建有一座外宾接待室，多年来有上百位外国元首参观过四季青。1954年春节前，李墨林生产合作社精心选出20根顶花带刺的黄瓜和15个一样大小的西红柿，由全国劳模李墨林作为代表送到中南海，请中央领导品尝。次日上午，合作社就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信。

既然蔬菜是四季青特色，为什么周总理一行不视察蔬菜而考察京西稻呢？原来1958年8月13日主流媒体刊登出某地早稻单产达36900多斤的逆天性新闻。8月16日周总理陪同外宾来到四季青考察，有感这里是京西稻的故乡，要亲自

到田边地头考证水稻到底能亩产多少斤。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离北坞村不远的西苑挂甲屯吴家花园，有位谪居老人亲自栽种一小片京西稻。他是喜欢自产自食吗？原来他是要亲自验证水稻亩产有多少斤。

北京市文物局原局长孔繁峙对我们讲，海淀区西苑挂甲屯吴家花园位于三山五园腹地。南北长约120米，东西宽约70米，是清代的私宅。1959—1965年期间，彭德怀元帅谪居这里时，在院内栽种一小块京西稻田，亲自施肥浇水，秋后收割后推算亩产稻谷900多斤。彭德怀还对周围稻田做过调研，平均亩产700多斤。

海淀区统计局原局长、高级统计师梁艳进一步指出，1958年海淀区水稻播种面积30658亩，亩产580.6斤。1965年水稻播种面积是49369亩，亩产786.8斤。这期间全区水稻亩产基本上在600斤上下徘徊。当时个别地块亩产超1000斤是正常的，但亩产上万斤则是违背客观规律了。

通过讲述中央领导与京西稻的故事，我们对党的实事求是路线有更深入的理解，对“都下宝地”更加热爱，对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做好文化遗产传承工作更加充满信心。

记忆如潮（三）

——几个记忆的片段

周文英



马国超将军（宁葆新供图）

到马国超家做客

马国超的父亲是抗日民族英雄马本斋。在

二十世纪 60 年代，有一部叫《回民支队》的电影在全国上演。那时马本斋的名字如雷贯耳，他的事迹传遍全国。马国超是他唯一的儿子。

大约 1991 年的一天晚上，我和一位女同事去海淀区公主坟附近的海军大院，敲响了一家的房门。女主人和马国超非常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客气地让我们坐下。马国超说：“你们可好久不来了，都忙什么呢？”我的同事说：“瞎忙，也没正经事，就是平时那些活儿呗。”大家聊了些家长里短。这时马国超站起身说：“真对不起，有个会，是我召集的，我必须去。不能坐陪啦。”他一边说一边从衣服架上拿下军上衣穿上，又顺手拿下海军帽戴上，和我们说了句“对不起”就出去了。

马国超，回族，笔名紫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1939 年出生在河北献县东辛庄，六岁时随父到延安。解放初期，他与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同窗，就读于八一小学；1963 年毕业于解放军测绘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青岛的北海舰队海测

大队；1971年调到海政群工部；二十世纪80年代末，历任海军群工部副部长、部长，后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44年马本斋去世，毛主席曾题写挽联“马本斋同志不死”，那时马国超才五岁。马本斋将要离开人世时曾为他写下“中国”两个字，希望他能的一生奉献给祖国，马国超默默的记下了父亲的遗言，没辜负父亲的期望。

马国超多才多艺，写了不少文艺作品。如《马本斋》《民族英雄》等长篇小说以及《少年风云录》《夜闯老虎口》《青松长翠》等中篇小说和多部诗集。他还写了电影剧本《烽火战歌》等，出版了歌曲专辑《海上日出》《祖国吉祥》《雪莲花》等。他在绘画方面也颇有功底，出版了《墨海扬帆》等书画集。1983年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兼任中国回族文化学会名誉会长等职。

马国超走后，我的同事就与马国超夫人聊起来。她们俩聊的很投机，我很少插话。这时我仔细观察着他们的家：

靠墙摆放着长条沙发，套着沙发套。沙发套可能有点大。由于人坐着往下滑，沙发套都快坠到地上了。沙发对面是一台较大的电视机，正在播放着节目。电视机上方的墙上，悬挂着一副大型油画。描绘的是马本斋抗日时期的英雄形象。我看到这画，不由得对英雄起了敬畏之心。

我的同事与马国超夫人又聊到家庭情况。马夫人说：女儿在电报大楼上班，儿子在自己开公司，具体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快退休了。说着说着就到晚上九点了。我示意我的同事差不多该撤了。同事明白了我的意思，我们告辞就各自回家。

和屈银华同校一年

屈银华，中国杰出的登山运动员。1960年5

月25日北京时间4点20分，他成为人类第一次从“充满死亡”的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中国登山队员之一。我曾在人大附中和他同校一年，对他有些了解。



屈银华像（宁葆新供图）

当时，人大附中设有预科班。预科班是国家选拔全国各地区、各条战线上年龄适当的先进模范人物来校补习文化的，学生年龄普遍偏大。那时的人们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国家要让这些人接受高等教育，就必须在进入大学前先在人大附中补习一年基础文化课，然后再保送进入各个大学进行学习。这些预科班学员大部分是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学习。人大附中开始叫速成学校，就是专为培养预科班学生而设，后来慢慢才改变成普通中学。当时在人大附中预科班学习的有两位

知名人物，一是自传体小说《高玉宝》的作者，“半夜鸡叫”就是他写的；另一位是后来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纺织工人郝建秀。屈银华当时也在人大附中预科班学习。自屈银华这届学生于1963年进入大学学习后，人大附中就彻底改变了速成中学的身份，成为一所完全的普通中学。初中三个年级、高中三个年级、每个年级6个班。

我在1962年夏进入人大附中高中学习。在校期间总会遇到一位特殊的人。

一天下午四点多钟，我看到预科班的学生们在篮球场上打半场篮球。大家抢球、跑步、投篮，动作灵活又快捷。可其中一位抱着球只能慢慢走几步、似跑似走又似蹦，与大家显得格格不入。我想：这是个什么人啊？身体这样还在打球呢？学校怎么招来这样一个学生？

还有一次，我看有一男子在我前边走路一瘸一拐，每走一步总是颠簸一下。我仔细观察，发现他走路就像个过去的“小脚老太太”，迈着小步，歪歪扭扭。他的脚很短小，似乎受过什么大的伤害。我注意到他脚穿一双普通的矮帮胶鞋，人长的也很普通。我和他一起走了会儿，他就回他们的教室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我们心中的大英雄——屈银华。同时，也让我深深感到了登山竟然如此残酷！

屈银华，1935年出生于四川省云阳县（今属重庆市），早年从事伐木工作，1958年加入中国登山队。在攀登珠峰前，他曾先后登上苏联境内的列宁峰（海拔7134米）、中国新疆境内的慕士塔格峰（海拔7546米）和西藏境内的念青唐古拉东北峰（海拔6177米）。

1955年，前苏联邀请我国派人去苏联学习登山技术。1956年组成中苏联合登山队。1958年，苏联又与我国协商共同攀登珠穆朗玛峰。当时中

国准备于1959年10月前登顶并以此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没想到，苏联突然撕毁协议，使联合攀登珠峰瘫痪。这时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和邓小平副总理一起找到周总理，谈到攀登珠峰情况，一致决定：没有苏联我们也一定要攀登珠峰。那时我国登山装备是空白，向苏联购买已无可能。于是国家想尽一切办法从瑞士购买到登山装备。

1960年5月，我国登山队开始攀登珠穆朗玛峰。队员平均年龄24岁。214人的登山队伍开到珠峰北坡山脚下建立大本营。登山队先组织先遣队，建立起大本营以及位于5400米、5900米和6400米的三个高山营地，队员们把几千千克的高山装备、食品和燃料等先行运到这些营地。攀登珠峰的斗争打响了。在攀登过程中有2名队员牺牲，20多人冻伤。有的冻伤了鼻子，有的冻掉了耳朵。

最后只有四人从北坡冲顶。他们是：刘连满，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当他们攀登到海拔8600米号称“鬼门关”的第二台阶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一处六、七米的绝壁拦住登山队的去路。此时已没别的办法。刘连满甘当人梯，让屈银华踩着他的肩膀往上爬。但是登山鞋底是冰爪，全是很长的钉子，不可能穿着冰鞋去踩同伴的肩膀。为了不踩伤队友并减轻负重，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严寒里，屈银华毫不犹豫的脱掉了带爪的登山靴。仅仅几分钟，他的脚趾就没有了知觉。下山后，屈银华的十根脚趾因冻伤被全部截肢，成了我所看到的样子。

他在事后回忆说：“登山对我来说有多喜欢不见得。但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我应该不顾一切去完成。”“当我脱鞋时我就想，我的脚完了。当时我估计脚脖子以下大概都不行了，我有这种

准备。那时脱鞋不一定能上去，但是不脱鞋肯定上不去。我们上不去对国家来讲、对民族来讲，那损失就大了。我觉得值。我是无名小卒，失掉一双腿登顶成功那太值了，就是脑袋掉了又怕什么呢！”

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人在缺氧、黑暗、体力几乎耗尽的艰苦条件下奋力拼搏终于登上珠穆朗玛峰顶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消息传遍全国，举国欢腾。

攀登珠峰这就完了吗？不，这与国界划分有直接关系。

我国解放初期在与尼泊尔谈判边界时说：“珠峰北坡属于我们，南坡属于尼泊尔”。可尼泊尔政府认为珠穆朗玛峰都是属于尼泊尔的领土，并说：“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珠峰，为什么珠穆朗玛峰要属于你们？”但是当1960年我国四位登山运动员成功登上珠峰之后，尼泊尔首相柯依拉腊改了口并与中国政府签订边界条约，确定珠穆朗玛峰北部以及峰顶属于中国。从此以后，珠穆朗玛峰就毫无争议的正式成为中国领土！因攀登珠峰受伤为国的登山英雄们，因为你们的努力，珠穆朗玛从此属于中国了！

屈银华被称为中国登山的开拓者之一。他曾获列宁银质奖章和体育运动银质奖章；1965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体委工作；1979年调回中国登山队。2016年9月19日，屈银华在北京去世，享年82岁。

登山英雄们顽强的意志和不怕艰苦，勇往直前的精神永存！

回忆吴运铎

1961年，我在北京宣武区九十五中学上初中。10月初的一天下午放学，我正要和同学结伴回家，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拦住我说：“周文

英，你今晚有事吗？如果没事你来学校一趟。”我听后楞住了，心想：会有什么事啊？有事也不至于让我晚上来！



吴运铎像（宁葆新供图）

我正在胡思乱想时，大队辅导员对我说：“我们学校想邀请吴运铎来校作报告，你作为我校少先队代表，咱俩晚上一起去吴运铎家一趟。”

我吃惊了！当时吴运铎可是我们中国每个青年心目中了不起的大英雄啊！我一听老师要我和他一起去邀请吴运铎来校做报告，这是给我的莫大荣誉，我能不高兴吗？心里是无比的兴奋。

吴运铎，男，1917年1月17日生于江西省萍乡市安源煤矿。他是新四军兵工事业的创建者和新中国兵器工业的开拓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器制造专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1953年，吴运铎拖着伤残的身体写下了自传体

小说《把一切献给党》，表达了一位党员对党的赤子之心。该书发行达700余万册，并被翻译成俄、英、日、朝、乌克兰、蒙等七种文字，远销国内外，成为鼓励青少年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优秀作品，鼓舞了几代青年人。他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人物。

他还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于1950年见到了斯大林，这在当时是多大的荣耀啊！前苏联人民还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14号为吴运铎建立“中国保尔纪念馆”。在保尔·柯察金的著作《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一书中有一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羞愧，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悔恨；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保尔的这句话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中几乎是人人都会背诵，我也是其中之一。

老师约我晚6点半到校，我兴奋地6点就到了学校。我穿了件最拿得出手的黑色呢子大衣，穿着我暑假打工挣钱买的红皮鞋。在学校与老师见面后，一起坐公交车到了甘家口8号院。

吴运铎家是乙楼4门4层6号。我和老师走进门洞，楼道里黢黑无灯。我扶着楼梯慢慢往上走，只怕路不熟悉磕绊着。我心想：像吴运铎这样的大人物怎么住在这样简陋的地方呢。

吴运铎把我们带进门，我走在最后。刚进门我看到第一间小屋里有四五个几岁的小孩坐在小凳子上正看着12吋的黑白电视。电视放在一个比较高的木支架上。那时家里能有黑白电视机也绝不是普通人了。再往里走是个空着的堂屋，也半

黑着灯。在昏暗中我看见有一个木制的洗脸架，架子上搭着一条白毛巾，再无其它大的物件。吴运铎又把我们带进里屋。嚯，忽然灯光明亮，这就是吴运铎同志的卧室了。

进屋后，辅导员老师向吴运铎提出邀请他去学校做报告的请求。二人互相交谈着。我仔细观察着吴运铎。我觉得他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更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样貌极其普通，个子也不算高，中等身材，清瘦，腿上穿着白色蓝条睡裤，上身穿着白色汗衫。只是我发现他的左臂不太正常，有点耷拉着。

我看到吴运铎的床是木板的双人床，显得极其简陋。而床上叠成四层摆在床头的两床绸缎被子却显得异常亮眼、十分华丽。骤然间让我感到一种高档与奢华。

西侧靠窗的办公桌上摆着很多书籍。有的书很厚，我能看清书的名字，如《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国共产党八大文件汇编》《联共（布）党史》《资本论》。有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很多著作，还有许多有关工业技术方面的书等。书籍两侧是那种用薄铁板折成的书立。当我看到那满桌子的政治书籍时突然感到党的高级干部们都是最爱学习的人。

大队辅导员与吴运铎商有了十几分钟，吴运铎告诉我们：“不能到校去做报告了，我要马上准备去苏联做手术。”

这次我们虽然没有请到吴运铎，但是我也感到了巨大的满足。因为我亲眼见到并近距离接触到了这位全国人民所敬仰的人物。

吴运铎为党的事业、为中国的兵器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他带着学徒每年为前线生产子弹60万发；为研发枪榴弹，曾四次负重伤，浑身上下有200多处炸伤。

他左手4根手指被炸断，左眼被炸瞎，右眼里一直残存着一块弹片。2009年，吴运铎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

1991年5月2日，吴运铎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吴运铎去世后，我再次来到他居住过的地

方凭吊。他的故居是我国二十世纪50年代盖的四层红砖楼，是兵器部宿舍。据说，吴运铎的后代现在依然居住在这里。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位共和国的英雄！

“尽如人意”及其否定形式

 本刊编辑部

“尽如人意”的意思是“完全符合人的心意”。但单用“尽如人意”表示肯定意思的时候不多，人们平时多用“不尽如人意”来表达否定方面的语意。如“这项规划的确有很多新东西，但尚不能尽如人意”，“这些说明文字很好，可仍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或“事情难以尽如人意”等。有时“尽如人意”也用于疑问句，如：“岂能尽如人意？”

的确，现在许多人常把“不尽如人意”说成“不尽人意”。这样说的的好处是省了一个字，且变成“四字格”，容易跟其他四字词语搭配，因此目前流行很广。

当然，从意思上说，“尽如人意”中的“如”是“适合”“符合”的意思，“尽”是“全”“都”的意思，因此“不

尽人意”有些说不通。不过，许多人这样说，而且人们都明白是“不尽如人意”的意思，没有发生歧义的理解，所以“不尽人意”也就流行开了。对此宜采取宽容的态度。

“尽如人意”还有个否定形式的说法是“不如人意”。应当注意的是，从程度上说，“不如人意”跟“不尽如人意”“不尽人意”有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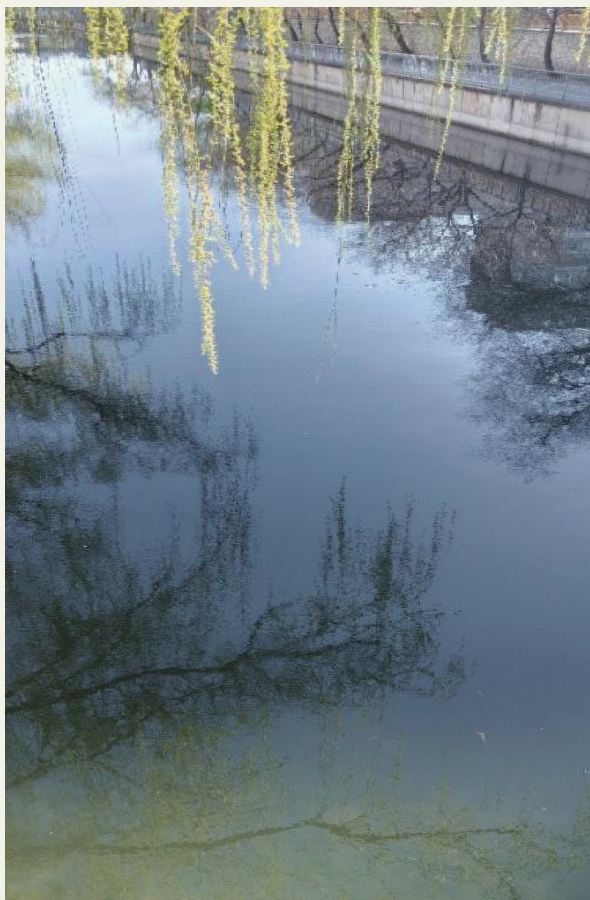
“不尽如人意”“不尽人意”是说，不完全符合人的心意。也就是说，大体上还得过去，但还不能打满分。而“不如人意”则是说，不合人的心意，从程度上说，满意度明显偏低。使用时应对意思上的这种差别予以注意。

摘自杜永道《缺失的语文课》

北太平庄的记忆（四）

—— 美丽的小月河

卢弘炜



绿水映翠柳（作者供图）

在明光桥北，有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河，它就是“小月河”。这是一条美丽的河，河水清澈、河柳蓬茸、风景如画。

走近小月河，你会发现它的源头竟是在明光桥北的一个涵管口。自此向北直流而去，至学知桥拐了个弯，又向东流。于是，一些住在附近的人们会骄傲地说，小月河发源地在咱北太平庄。还有人以为小月河也包含在古时燕京八景之一的“蓟门烟树”景色之中。其实，这只是一些年轻人、或者是一些近些年才搬来附近住的人们不知就里的说法。

常住这里的老人们会告诉你，这条河过去叫做西北土城沟，是元大都城西北部的护城河道。由于明朝定都北京后将北城墙向南移了约3千米，元大都的这一段北城墙包括它的护城河就都被废弃，渐渐成了一条残破的河沟。而原有的小月河起初并不在这里，因此它也不会出现在“蓟门烟树”的景色之中。

原有的小月河是一条源于德胜门外关厢自南而北流向的河流，沿着现在的京藏高速（原德昌

路)西侧,经马甸、小关、卧虎桥、九间房、双泉堡等地,于清河镇东南流入清河,是清河南部的
主要支流,也是京北唯一由南向北流向的河流。
主要是由人工渠和自然冲积的沟河连通,全长约
8.4千米,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寻访和查阅《城北旧事》,原来的小月河还
曾被叫城北龙须沟。

原小月河西侧多为良田。建国后是清河、八
家、塔院和太平庄大队的农田,主要种植蔬菜。
由于经年失修,河道不整,河边杂草丛生。到了
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河道两侧小工厂、小企业
增多,居住在此的各类人员也逐渐增多。而小月
河地区的排水管线不全且老旧不堪,雨水、生活
污水、工厂废水全都排入小月河。时间长了水质
污染严重、气味难闻,成了远近闻名的臭水河,
因而被称作“城北龙须沟”。

龙须沟是北京城南的一条臭水沟,又脏又臭
的环境让老百姓吃尽了苦头。新中国成立后,北
京市政府下决心整治龙须沟,还人民一个干净整
洁的生活环境。为此,老舍先生还创作了话剧《龙
须沟》,讴歌新旧时代两重天的巨大变化。

面对新产生的城北“龙须沟”,1984年北京
市对小月河进行彻底治理。一方面清除河道内的
杂物,对河道两岸进行修整,并种植了大量的柳
树,还修了沿河公路,使整条河流具有泄洪、灌
溉、排污、休闲和赏景的功效。另一方面,对河
道进行改造,将原小月河上游阻断,转而为西北
土城沟注入水源,在祁家豁子处两河相接贯通,
统称“小月河”。小月河自明光桥下向北至蓟门
桥这一段属于北太平庄街道辖区,过了蓟门桥就
进入了花园路街道辖区,在学知桥转弯向东至祁
家豁子,再转头沿小月河古道向北而注入清河。

今日的小月河已焕然一新,特别是北太平庄

街道所属的小月河南段,经过绿化美化,清澈律
动的河水与沧桑静默的西土城墙相伴,成为京城
北部一道绿色的风景。



小月河新貌(作者供图)

那么,如今的小月河源头的水是从哪里来
的?难道明光桥下有地下泉水吗?

来到明光桥北端的小月河进水口你会看到这
里有双孔暗沟,约5米×3米钢筋混凝土方涵。
水从哪里来的呢?2000年出版的《北京志·水
利志》记载:“土城沟……自北护城河引水,经
学院路暗沟进入底宽15米的明渠……”。也就
是说,小月河的水源仍然来自北护城河。

由此我们把目光转向了南边文慧桥下的转
河,这转河上游接高粱河,下游流入北护城河。
小月河的水会不会就是从转河引入的呢?几经
查询和翻阅资料,笔者方在文慧桥西边、转河北
岸可以看见一间简易小房。正是这间房内的“机
关”使得转河的水通过文慧桥西辅路下的一个宽
约2米的暗水口注入到小月河去了。

我们终于明白了,小月河这条美丽的河,不
完全是自然景观,更多的是设计者的巧夺天工。
徜徉在这条小河畔,领略的不应该仅仅是它的秀
美景色,还应该读懂它的成长故事和改造、保护
它的人们们的故事。

海淀区史志办召开第三轮修志试点工作 穗深两地调研座谈会

本刊编辑部

为系统梳理穗深两地调研收获,扎实推动先进经验落地转化,6月17日,海淀区史志办组织召开第三轮修志试点工作穗深两地调研座谈会。会议由区史志办主任马龙虎主持,参与本次调研的志书主编、编辑团队成员结合实地走访的所见所思,开展深度研讨交流。

会上,区史志办副主任赵习杰结合广州、深圳调研实际情况,作《北京市海淀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外出调研考察总结报告》。以广州市、广州市南沙区、深圳市为样本,从组织架构与顶层设计、篇目设计与框架特色、人物收录与相关标准、年鉴编纂与成果创新、资政辅治与数字化建设、宣传推广与新媒体传



6月9日,区史志办副主任赵习杰带队赴广州市里委党史文献研究院(广州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开展三轮修志工作调研(作者供图)

播、开门办史与对外合作等七个维度,系统提炼两地史志工作的特色经验,并紧密结合海淀修志工作实际,提出三项针对性工作

建议:

一是加快研究入志人物选用标准,尽早出台统一规范。参考广州市志启动阶段即明确人

物收录方向的成熟做法，在当前阶段提前启动海淀区志人物收录范围和选用标准的专题研讨，为后续资料征集、内容打磨预留充足空间，保障入志人物的严谨性与代表性。

二是深化数字化赋能应用，全面提升编纂效率。针对海淀区第三轮修志覆盖100余家承编单位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迭代升级海淀志鉴编纂平台，探索引入AI辅助志稿审核、跨源资料智能比对等创新功能，同步推进口述历史全流程数字化采集，以技术手段打通多单位协同编纂的效率瓶颈。

三是创新大众传播方式，扩大方志社会影响力。借鉴《深圳工业发展史》系列短视频上线三日全网点击量突破300万、南沙区建成24个方志驿站的成功经验，围绕中关村口述史、三山五园文化传承、海淀地名文化普及等本土特色主题策划系列新媒体内容，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提升方志工作的社会知晓度。

参与调研的编辑人员结合海淀区在经费保障、人才储备、前期工作基础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对照穗深两地先进经验，就如何在志书中凸显时代特征与海淀地域特色、更好发挥志书资政育人功能、加快方志馆与党史



6月11日，区史志办副主任赵习杰带队赴深圳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深圳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开展三轮修志工作调研（作者供图）

馆建设等重点议题，提出多项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

三轮修志编辑部主编周来升指出，穗深两地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在志书资政、育人等领域走在全国前列，建议加快推进方志馆、党史馆实体建设，面向中小学生常态化开展地情教育专题活动，引导青少年知海淀、爱海淀，成长为海淀未来建设的生力军。

马龙虎主任在会议总结中对调研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表示，广州作为岭南文化中心与改革开

放前沿城市，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两地在第三轮修志试点、年鉴内容创新、资政辅治服务等领域积累了大量可复制的先进经验。本次调研既是一次对标先进的学习取经之旅，也充分彰显了史志工作博采众长的开放特质与经世致用的核心价值。下一步，海淀区史志办将以本次调研为契机，把穗深经验转化为海淀三轮修志的实际行动，打造具有海淀特色的史志工作品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史志力量。

（周勇）

“初心如磐： 海淀红色历史文化主题展”开展

 张桢贞

一幅幅定格时光的珍贵照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档案史料，将静态的历史记忆转化为鲜活的时代画卷，真切再现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区委宣传部指导、区史志办主办的“初心如磐：海淀红色历史文化主题展”在区政府第一办公区正式开展，随后将在中关村海龙大厦、e世界等地开启巡展。

本次展览紧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海淀的奋斗历程，精心设置“寻找初心”“坚韧前行”“抗日前哨”“香山擘画”四个核心单元，综合运用图文阐释、实物展陈、现场互动等多种形式，系统梳理海淀自五四运动爆发至新中国成立的红色历史。从马克思主义在海淀的早期传播、中法大学党支部的诞生，到白色恐怖下革命先辈的坚韧前行；从一二·九运动中清华、燕大等高校进步师生的挺身而出，到全面

抗战爆发后海淀军民建立地下交通线、组织武装斗争的英勇无畏；再到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在双清别墅运筹帷幄、擘画新中国宏伟蓝图的伟大时刻。

该展览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海淀本土的微观史实巧妙结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在聆听讲解中感悟信仰力量，在回望来路中汲取奋进动力，切实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时代薪火相传。

筹办阶段，工作人员系统梳理大量历史文献，广泛征集革命档案、历史影像等原始史料，力求展览内容详实厚重、脉络清晰立体、史实完整鲜活。

区史志办四级主任科员王静宜介绍说：“在这一过程中，我深受教育，筹备展览的过程，于我而言是一场深刻的党性教育。”

作者系《海淀报》记者

区领导参观 海淀红色历史文化主题展

 张澎萱

6月30日，区委书记张革，区委副书记、区长许心超，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明哲，区政协主席鲍雷，区委副书记岳立等区领导参观了由区委宣传部指导、区史志办主办的“初心如磐：海淀红色历史文化主题展”。

主题展以海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奋斗历程为主线，通过图文阐释、实物展陈等形式，将静态的历史记忆转化为鲜活的时代画卷，学史明智、以史育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聆听讲解中汲取奋进力量，筑牢信仰之基。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区领导一行先后参观了“寻找初心”“坚韧前行”“抗日前哨”“香山壁画”四个单元展览，在一幅幅定格时光的珍贵照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档案史料前驻足停留、凝神观看，深入了解自五四运动爆发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海淀红色历史，重温峥嵘岁月。

张革对区史志办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海淀

本土微观史实巧妙结合的做法表示肯定，他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走在前列的坚定决心和信心，自觉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切实将革命精神的激励与科技创新的驱动，转化为推动海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用心用情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海淀红色资源，聚焦主责主业，深入挖掘、创造性转化海淀丰富的历史资源，着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充分利用红色阵地资源开展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党史观，增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勇于担当作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海淀新篇章凝聚拼搏力量、贡献实干担当。

作者系海淀网记者

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赴海淀区 调研指导第三轮修志试点工作

本刊编辑部



调研会现场（作者供图）

7月3日，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主任桂生，副主任顾清及相关处室负责人一行5人赴海淀区调研第三轮修志试点工作。海淀区史志办主任马龙虎主持座谈会，区第三届地方志编辑部主编周来升参加调研座谈。

马龙虎围绕“政治引领、高位统筹、深耕主业、下沉基层、建强队伍、创新路径”六大维度、十七项具体举措，全面汇报了试点工作阶段性成效，包括搭建特色志书篇目，开展分层培训、打造基层示范点、推出方志宣传专栏，配齐专家骨干队伍，探索数字化编纂平台等。

桂生主任在充分肯定试点工作“组织有力、推进有序、成效显著”基础上，提出四点工作要求：一是要坚守史志使命，总结试点经验，打造全市可复制推广的工作模式；二是要深化市区协同对接，通过解决问题推进试点工作；三是要把握工作节奏，压茬推进，提前谋划落实各项编纂任务；四是要严把志书质量，强化著述水平，打造可看、可鉴，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佳志。

周来升主编表示，在承接全市唯一全国第三轮修志试点工作任务后，倍感使命光荣、责重千钧。全体编纂人员将勇担修志使命，坚守深耕佳志、精益求精的工作追求，锤炼格物致知、守正专精的编纂功底，用心打磨传世良志，不负时代托付与方志初心。

下一步，区史志办将继续锚定“出精品、树标杆、创经验”目标，在年内倒排工期攻坚资料长编，分类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常态化下沉基层指导，压实编辑跟踪协调职责，持续深化方志数字化建设，提炼形成可供全市借鉴推广的“海淀方案”。

（曹沛函）

让红色资源活起来传开来

——区史志办丰富党史内容供给，让学党史、用党史更走心

倪恒虎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区史志办深入挖掘区域史志资源禀赋，进一步丰富学党史、用党史优质内容供给，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连日来，跟随区史志办的足迹和镜头，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回顾海淀这片红色热土以党的建设统领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汲取奋进力量，展望光明前景。

红色主题展再现峥嵘岁月

一场红色展览，一次重温“赶考”的精神洗礼。6月22日，由区委宣传部指导、区史志办主办的“初心如磐：海淀红色历史文化主题展”正式开启巡展。展览紧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海淀的奋斗历程，设置了“寻找初心”“坚韧前行”“抗日前哨”“香山擘画”四个核心单元，综合运用图文阐释、实物展陈、现场互动等多种形式，立体化讲述海淀自五四运动爆发至新中国成立的红色历史。

初心使命，诠释了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的精神原点。从马克思主义在海淀的早期传播与中法



初心如磐：海淀红色历史文化主题展（作者供图）

大学党支部的成立，到白色恐怖下革命先辈的坚韧前行；从一二·九运动中清华、燕大等高校进步师生的挺身而出，到全面抗战爆发后海淀军民建立地下交通线、组织武装斗争的英勇无畏；从全面内战爆发到中共中央进驻香山运筹帷幄、擘画新中国宏伟蓝图的伟大时刻，一幅幅定格时光的珍贵照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档案史料，真切再现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

据介绍，展览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微观的本土史实巧妙结合，以情带史、以史育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聆听讲解中感悟信仰力量，激发实践伟力，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党史学习“飞入寻常百姓家”

为了让红色基因“可触可感”，区史志办将丰富的史料变成市民掌中读物，用视频的形式传播红色故事，组建宣讲团队深入基层讲好党史，使党史学习“飞入寻常百姓家”。

“初心如磐：海淀红色历史文化主题展”配套印刷《初心如磐：海淀红色历史文化图录》，全景式展现党的领导下海淀革命先辈的初心坚守与奋斗历程，着力打造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景课堂”。

区史志办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海淀星火耀京华》系列短视频，围绕李大钊、陈毅等曾在海淀留下革命足迹的先辈，生动再现他们求索救国、矢志为民的光辉奋斗历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回望革命来路，传承红色基因。

组建“海淀之光”史志专家宣讲团、“海淀之星”展览讲解队、“海淀之梦”史志服务小分队，将接地气、聚人气、增底气的党史知识送进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提升党史学习教育感召力，让厚重的红色历史文化成为“加油站”与“能量场”。

亲历者讲述改革开放历史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中关村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创业浪潮，为中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成果转化与产业化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为迎接改革开放50周年，中关村口述史项目紧紧围绕中关村创新发展脉络，树牢精品意识，完成贾春旺、张福森、柳传志等48位亲历者与见证人的访谈工作。受访人员包括科学家、企业家、政府官员等，平均年龄约79岁，最大94岁，为海淀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提供经验借鉴，更为持续深入阐释中关村创新

精神贡献鲜活样本。

目前，区史志办正筹备访谈一批深耕前沿科技的知名企业家，计划于今年完成共计60人访谈任务。对照《海淀区推进文化强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5年—2027年）》，力争在改革开放50周年前完成中关村口述史项目。

忠实记录新时代发展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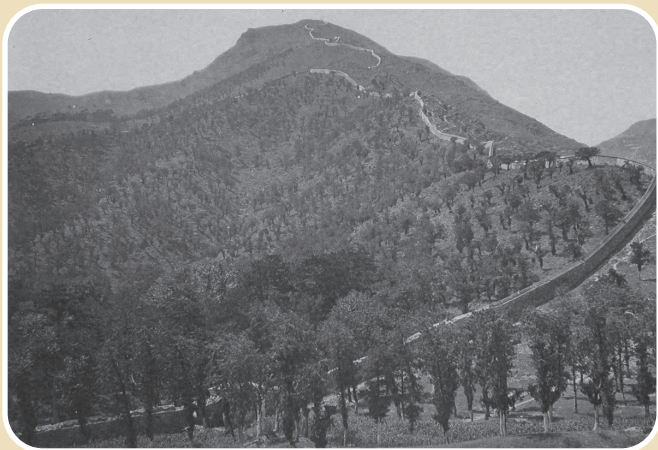
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海淀作为首都“四个中心”功能集中承载区，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率先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首都特征、海淀特点的一体化发展路径，奋力当好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排头兵。

区史志办开展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专题史料征集工作，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海淀向科技要答案、向创新要动力的奋进进程，系统梳理一批“从0到1”的世界级原始创新成果在海淀落地生根的历程。此次征集系统收录校地协同、科创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育等各类一手史料，完整呈现海淀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的突破性进展，做实一体化发展历史记载，把海淀“金名片”擦得更亮，把一体化发展“大文章”写得更实。

“站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关键节点，我们必须始终坚守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淀实践新篇章。”区史志办主任马龙虎表示，区史志办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区委“七个走在前”工作目标，立足“存史、资政、育人”社会功能，进一步增强学党史、用党史吸引力感染力，助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全力服务海淀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的中心大局。

作者系《海淀报》记者

海淀故影



香山静宜园外墙（1865 年）



昭庙侧面（1907 年）



见心斋（1919 年）



森玉笏（1922 年）



勤政殿石桥（1925 年）



双清别墅（1930 年左右）

封面：颐和园“涵虚”“翫秀”坊



凌霄花（宁葆新 供图）

海淀史志

编辑：《海淀史志》编辑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1 号

邮编：100195

电话：010-88487042